

翻译教学与研究

(第四辑)

董洪川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教学与研究. 第四辑 / 董洪川主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229-14344-2

I. ①翻… II. ①董… III. ①翻译—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73197号

翻译教学与研究(第四辑)

FANYI JIAOXUE YU YANJIU (DI SI JI)

董洪川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斌 刘 喆

责任校对: 朱彦谚

装帧设计: 李昕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95千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4344-2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翻译教学与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办单位：重庆翻译学会 /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

编辑单位：《翻译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出版单位：重庆出版社

学术顾问：（以姓氏拼音为序）

黄友义（中国翻译协会） 刘象愚（北京师范大学）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武能（四川大学）

主 编：董洪川

副主编：祝朝伟 胡安江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曹顺发 董洪川 戴运财 胡安江 胡显耀 李雪顺

李永毅 刘安洪 秦中书 汪顺玉 王建梅 王 杨

文 旭 徐 飞 云 红 张荣建 张绍全 祝朝伟

特约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德鸿（香港岭南大学） 陈永国（清华大学） 段 峰（四川大学）

郭尚兴（河南大学） 韩子满（上海外国语大学） 胡开宝（上海交通大学）

廖七一（四川外国语大学） 卢 敏（中国外文局） 孙艺风（澳门大学）

谭载喜（香港浸会大学） 王东风（中山大学） 文 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许 钧（浙江大学） 查明建（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 剑（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美芳（澳门大学） 张 旭（广西民族大学） 赵军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朱健平（湖南大学） 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 33 号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400031

联系电话：023-65381861

投稿邮箱：fanyixuekan@163.com

联 系 人：彭老师

目 录

翻译理论探索

- 翻译信念的辩证关系 贾洪伟·····003
- 中英互译探讨 海外逸士·····012

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研究

- 文化话语权视域下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研究：
定位与思考 彭红艳·····043
-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葛浩文英译《狼图腾》文化意象的失落研究
赵自强·····052

翻译史研究

- 抗战时期大后方军事翻译述论 罗 天·····065
- 马若瑟《赵氏孤儿》法译版中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的
翻译策略研究 唐 果·····078
- 翻译与“冒充”
——从《礼拜六》中没有原作者的“翻译”说起 钟 毅·····089

文学翻译研究

- 论霍克思《红楼梦》译本名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的动因
田召见·····099



“对等”还是“超越”

——以《道德经》两个英译本“意象再现”对比为例

张丽颖 108

论《长恨歌》英译的失衡：在文学性重构与明晰化取向之间

张 欣 120

翻译实践探索

彭斯诗歌汉译原则探析

——以《彭斯诗歌精选》为例 李正栓 王 心 131

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的编纂：原则及模式 赵 旻 142

中韩跨文化翻译现象与翻译策略研究 张文丽 151

翻译教学研究

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法 陈 卉 169

当前翻译生态诉求下“多元同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的构建

杨志亭 177

学界动态

翻译技术化转向中译者与机器的矛盾与协调

——《机器翻译中的人为因素》评介 李晗佶 陈海庆 189

翻译学博士论文写作与人才培养的启示

——第五届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侧记 李东杰 194

附 录

《翻译教学与研究》征稿启事 203

《翻译教学与研究》文内引文标注、注释及文后参考文献体例 205

翻译理论探索

翻译信念的辩证关系

贾洪伟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摘要:早在1877年,美国符号学家、实用哲学创始人皮尔士(1839—1914)就探讨过信念的确定问题,可时至今日,学界对信念的本质和层次划分问题仍未有实质性的研究进展。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翻译符号学的视角对信念的本质加以批判性分析,依据其存在与分布状况进行层次分类(国家、群体和个体),并以翻译为切入点,辅以实例,阐述三个翻译信念之间的辩证关系,再以现实、理想和实用三个递进模式阐述翻译学科化、行业化和产业化的推进路径。

关键词:翻译信念;国家信念;群体信念;个体信念;辩证关系

On Dialectic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Translation Belief, Group Translation Belief and Individual Translation Belief

Jia Hongwei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Research Center for Linguistic Semiotic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Abstract: In 1877, American semiotician and pragmaticist,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 discussed how to fix a belief. However, up to now, scholars have not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 areas of the nature and hierarchical divisions of belief. So it is necessary,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to conduc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its nature, to divide it into state, group and individual ones based on its existence and distribution, and to discuss with examples the dialectic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group and individual beliefs in terms of translation. Finally, the furtherance of translation discipline, industry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blue-printed in terms of reality, ideal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belief; state belief; group belief; individual belief; dialectic relations

1877年11月,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在《大众科学月刊》



上发表了论述信念问题的专文《确定信念》(*The Fixation of Belief*)。他虽然在文中历陈了科学研究中的时弊,但未对信念加以界定,而仅以众多史实为理据证实逻辑推理对确定信念具有的现实作用。从历史角度看,皮尔士的这项研究虽然对信念的科学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并没有解决与信念相关的本质性问题。针对信念的界定、层次划分和研究状况等问题,笔者于2017年7月16日以关键词“信念”为搜索条件,在“中国知网”上,共搜得1319篇文献。这些文献多从政治、哲学、教育、经济、农业、逻辑等层面探讨信念问题,但多数没有述及信念之本质和层次(分类)问题。那么,到底何谓信念?信念是否具有层次性?就翻译(符号学)而言,各层次信念之间存在怎样的辩证关系呢?本文拟以笔者在《翻译符号学的信念问题》(2018)有关信念的界定、信念在翻译符号学中的作用以及翻译符号学的信念研究为思想基础,以现实—理想—实用这一递进模式为参考,从宏观(国家)—中观(群体与社会)—微观(个体)这一科学层次,系统地阐述上述这三个问题。

一、信念界定与分类

既然皮尔士并未给出明确的“信念”界定,我们暂以当前较为公认且较通用的两本词典——《剑桥词典》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以及国内外哲学界广为使用的专用工具书——《牛津哲学词典》中针对信念所下的界定为依据。

《剑桥词典》(*Cambridge Dictionary Online*, 2019)认为(1) the feeling of being certain that something exists or is true (肯定某事物存在或者为真的情感——笔者译,下同);(2) something that you believe (相信的事物)。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2019)认为(1)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true or definitely exists (认为某事物肯定为真或肯定存在的情感);(2)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is good and can be trusted (认为某事物为善且可信的情感);(3) an idea that you believe to be true, especially one that forms part of a system of ideas (相信为真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作为一套思想观念系统一部分的思想观念)。

《牛津哲学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2000)认为 To believe a proposition is to hold it to be true.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clude discovering whether belief differs from other varieties of assent, such as acceptance, discovering to what extent degrees of belief are possible, understanding the ways in which belief is controlled by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factors, and discovering its links with other properties, such as the possession of conceptual or linguistic skills. (相信一项命题就是肯定其为真。哲学层面的问题包括弄清楚信念是否不同于其他的肯定形式,比如接受;弄清楚在什么程度上,到什么程度信念才能成



为可能；理解信念受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所控制的方式；弄清楚信念与其他属性，如具有概念或语言技能的关系。)

上述有关信念的界定中，《剑桥词典》第一条和《朗文现代英语词典》第一条几乎一样，均侧重主观情感层面认定的真值和客观存在。较之《剑桥词典》而言，《朗文现代英语词典》第二条更进一步延展至真善层面，进而将界定延展至哲学层面或思想体系层面的真假与作用。有关《牛津哲学词典》的界定，如贾洪伟（2018：60-61）所言：“第三条肯定了一点：相信即为真，并规定了四项任务：①求其本质；②探究可能度；③因素控制方式；④属性关联度。相比来看，该辞书属哲学界专业工具书，读者几乎都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故而该界定最为专业，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该词条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是命题，因此这一信念定义仍是模糊不清的。”从本质上看，上述界定尚未触及信念的品质（真与假、好与坏、善与恶），信念的分类，信念的边界，信念的宗教与哲学基础等问题。

一般来说，命题是指一个判断或陈述的语义，即实际表达的概念，可以被界定并可观察的现实和现象，但命题并非指判断或陈述本身，而是指其所表达的语义。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信念均为真，也并非所有的信念都是真、善、美。即便是在以科学逻辑为主导的可能世界当中，也极有可能如此。如果仅凭上述定义中所认为的“相信为真，肯定为好，即为信念”，那么空想主义者所持的社会空想主张是否为信念呢？英国乌托邦主义者所持的理想社会思想是否也是信念呢？军国主义者所持的“武力战胜一切”的思想，虽不可归入社会正义范畴，但是否仍属于信念范畴呢？霸权主义者所持的强权即是真理的思想，是否也属于信念范畴呢？20世纪以降的“假—丑—恶”文论主题是否也属于信念的范畴呢？中国历史上的“复古思想”“复国思想”难道不也是一种信念吗？18世纪以来欧美学界所持的“中国落后论”“汉语言文字落后论”“中国文学落后论”“中国无哲学论”，以及德国莱布尼茨的“汉字为理想文字论”，里面关涉的不仅是真假与善恶问题，难道不属于信念范畴吗？

事实上，持有特定信念的人未必会专门思考信念本身的真善美、假丑恶等属性问题。除非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群体（如中国共产党党员、教堂忏悔、寺庙悔过等）之中，否则不会出现类似“自我批评”“自我反思”式的信念属性确定现象。细想一下，我们会发现，唯有局外人或第三方做道德判断的时候，才会关注或评判信念的属性问题。纵观历史文献，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研究不但对信念的属性问题关注不足，对有关信念的分类问题也甚少关注。有关信念的分类问题，国内外研究均未给出充分而有效的结论。200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商学院MBA项目将消费金融学（Consumer Finance）引入课堂，将消费者的金融行为分为国家、群体和个体三个层面，这一做法可为本文的信念分析提供思路。笔者参照消费金融学的做法，将信念也分为国家、群



体、个体三个层面,即国家信念、群体信念和个体信念,其中国家对应的是宏观层面,群体对应的是中观层面,而个体对应的是微观层面。

诚如贾洪伟(2018: 61)所言,“国家信念无非是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经济繁荣、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等。群体信念可分为社会群体和民族群体两个层面,前者又分为企事业单位和非政府机构,从行业或专业角度思考,规范行业或专业的市场运营,制订行业规范,执行准入机制,提供法律保障措施,旨在促进特定领域的产业化、行业化、学科化、数字化;而民族信念是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继承宗法制度,引进和提升生产技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维护区域社会稳定,保护民族利益不受侵害,发扬民族文化精神,维护民族团结等。个体信念体现在以自身的喜好做事,并能够坚持下去。”个人信念事例可参见清末林纾、当代许渊冲等。

二、翻译信念的层次

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一样,翻译符号学和翻译学也涉及宏观(国家)—中观(群体)—微观(个体)三个层面的信念。具体来说,国家信念指的是国家机关和相关具备国家行政管理的非政府机构对有关符号转换这一学科(市场/行业)的发展和操作,以行政命令、法律法规、行业规范、规章制度、省部级和国家级项目等形式所做出的规范、管理、监管、审查、资助、利益保障等行政义务,针对国际形势、国家需求、社会需要、行业发展等制订出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规划与政策,如引进佛经、引进制糖工艺、译介外国科学技术、传播中国文化、双语讲授中国语言文字等。譬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中国知网国际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一带一路倡议有关中国文化外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都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汲取中国智慧,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贾洪伟, 2017: 111)这一国际层级翻译信念的体现。

亦如贾洪伟(2018: 61)所述,翻译符号学视角下的群体信念也分为社会群体和民族群体两个层面,即企事业单位和非政府机构构成的社会群体,以及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构成的民族群体。社会群体信念辅助和配合国家制订和执行行业规章制度、行业标准、准入机制、市场规范、同业竞争机制、企业征信系统等,推动行业管理的规范化、市场化、全球化和数字化,推进符号转换相关机构和企业的行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技术化、数字化和全球化,促进行业、产业技术的服务导向、本土国际化和学科化;民族群体信念以民族语言与官方语言符号、联合国工作语言符号、全球通用



语言符号、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语言符号转换为手段,获得及时而准确的法律、政治、经济、贸易、安全、军事、社会、民族、教育、工业、农牧产品等信息,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输出民族优秀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前沿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譬如,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翻译研究会和翻译史研究会、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分委会、辽宁省翻译学会、河北省翻译协会、河北省翻译学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翻译研究中心、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属于发挥群体翻译信念功能的社会机构。

个体信念是包括翻译工作者在内的符号生成者和使用者所持的信念,涉及个人理念与社会现实、个人兴趣与集体意志、个人行为与行业规范、个人能力与行业资质、个人操守与行业准则、个人利益与行业保障等之间的矛盾。总体上说,个体信念的具体表现可分为三类:①身在政府机构(如原中央编译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翻译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和文化部外联局等)和非政府机构(如联合国相关部门、国际红十字会相关部门等)的译者,个人信念与机构信念一致,体现在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交办的翻译任务,不因内容多寡、感情色彩而出现速度和质量层面的偏移;②职业译者和自由译者,只为生活打拼,“唯利是图”,个人职业伦理随着利益的多寡而动摇,只讲求速度和效益;③工作之余,出于个人喜好的兼职译者,或追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或跟随社会某一兴起思潮,利用业余时间,以深厚的知识底蕴为基础,以熟练的符号转换技能为手段,以符号使用惯习为依据,引进国外的新兴理念、时代思潮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输出国内具有巨大普世意义的文化作品,于无形之中促进了知识的传递和中外的互动。譬如,清末严复眼见国人思想陈旧、国势衰微,遂汉译《天演论》,引进社会学思想和经济学理论,意欲唤醒上层知识分子,革新社会制度。随着文学救国论的兴起,鲁迅率先汉译“先进”的国外小说,从社会底层小文人为切入点,唤醒如同“沉睡雄狮”一般的民众,以图提升民众家国之意识和保种的民族意识,最终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另有已故汪榕培先生,多年如一日,英译了《牡丹亭》《邯郸记》《庄子》《墨子》等中华文化精品,被国外大学图书馆收录,甚至被列为大学生的阅读书目。

然而,三个层面的翻译信念并非总是一致的,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层面改革的深入,以及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三个层次时而两相一致,时而三者一致。那么,三个层面的翻译信念的辩证偶合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它们会产生怎样的效应呢?

三、信念的辩证关系

各种社会思潮、各种程度的社会变革都会影响国家信念(a)、群体信念(b)和个体信念(c)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翻译学科化、行业化、产业化发展进程。



当国家信念与群体信念一致($a=b$)之时,国家信念规划出产业化和学科化路径,引导翻译的行业化发展方向,虽然便利了国家管理,维护了行业利益,却制约了译者行为,忽视了个体之安全问题(贾洪伟,2015:59)。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国家重视科技英语,高等院校纷纷鼓励教师学习并讲授科技英语,中国科学院牵头创办《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创办《上海科技翻译》(现更名为《上海翻译》),为全国科技翻译工作者建立交流业务经验和翻译思想的平台,鼓励译者从事科技翻译。但因科技翻译需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且报酬和业务量都不多,难免影响个体的翻译信念,从而也阻碍了科技翻译的整体发展。此外,由于翻译市场缺乏准入机制,不具备专业的评估标准,尚未建立健全的译者行为监督系统,译作的质量也就难以保证,又因翻译并非只是语言转换问题,还涉及各门类的专业知识,且缺乏针对译者群体终身的部分免费再教育机制以及与晋级相匹配的报酬机制,译者的所得无保障,没有设立专门针对译者的保险制度,译者的生存空间难免会被压缩,这不免促生个体翻译信念的转型,即稳坐庙堂之内可胜任翻译任务之人,宁愿另择他事也不沾染译事;机构专任翻译或是硬着头皮坚持爬格子,抑或是委托翻译机构找自由译者代劳;自由译者或是挂靠在翻译机构,或是稳坐一室之内,揽收天下业务,手捧翻译软件,质量过得去,能按时完成任务就好,更有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益采用机器辅助翻译的译者,根本无法保证译作的质量,同时也助长了翻译市场的恶性竞价现象。

国家信念与个体信念一致($a=c$)之时,个体的信念是充分而完满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输出国内的优秀作品,如清末民国期间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等领域的译者,以及从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专职”译者,如已故杨宪义先生,基本上属于委托译者。这类译者完全根据国家和社会需要,或是自行选择报批,或是完成国家指定翻译任务,社会群体沦为建议输送,或辅助完成翻译任务,从而制约了群体行为,阻碍了行业发展,尤其是行业的规范化、系统化和法制化进程,不利于翻译学科化、行业化、产业化发展。因而,在国家信念与个体信念一致的这一特殊时期,国内没有出现专司翻译业务的社会机构,高校也没有开设专门针对翻译的人才培养体系。

群体信念与个体信念一致($b=c$)之时,社会群体以机构形式招揽翻译业务,组织翻译人才队伍,推动翻译行业的发展,但因社会群体怀揣一种误解,即“会外语的人就会翻译”,不免聚集了一批业务能力参差不齐的“译者”,翻译的质量自然无法保证,也就不免破坏了业界的伦理生态,扰乱了国家规划和管理秩序;又因公司的宗旨为利益最大化,不免要在翻译速度和报价上做文章,从而滋生了业界和译者之间的恶性竞价,不但扰乱了翻译市场秩序,还无端地徒增了一些翻译市场和译者管理的问题,更输出了一些不恰当和不正确的译作。理性观之,这极不利于翻译市场的行业化



和产业化发展,更不利于译者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很简单:一旦群体信念与个体信念一致,就会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翻译的数量是上来了,可翻译的质量就下来了,而且还影响了国家信念的实施,阻碍了国家对行业的管理和税务的监管与征收,妨碍了国家规划与规范翻译产业的行为,同时阻挠了制订群体和个体层面规章制度的步伐,甚至还阻挡了翻译行业与译者层面的立法进程。

可见,国家信念、群体信念和个体信念之间,不论哪两者相一致,都会引发甚至滋生某些层面某种程度的问题,只有当国家信念、群体信念和个体信念相一致时,才能“政通人和”,才能行业兴、产业旺、学科强。其中,国家信念所发挥的作用是规划、引导、监督、管理、规范翻译学科、翻译产业、翻译行业的发展;群体信念发挥的作用是执行和推动国家信念的实施和发展,履行国家的相关规定,促进学科、产业和行业的快速发展;个体信念所发挥的则是遵守国家法规、行业规范、职业操守,规范自身的职业行为,完善自我的知识结构,提升自我的职业素养,追求自身的安全保障,从而推动学科、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与完善。此外,群体和个体信念作为民间力量(贾洪伟,2017:10-13)还可以发挥“参政议政”的功效,根据学科、产业、行业的国内外发展态势与当前存在的问题,起草全面而可行的规划性建议,供国家管理部门修订和制订学科化、行业化和产业化发展纲领,间接地推动国家信念的转变与完善。

因不同的条件,国家信念、群体信念、个体信念之间,偶尔会出现两相一致的现象,虽然也能在不同层面推动翻译的发展,可总是顾此失彼,遗留和滋生不少相关问题,因而只要没有出现三者一致的局面,就无法促进翻译学科化、行业化、产业化的大踏步前进,从而也会影响翻译信念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所应发挥的作用,更会影响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但是,要想让翻译信念发挥最大的功效,笔者觉得有必要仿拟 Richard W. Paul 与 Linda Elder 于 2002 年合著的《批判思维:成就卓越人生之器》中有关批判思维之现实、理想与实用三个维度的见解,将信念的发挥也分为现实、理想与实用三个维度来加以剖析。

在现实维度上,国家信念立足于当前翻译学科化、行业化和产业化进程的本来面目,保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对翻译学科加以规划、规范、管理和监督,甚至可以立法;群体信念以遵守国家制订的法律和法规为基础,以学科、行业和产业当前的具体发展态势为依据,发现历史发展的问题,利用国内外资源解决现有问题或改善当前的发展劣汰,并根据发现的问题起草相关的可行性建议,为国家管理部门提供相关的参考建议;个体信念以遵守国家信念,尊重群体信念为守则,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以及自身的业务能力,发现自身发展的瓶颈,找出超越瓶颈的解决措施。

在理想维度上,国家信念当以追求翻译学科化、行业化和产业化的理想状态为根本,专门研究和制订进一步推进翻译三个层面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办法;群体信念应该



以翻译三个层面发展的状态为切入点,努力走向各自发展方向的理想状态;个体信念则以自身发展所处的境遇为根本,紧随自身所处层面的理想发展态势,追求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

在实用维度上,国家信念以相关的规划、管理、监督措施为要,努力趋向理想目标;群体信念是在国家信念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在层面想要追求的理想状态为起点,规划出具体的操作措施,逐步地走向理想目标,走进国际舞台的前列;个体信念须在国家信念和群体信念基础上,以自身所在层面追求的理想状态为参考,发现自身的不足,坚持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逐步地趋向自身发展的理想目标。

最后,纵观影响翻译学科化、行业化和产业化发展的众多因素,其实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影响事物变化的内部因素,就翻译而言,这一内部因素就是信念。国家、群体、个体三个层面所抱持的信念,决定着三个层面的伦理和行为,因而翻译三个层面的本质性发展之关键因素是对翻译所抱持的信念,这才是制约中国翻译当前发展的瓶颈。

四、结语

本文以美国符号学家、实用哲学创始人皮尔士于1877年发表的“确定信念”一文为切入点,以“信念”为搜索条件在“中国知网期刊”进行搜索,获得1319篇文献,发现这些文献大多集中于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农业、逻辑等层次的思辨与管理问题,鲜有述及信念之本质和层次,更未涉及各层次信念之间的辩证关系。

本文以此为基础,以学界广为认可且使用较为普遍的《剑桥在线词典》(2019)、《朗文现代英语在线词典》(2019)和《牛津哲学词典》(2000)的定义为依据,批判地分析了三部工具书的界定问题,指出信念持有者本无真与假、对与错、善与恶之意识,此区分为第三方局外人所做的理性归属。

进而,笔者依据信念的存在与分布情况,同时参考哈佛商学院提出的消费金融学所具有的国家、群体和个体三个层次,将信念分为国家信念、群体信念(社会和民族)和个体信念三个层次,说明其层次性区别、特征与功效,再从翻译符号学视角,评述国家、群体和个体在学科化、行业化和产业化层面所持之信念,以及国家信念与群体信念、群体信念与个体信念、国家信念与个体信念三种两相一致局面,探讨了翻译三个层面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以及滋生的问题,从而指出唯有国家信念、群体信念和个体信念保持一致,才能真正、充分而全面地推动翻译学科化、行业化和产业化的本质性发展。

最后,笔者以Richard W. Paul和Linda Elder共同提出的批判思维的现实、理想和实用三维度视角,说明翻译信念发挥最大功效之路径,指出唯有如此,信念才能发挥



影响翻译学科化、行业化和产业化这一内部因素的推进性功效，也才能推动翻译发展的伦理和行为发生快速的变化，从而打破阻碍中国翻译事业发展的现有战略性瓶颈。

参考文献

- [1] 贾洪伟. 译员安全机制: 以澳大利亚相关政策为例[J]. 中国科技翻译, 2015(1): 59-61.
- [2] 贾洪伟. 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推进路径研究[J]. 外语学刊, 2017(4): 110-114.
- [3] 贾洪伟. 有关中国文化走出去视角下民间力量的几点思考[J]. 外语研究, 2017(5): 10-13.
- [4]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信念问题[J]. 燕山大学学报, 2018(4): 60-65.
- [5] Blackburn, Simon.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6] *Cambridge Dictionary Online* [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 2019-01-11.
- [7]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Z]. <https://www.ldoceonline.com/>, 2019-01-11.
- [8] Paul, Richard W. & Linda Elder. *Critical Thinking: Tools for Taking Charge of You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fe*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 [9] Peirce, Charles Sanders. The fixation of belief [J].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877(12): 1-15.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 2017 年度招标课题一般项目“文化符号价值开发与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2017SISUHY01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贾洪伟, 男,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副教授,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泰国西那瓦大学教育观念和符号学方向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符号学, 翻译史, 翻译安全, 翻译立法, 海外汉学, 社会语言学。

[电子邮箱] yywhyj@163.com

中英互译探讨

海外逸士

编者按：本文讨论了中英互译的几个重要的问题，包括直译与意译、翻译中的灵活性、翻译的举重若轻、典故的翻译、人名与地名的翻译、书名的翻译、不同文体的翻译、诗歌的可译性，分别配以案例分析，并就具体的互译案例进行了点评，提出相应的翻译思考。全文强调了翻译作为一门学问，译者要掌握之必须扎扎实实，没有终南捷径，不能投机取巧。

关键词：直译；意译；典故；人名、地名、书名的翻译；诗歌

绪 言

人类有不同的语言，自从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有交往以来，就有了翻译。翻译是语言交流必不可少的桥梁，翻译的质量、水平和技巧从古到今也在不断提高。笔者曾读到过一篇很早的散文翻译，其中“stock of knowledge”一语，被译成“知识堆”，而Milky Way 则被译成“牛奶之路”，令人啼笑皆非。翻译最基本、首要的原则是忠实于原著。为了达到这个原则，不论是中译英或英译中，译者必须确切了解原文的意义。只有在确切懂得原文的基础上，才能忠实地在另一种语言里把原作的意思、精神表达出来。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译者对两种语言都要有较深的造诣，才能确切地互译。试想：一个中国译者做汉译英，尽管他在母语上不一定有问题，可如果他的英文程度较差，又如何能把中文意思在英文里确切地表达出来呢？在中译外时，不擅长外文的译者硬译出来的文章，通常译得不知所云，而外国读者自然无法看懂。

翻译也是一种学问。做学问必须扎扎实实，没有“终南捷径”，不能投机取巧，否则绣花枕头里的稻草总有一天会戳破枕套而露出来。既然翻译牵涉两种语言，这个功夫必须下在两方面。在中文方面，总得把常用成语熟悉一下，一般古文也得学点，否则碰到了怎么能准确翻译呢？有一个笑话说，有人把“胸有成竹”直译成“胸中有一根竹头”。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还得熟悉英文里的成语，看看有没有相应的成语可以用在这里，以代替中文的成语。同样，当把英文译成中文时，如果没有一定的英文水平，不能确切理解英文的意思，肯定会闹出“知识堆”和“牛奶之路”此类的笑话。

本文在构思过程中，卧龙先生提供了他的思考和建议，特此鸣谢。下面笔者将分节探讨翻译中的方方面面。



一、所谓直译与意译

近代翻译界都在讨论直译、意译问题，但讨论了几十年，还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这是因为大家只是讨论字面意义，没有给出定义。这里，笔者试图给出两个概念的定义，再予讨论，看看结果会怎样。所谓直译，通常地说，是指硬邦邦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中英两种语言是不对等的，结构差别也很大。所以直译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所谓意译，可以是简单地按照译者的个人理解而译。但笔者认为，因译者水平不同，译成的文字与原文的意思差别会很大，这个差别可以从毫厘之别到千里之差。所以意译这个说法太含糊不清，容易误导初译者。

按照自己对原作的理解，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这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不管译者将文章改写得如何传神，都只是传译者自己之神，而不是在传原作之神。正确的翻译是按照原作的表达，将其忠实地表现在另一种文字里，不能走样。至于原作的意义，不管是表面的还是深层的，都应让读者自己去理解，而不用译者去帮助读者理解。

笔者认为翻译是把一种文字变成另一种文字，而基本意思不应该变。如果意思走了样，就不能叫翻译，只能算是将原作改写到另一种文字里去。而现在所谓的意译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直译、意译这种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笔者认为，译界应该放弃这种不专业的说法，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更适用于指导翻译活动。在这里，当然没有意译的涵义。所谓“意译”应该是指：在一种文字里的某种说法，若在另一种文字里找不到相应说法，则只能根据意思译过去，这才是意译的真正含义。除此以外的所谓意译，都是属于理解误区。

至于前人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按笔者的理解，“信”应该指忠实于原著；“达”应该指忠实地在另一种文字里表达原著的意思；“雅”应该指所使用的词语必须优美及规范化。有人问：如果一部小说的原著里，有表示下层社会人物的粗俗话、骂人话，要不要忠实地翻译过去呢？这当然要译，否则怎能符合“信”的原则呢？请相信读者自己的免疫力吧！

事实上，翻译是按一层层意思译过来的。不是按一个个字译的。譬如一句话由三层意思构成，翻译时就应按三层意思一层层考虑怎么译过去。至于顺序，则应按目标语言的习惯顺序来安排，而不一定按原语言中的顺序来安排。这样译成的句子当然就有相应层次构成的三个部分。

有时很巧，两种语言相应部分的顺序一致。例如：“早晨，我去看了医生。”这个句子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事件。可对应地译成：In the morning, I went to see a doctor. 当然，亦可按英文的另一语序译成：I went to see a doctor in the morning. 在前一译句中，中英文看上去非常对应，但这是意思的对应，而非字的对应。即使在“我是个学生”句中，英语“I am a student”也并非是与中文原句字与字的对应。所以



“逐字翻译”这个说法，是个理解误区。

二、翻译中的灵活性

那么，翻译中可不可以有灵活性呢？当然可以，但也有不可以的地方。所以译者要熟练掌握什么地方可以灵活，什么地方不能灵活的原则。

首先，对原文的意思不能灵活乱译。原作怎么说，译文也得怎么说。翻译特定名词时一定不能灵活，如木头就得译成木头，不能把它译成别的什么；其他意思明确的字，翻译时也不能灵活，如绿色就得译成绿色，不能译成黄色、红色等。

其次，在什么情况下，译文处理可以灵活呢？一般来说，在意思不变的情况下，说法可以灵活，因为一种意思经常会有不止一种表达法，即句子结构安排可以灵活。如上面例子，“早晨”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只要句子结构符合规则即可。此外，选用同义词可以灵活，如“绿色”，可以用 green，也可以用 verdant。至于究竟用哪个，得根据上下文决定。譬如，要单音节词，用 green，要双音节词，用 verdant。笔者觉得 green 较通俗些，verdant 较雅些。再如，good-looking, pretty, beautiful 三词据词义可进一步辨析为：good-looking 程度较低，而 pretty 和 beautiful 程度较强烈，即较漂亮；pretty 只指外表漂亮，而 beautiful 兼指内在。不过，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不见得英文作者或诗人是根据这些辨析而使用这些词，他们一般只是使用其基本意义而已。词汇之间的各种差别，只能靠译者在大量阅读中去体会。

三、翻译中的举重若轻

看过些武侠小说的人，都会读到这样的描写：一个内功到了火候的人，举起千斤重鼎如举纸扎玩具似的，绕场一周，面不改色气不喘。这就叫举重若轻。能做到这样，必须内功要到一定火候。同样道理，翻译中要做到举重若轻，译者关于两种语言的“内功”修炼也要到一定的火候。所谓翻译中的举重若轻，就是指对一句或一行较难译的句子或诗行，可轻松自如地译过去，且使他人读起来毫无牵强滞涩之感。其实难易对不同的人而言是不同的，难易是按各人的水平而定的。此处举一例说明。有句唐诗曰：“江碧鸟愈白。”如果译成“The river is blue, birds are white.”那就错了，原句中的“愈”字没译出来。这句诗不像“桃花流水鳊鱼肥”，虽有三层意思，“桃花”“流水”“鳊鱼肥”，但三层意思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只是写了三个情况。在“江碧鸟愈白”中，虽然只有两层意思，但两层意思之间有内在联系。试想，为什么“鸟愈白”，是因为“江碧”之故。两者之间有个衬托关系，即在江碧衬托之下，鸟显得愈白了。了解了这层关系，译起来就容易着手了——Against the blue river birds look whiter. 这里的鸟当然指鸥鹭之类的白鸟。这样一译，整个意思就出来了。所以，大家以后碰到难句子，



不要先动手译，而要先分析思考各层次意思之间的关系，随后才能轻松地构成英文译句。

再举一例，李清照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首词里并不是句句难译的，最难译的是一头一尾。翻译时，既要达意，又要译出特色，还真不容易。这里摘录几位前辈名家对这首词的翻译，供读者比较。先看林语堂前辈的译文：

So dim, so dark / So dense, so dull / So damp, so dank / So dead! / The weather, now warm, now cold / Makes it harder than ever to forget! / How can thin wine and bread / Serve as protection / Against the piercing wind of sunset! / Wild geese pass over head / That they are familiar / Makes it more lamentable yet! / The ground is strewn with staid / And withered petals / For whom now should they be in vases set? / By the window shut, / Guarding it along / To see the sky has turned so black! / And on the colanut / To hear the drizzle drone / At dusk: Pit-a-pat, pit-a-pat! / Is this a mood and moment / Only to be called "sad" ?

林前辈的首句倒也体现了举重若轻的感觉。他用了七个头韵字，再加 so，来对应原文的七对重复字。不过他举的重有点举错东西了。譬如说，应该举个五百斤的石锁，但他却举了千斤顶。重是更重了，但举错了对象，不能匹配。原文的首句七个字重复，而且重复中还有重复。寻寻觅觅，四字同一意思。后面的四字六字也一样。要把这个特色译出来，才是上品。

再看杨宪益夫妇的译本：

Seeking, seeking, Chilly and quiet, Desolate, painful and miserable.
Even when it's warmer there is still a chill, It is most difficult to keep well.
Three or two cups of light wine, How can they ward off the strong?
Wild geese fly past, while I'm broken-hearted; But I recognize they are my old friends.
Fallen chrysanthemums piled up on the ground, So withered, Who would pluck them up



now?

Leaning on the window, How can I pass the time till night alone?
The drizzle falls on the wutong trees, Raindrops drip down at dusk.
At a time like this, What immense sorrow I must bear!

这段译作中，用两个 seeking 的重复来对应“寻寻觅觅”，倒很合适，但后面的词语选择就离题太远了。“冷清”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绝不是冷的意思，所以译成 chilly 很不妥。再下一句的“凄凄惨惨戚戚”都是 miserable 的意思，如果说与 painful 沾点边的话，跟 desolate 则有一定距离。

许渊冲先生的译本：

I look for what I miss / I know not what it is / I feel so sad, so drear /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How hard is it / To keep me fit / In this lingering cold!

By cup on cup / Of wine so dry / Oh, how could I / Endure at dusk the drift / Of wind so swift?

It breaks my heart, alas / To see the wild geese pass /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

The ground is covered with yellow flowers / Faded and fallen in showers / Who will pick them up now?

Sitting alone at the window, how / Could I but quicken / The pace of darkness that won't thicken?

On plane's broad 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 / As twilight grizzles.

Oh, what can I do with a grief / Beyond belief !

徐中杰先生的译本：

I've a sense of something missing I must seek.

Everything about me looks dismal and bleak.

Nothing that gives me pleasure, I can find.

Even the weather has proved most unkind.

It is warm, but abruptly it turns cold again.

An unbroken rest most difficult to obtain.



Three cups of thin wine would utterly fail.
 To cope with the rising evening gale.
 Myself ,into woe, a flight of wild geese has thrown.
 But with them, very familiar I have grown.
 About the ground, chnysanthemums are bestrewn.
 Gathering into heaps—bruised—withering soon.
 With myself in utter misery and gloom,
 Who cares to save them from their approaching doom?
 Standing by the window—watching in anguish stark,
 Could I bear alone the sight until it is dark?
 Against the tung and plane trees, the wind rises high.
 The drizzle becomes trickles, as even draws “nigh”.
 How, in the word “Miserable”, can one find—
 The total effects of all these on the mind!

这两个译本都没把原文第一句的特色译出来。他们用句子把李清照原文中的含蓄意味作了一番解释——如果这解释真是李清照原意的话。这样的译法剥夺了读者自己揣摩词人字面后内涵的权利。且这种译法，用一个句子来译那么四个字，是太显得费力了，与举重若轻恰恰相反。

再看最后一句，其关键字之一是疑问字“怎”，词人以一个问句来结尾。那么，词人想要问的是什么呢？问的是“愁字”，注意不是“愁”本身，是“愁”这个字，这是绕着弯儿说事。那么译者就要随着词人的思路去译。纵观前三译本，译者都没考虑到这点，就愁说愁，原味尽失；最后一个译本提到了这点，但又来个自我解释，画蛇添足。在参考前辈大家译文的基础上，笔者试译如下：

Seeking, seeking; lonely, quiet; doleful, rueful, woeful.
 When it just turns warm, but still cold, it's hardest to have full rest.
 Two or three cups of light wine, how to fend the evening wind so strong?
 The wild geese pass—I feel heart-broken—since they are my old acquaintance.
 All over the ground the yellow flowers in heaps.
 Languished as I am, who will now pick them?
 Keeping myself at the window, how can I fare alone till nightfall?
 Chinese parasol, plus drizzles on it, dripping and dripping;



At this moment, what can I do with the word “sorrow”?

在这里,笔者以七个英文词对应七对中文词。寻觅,当然用 seek 最合适;冷清,表达一种孤独的感觉,而且周围寂静,用 lonely 较好;而最后三对中文词,笔者用以“-ful”结尾的而又与中文同义的几个英文词。最后句,笔者以词人的词中的字面意思,直接提问“对这个愁字怎么办”,至于词家的含蓄意思,则让读者去自己体会了。笔者认为,这样的译法,使首尾二句读来无繁缀的感觉。

四、典故及谐音的翻译

除了成语,中文里还有许多典故。所谓典故,就是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在翻译典故时,如果不把那个故事说明,不要说外国人不理解,恐怕许多中国人也不理解。译者在翻译中碰到典故时,该怎么处理呢?如果把典故中的故事直白地放进原文的翻译里,很可能会破坏译文的整体性——不论在上下语气连接上,或意思贯通上,都会有影响。所以笔者的意见是,应把那个典故按字面意思翻译过去,同时在文末放个注解,来专述那个故事。特别在译诗时碰到的典故,更非得用注解处理不可。

譬如说“叶公好龙”(典出汉朝刘向《新序·杂事五》:“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在中文写作中,可能只提“叶公”二字,中国读者一看就知道是典故,有所指。例如:“他是叶公好画,非为画也,为其值钱。”对这个句子,我们可先根据句面意思译出来:He's like Duke Ye, fond of paintings, but not for them as art work, but for their value. 随后在篇末加注。

关于谐音及一声二读造成一词二义的情况,我以为可以基本上按照典故翻译的方式处理,即按字面意思译后,加引号,并加注解。这样可以让读者知道作者或诗人是怎样表达他们意思的。笔者举一联加以说明:

上联:昔具盖世之德;下联:今有罕见之才。

此联是写汪精卫的。正当一班专事拍马屁者对此联大加赞赏,汪精卫也洋洋自得时,有人在旁悄悄提醒,汪才醒悟自己被骂了。原来此联利用谐音,巧妙地揭露了汪精卫这个无耻之徒是“昔具该死之德,今有汉奸之才”。对比试译如下:

Having the virtues of the “whole world” before,
With the talents of the “rare traits” now.*

*Wang Jingwei was a traitor and deserved death. In this couplet, the writer used homopho-



ny in Chinese. Th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irst line meaning “whole world” have the similar pronunciation as other two Chinese characters meaning “death-deserving”. Th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second line meaning “rare traits” have the similar pronunciation as other two Chinese characters meaning “traitor”. So it reads literally as if he was praised for his virtues and talents, but the writer put in two characters in each line, using homophony, to blame him for his shameless misdeed.

说明：“盖世”，笔者译成“涵盖世上所有的”意思。而“罕见”是 rare, traits 意为“特性”，在英文里与 traitor 接近，表示才能具有“罕有的特性”，这样处理可使英文读者更能将词语联系起来，而将其理解为 with the talents of a traitor。

还有比喻等修辞，我认为也可按此原则翻译。如李白的“危楼高百尺”“白发三千丈”。如果不按字面意思翻译，就剥夺了读者知道诗人是怎样运用比喻的权利，况且“百尺”和“三千丈”也不难翻译。

五、人名地名的翻译

笔者主张人名总是音译，即使有的人名是有意义的，也不能按意思译过来，因为读上去会不像人名。要注意的是：译名用字，不能带有可使人误解或混淆的意思。例如，有人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女儿 CHELSEA 译成“雀儿喜”，居然还有人说译得好，这是不懂翻译的人在瞎捧场。因为这样翻译会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引起误解。譬如有这么句话：“雀儿喜跃草上”，究竟是一只麻雀在草上跳呢，还是克林顿女儿在草上跳呢？笔者还常看到美国中文报上经常提到美国“西东大学”。这种表述会让读者误会将译者误译为意译，会认为美国有个 West-East University，实际上这所大学是 Seton Hall University。这些错误都是译者不知道翻译原则所致。所以外国人名译成中文，所组成的字不能在中文里构成任何意义。这样就能使读者一看就知是外国人名。同样原则，中文人名译成外文形式，一般用拼音。如果要意译过去，一定会使外国人晕头转向，比如，陆翔译成 Land Fly，外国人一定由此搞出许多笑话来。

地名可以有两种译法。一是由有意义的词构成，最好意译，如美国一个地方名为 Woodbridge Township，译成“桥水镇”就非常好；再如中国的青岛，译成 Green Island Township，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外国人看多了就知道这是哪个城市了。但没有意义的地名就应用人名翻译原则去音译。不过世界有名的地名，人家早有公认的译法，译者就不能自己乱译，得上网去找。譬如日本的首都东京，英文中叫 Tokyo，不能把它音译成 Dongjing，也不能意译成 East Capital。反过来，Tokyo 也必须译成“东京”，不能音译成“托克欧”。再譬如 New York，中文里已约定俗成为“纽约”，而不能因为英文



里 new 有“新”的意思，而译成“新约”，那不成了圣经里的新约全书了吗？但 New Zealand，已约定俗成译为“新西兰”，前半意译，后半音译，依样翻译即可。

六、书名等的翻译

书名等的翻译当然该按原著的名称。如《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双城记》《傲慢与偏见》《愤怒的葡萄》《老人与海》等，都是原名。在一定情况下，也有不按原名译的。像 *Hamlet*，如果按人名音译，读者不能通过书名而知道大致内容，会减少图书对读者的吸引力。从前，这本书译作《王子复仇记》，就大致告诉了读者该书的内容，吸引力也较大。另有法国作家大仲马的 *Three Musketeers*，以前译作“三剑客”，能够招来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且书中人物经常以剑格斗，所以译成“三剑客”也差不离。后来这本书要重译，译者坚持要将书名改为“三个火枪手”，以与原书名一致。

电影片名的翻译也应该与原名一致，不过片商为招徕观众，常把片名译得更具吸引力。如老片 *Waterloo Bridge*，译成“魂断蓝桥”，而 *The Great Waltz* 译为“翠堤春晓”。那时人们追求“雅”，所以译得文艺气息浓厚。“魂断蓝桥”的翻译，总算原文里还有个“桥”字，而“翠堤春晓”大概取自影片中的某一情节，不过笔者没看过，不敢断言。

总之，这方面的情况是，学者的翻译要求忠实原文，而商人主导的翻译考虑经济效益。这二者没法统一。不过笔者此文是写给学者看的，不是写给商人看的。

同理，中文书名等译成英文，当然也须按原意来译。如《红楼梦》，有人译成 *Red Chamber Dream*；《水浒传》译成 *The Beach*。但有些中文古书，无法按意而译，只能音译。如《庄子》，本来是一个人，拿来当作书名，只能按人名原则来译了。再如《孙子兵法》，有人把“孙子”拿掉，只译“兵法”：*Art of War by Sunzi*。把“孙子”放在 by 后面，也是一种办法。至于书名等里面有典故的，只能按典故翻译原则处理。毕竟注释长一点不是问题，总不能让书名很长吧。翻译中很多问题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具体处理了，这要由译者判断怎样处理才妥善。

七、不同文体的翻译

不同的文体会产生不同的文笔和不同的笔调。反过来说，人们是用不同的笔调来写不同的文体。科技文章笔调严谨，书信体可以随意些，演说稿要说服力强，散文和小说的笔调又与上面这些都不一样。小说的笔调变化最多，因为小说的内容面最广，可以从一般叙述到人物对话，可以有书信、有诗歌。这种情况，在中文、英文里是一样的。如果把中文小说译成英文，对话要口语化，才能传神，叙述要文学化，才能感人。下面笔者就各种文体的互译作一初步的探讨。



1. 科技文章

按理说,专业文章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确切地翻译好。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去译,肯定会吃力不讨好。翻译专业文章不要求文笔怎么好,但必须百分之百地确切,绝对不能随意乱译。一词译错,意思会相差几里,从而误导读者。但并不是所有专业文章都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译者来翻译的,有的时候只需要基本常识就可以了。笔者曾帮人翻译过地理专业文章。说是专业文章,但对地理知识有兴趣的人来说,一点不像是专业文章。一般对中国人来说,英译中比中译英容易多了。不过,就地理专业文章来说,要中译英也并非难事。例如:“该地区全年降雨量为 35 毫米。” The yearly precipitation in that region is 35 millilitres. 当然,在中译英前,最好先读些这方面的英文文章,可以知道这类专业文章在英文中是怎么表达的。

有的科技文章,即使词汇都查出来了,对非专业人士来说,还是不知所云。曾有一友人要笔者帮忙翻译一篇电脑专业方面的理论性文章,笔者看了后茫然无头绪,一点儿都不知道文章在说什么,只好要他另请高明。笔者另一个有趣的经历是:一个医生朋友要笔者翻译一篇医学方面文章。医学虽然是一个专业,但只要译者有较多的医学常识,要英译中还是能够应付的。由于笔者手边没医学专业词汇字典,只能把找不到中文相应词语的英文单词,放在译成的中文句子的相应位置上——gastroscopy 的应用能帮助医生很快确诊病情——这样的半成品到了那个医生朋友的手里,他会找到相应的中文词语的。

2. 书信

书信的翻译,就其内容来说,只要把意思译过去就可以了。这里笔者主要想谈谈书信的开头和结尾。英文书信称呼总是以 dear 开始,尽管收信人对你来说一点也不 dear,甚至是个冤家对头。由于现在国人学了外国人的习惯,写信也总是以“亲爱的”开始,所以在翻译上也就省事了。但如果碰到以前史料或资料里的中文书信,完全是旧体格式,那麻烦就来了。

例如旧体格式中,儿子写给父母的信经常以此开头: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就算以没有错误、符合规范的英语 my respected father and mother, your son report on my knees in esteem 来译,听上去也非常可笑。这里要说明一下,“大人”乃是尊称,大人不能译成 my big father and mother,此处使用 respected 一词,表示“应尊敬的”,用在需表示敬意的人身上。“膝下”表示不敢与父母平起平坐,须屈身于父母膝下来说话。可认为跪在地上说,所以 on my knees。“禀”者,报告也,下对上之谓。所以用 report。“敬”,即带着敬意告禀, in esteem。但按英文习惯,亲人之间,即使是尊长,也不用 respected 一词,而用表示亲热的词,一般就用 my dearest mother and father。如果读者们读过中文旧体尺牍,可知称谓变化多端。但在英文中,根据熟悉及亲密程度,



分别选用下列四种即可: dear, my dear, dearest, my dearest。至于英文书信译成中文,当然不用译成旧体格式,就按一般翻译即可。

中文书信结尾常有问候语,旧体中变化也不小。较简单的如:敬候春安、即颂大安、顺颂文安;写给编辑的就来个“编安”;写给父母的就要说“叩请金安”或“福安”;现代人写信,不管对方是谁,最后来个“祝好”。到了英文中,可选用下列四种: good wishes, good regards, best wishes, best regards, 放在信结束后空一行的位置上。

中文信里在最后签名的上方,常有表示写信人身份的词语,如“儿”“妻”或“你的友人”。英文中,亲人之间用 yours affectionately; 如果对方属于较受尊敬的人物,可用 yours respectfully; 一般人可用 yours truly, faithfully, 或 sincerely。现在电信里,简化为 sincerely, truly。下面仅举一例,以旧式书信体写就:

王兄鉴:

未获讯闻,数月于兹。谅阖家均安,为颂。近闻李兄传言,足下已于本月结缡。新婚燕尔,不知尚念及老友乎?余所憾者未获邀出席观礼耳。但余省下婚仪,故两不相欠也。便中请惠下数行为盼。祇颂

近安。

某某谨启

年月日

译成英文如下:

month, date, year

Dear Mr. Wang,

It's several months that I haven't heard from you. I hope your family are all well. That's my earnest wish. Recently according to Mr. Li, you got married this month. Do you still remember your old friend in your honeymoon? I felt a regret that you didn't invite me to your wedding, which saved me the cost of wedding gift. So we are even now.

Please drop me a line when you are free.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so-and-so

3. 演讲稿

演讲稿除了达意,还要讲究语气。如果原文带有鼓动性,译文也不能平淡,要译得简洁,不要拖泥带水,要像译者自己在对人演讲一样。如林肯的演讲稿 The Gettysburg Address: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 not dedicate—we can not consecrate—we can not hallow—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父老们在这个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中，奉献于人“生而平等”之信念。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内战，以测试这个国家，或任何如此孕育着和如此奉献着的国家，是否能长久永存。我们相逢于这场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我们来奉献这个战场的一角，作为那些牺牲生命者的长眠之所。他们的牺牲使得这国家得以存活。所以我们应该这么做。这是完全合适的。但是，就广义来说，我们不能奉献，我们不能献祭，我们不能神圣化这块土地。因为那些在此战斗的勇士们，不论生者死者，已经神圣化了它，这决非我们微小的权力可以增减的。这世界不会注意，不会长久记得我们在此说些什么，但这世界不会忘记他们在此做了什么。对我们生者来说，要在此奉献于死者未竟之事业。那些在此战斗的人们已经把这项崇高事业推进至此。对我们来说，要在此奉献于前人留下的伟大任务。所以我们要从那些荣誉的死者身上，接过对这事业的进一步贡献。为此，他们做出了最后全力的奉献。所以我们要在此下极大的决心：那些死者不会白死。让这个上帝庇护下的国家，在自由中新生。让这个属于人民的、由人民支持的、为了人民的政府与地球同在。

笔者在此做几点说明：①在达意情况下，用字尽量精练紧凑。去掉可有可无之字，读起来才会显得不拖沓而有力。如果开头译成“在八十七年以前”，读上去就显得松散。②英文结构中可以短语接短语，从句接从句。但在中文结构里，却不可以这样，



这不符合中文惯例。所以,对较长的英文句子,就得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切断,在中文里另起一句。③翻译前,先通读几遍原文,熟悉全文,得到其神髓,才能译出其精神。译者着手翻译时,先把每句意思吃透,分成几个层次,再考虑怎样把意思一层层译成中文。

同样,中译英也要考虑这些原则。笔者从一篇演讲稿里摘录了有趣的一段,试译一下。因无法联系演讲者,在此致谢。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成功靠什么?靠努力,没错。但我听过一句话,更震撼,成功靠勉强。请仔细咀嚼体会其中涵义。所以说,如果我今天站在台上,有任何一丝勉强,那表示什么?表示我离成功又更近了一步。

Let me ask everyone here a question: on what success depends? On efforts. That's right. But I heard someone say, very shocking, that success depends on reluctance. Please carefully chew the meaning behind the words. So if I'm standing here today on this platform with slight reluctance,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that I am one step closer to success.

4. 散文随笔等

散文(essay)的文学性较强,但其笔调又不同于小说。翻译散文时,译者应对两种语言都要有较强的文学修养,译来才能得心应手。比如以下这篇文章:

陋室铭

(唐)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AN EULOGY ON MY HUMBLE ABODE

by Liu Yuxi of Tang Dynasty

Known will the hills be if fairies dwell, no matter high or low; and charmed will the water be if dragons lurk, no matter deep or shallow. A humble abode though this is, my virtues make it smell sweet. Verdant are the stonesteps overgrown with moss, and green seems the screen as the grass seen through it. I chat and laugh only with great scholars and have no intercourse with the ignorant. I can play lute and read my sutras. No unpleasant music to grate on my ears and no red-tape to weary my mortal form. Zhuge's cottage in Nanyang and Ziyun's pavilion in



Xishu are both like what Confucius quoth, “How can it be humble?”

说明：中文里用了排比句，译文里当然也要用排比句以作对应。请别说英文里不用排比句。有美国文学之父之称的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游欧杂记》（*The Sketch Book*）里就有许多排比句。请看这一段：

How many bright eyes grow dim — how many soft cheeks grow pale — how many lovely forms fade away into the tomb, and none can tell the cause that blighted their loveliness! As the dove will clasp its wings to its side, and cover and conceal the arrow that is preying on its vitals, so is it the nature of woman to hide from the world the pangs of wounded affection.

因为两种语言的不同，英文中排比句写来没有中文里的工整，但至少能在英文中看到排比的形式。

下面再看看英文里的散文怎样译成中文较好：

ON ETIQUETTE（论礼仪）

Etiquette is to society what apparel is to the individual. Without apparel men would go in shameful nudity, which would surely lead to the corruption of morals; and without etiquette society would be in a pitiable state and the necessary intercourse between its members would be interfered by needless offences and troubles. If society were a train, the etiquette would be the rails, along which only the train could rumble forth; if society were a state coach, the etiquette would be the wheels and axles, on which only the coach could roll forward.

The lack of proprieties would make the most intimate friends turn to be the most decided enemies and the friendly or allied countries declare war against each other. We can find many examples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A duke of Song Dukedom in East Zhou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was killed by his favorite knight for a joking word. Therefore, I advise you to stand on ceremony before anyone else and to take pains not to do anything stupid against etiquette lest you give offences or make enemies.

礼仪之于社会犹如衣服之于个人。没有衣服，人们会以蒙羞的裸体走动，那必将会导致道德的败坏。没有礼仪，社会将处于一个可叹的状态，而成员间的必要交往也将因不必要的得罪和麻烦而受到干扰。如果社会是一列火车，礼仪就是轨道，只有沿着轨道，火车才能轰奔前进。如果社会是一辆马车，礼仪就是轮子和轴，只有靠轮子和轴，马车才能滚滚向前。



缺乏礼仪会使最亲密的朋友变成最不可挽回的敌人,可使友好或联盟的国家相互宣战。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在古代中国东周时有个宋国,宋公就是因为一句笑话而被他宠信的一个武士杀了。所以我劝告你们要在任何人面前都保持礼仪,要尽力防止自己去做任何违反礼仪之蠢事,免得你得罪人或树敌。

说明:在第二段第一句中,英文可以用一个主要动词,后面跟个人和国家两个情况。但在中文里,必须重复用动词“使”。又如,decided一词在英文里意为“坚定的”,但如果在中文里说:“会使最亲密的朋友变成最坚定的敌人”,实在不是好的中文表达。这里换成“不可挽回”,就更好了。这样处理,意思并没有改变,属于同义词的灵活换用。

5. 小说

小说的文学性是最强的,内容可涉及各种文体。所以译者翻译小说要具备广博的知识,以及能翻译上述各种文体的能力。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还要考虑到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和说话的语气等,如果小说中人物说话文绉绉的,译成的中文也要文绉绉;小说里人物说话粗俗,译成的中文也要粗俗些,否则岂能传神?这在英译中里,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中文是译者的母语,那些粗俗语、骂人话,即使译者本人从不说,平时听也听多了,不会写不出。问题是,当要中译英时,英文里的粗俗语、骂人话实在不容易知道,该怎么翻译呢?这的确是个难题。即使对海外华人来说,如果没接触过下层社会人物,就算在国外生活几十年,也还真的不知道这种话。唯一能得到这种资料的途径只能是观看外国电影和阅读外国人写的小说了。

有本较古典的小说,乃英文名著,叫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恐怕大家都知道,甚或很熟悉。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警句: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该书有几个译本。我认为翻译得较好的是王科一的译本。其一,书中主要人物为庄园主 Bennet 一家。他太太称他为 Mr. Bennet。如果直接译成班奈特先生,在中文里有点怪,因为中国人不会直接称呼自己的丈夫为某某先生。既然他是庄园主身份,译者就把他译为班奈特老爷。在过去的中国,有钱人家的妻子确实会称呼丈夫为老爷,这就是合适性的灵活运用。一般来说,在不违反忠实的原则下,翻译有时也得双向考虑,以增强译后终端文本的可读性。其二,班奈特老爷有个远亲是个书呆子牧师。等老爷死后,按当时的法律,他将继承班家产业。他听说班家有五位漂亮的女儿,就想要娶其中一个。他就写了封信给班老爷,说要来拜访。这封信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亮点。其内容也只有一个书呆子会写。所以这封书信在描述人物性格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



Dear Sir,

The disagreement subsisting between yourself and my late honoured father always gave me much uneasiness, and since I have had the misfortune to lose him I have frequently wished to heal the breach; but for some time I was kept back by my own doubts, fearing lest it might seem disrespectful to his memory for me to be on good terms with any one with whom it had always pleased him to be at variance. My mind however is now made up on the subject, for having received ordination at Easter, I have been so fortunate as to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patronag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Lady Catherine de Bourgh, widow of Sir Lewis de Bourgh, whose bounty and beneficence has preferred me to the valuable rectory of this parish, where it shall be my earnest endeavour to demean myself with grateful respect towards her ladyship, and be ever ready to perform those rites and ceremonies which are instituted by the Church of England. As a clergyman, moreover, I feel it my duty to promote and establish the blessing of peace in all families within the reach of my influence; and on these grounds I flatter myself that my present overtures of good-will are highly commendable, and that the circumstance of my being next in the entail of Longbourn estate will be kindly overlooked on your side, and not lead you to reject the offered olive branch. I cannot be otherwise than concerned at being the means of injuring your amiable daughters, and beg leave to apologise for it, as well as to assure you of my readiness to make them every possible amends, —but of this hereafter. If you should have no objection to receive me into your house, I propose myself the satisfaction of waiting on you and your family, Monday, November 18th, by four o'clock, and shall probably trespass on your hospitality till the Saturday se'nnight following*, which I can do without any inconvenience, as Lady Catherine is far from objecting to my occasional absence on a Sunday, provided that some other clergyman is engaged to do the duty of the day. I remain, dear sir, with respectful compliments to your lady and daughters, your well-wisher and friend,

William Collins

*When Mr. Collins declares that he will “trespass on your hospitality” from “Monday, November 18th” to “the Saturday se'nnight following”, this means he will stay twelve days, until November 30th, the first Saturday which is more than a week after his arrival (“Saturday week” in modern British English). His visit is timed so that he will only have to find a clerical substitute for one Sunday.

亲爱的长者：

以前您为（与）先父之间曾有些芥蒂，这一直使我感到不安。自先父不幸弃世以来，我常常想到要弥补这个裂痕；但我（有）一时（因）犹豫，（而）没有这样做，怕



的是先父生前既然对阁下唯恐仇视不及，而我今天却来与阁下修好，这未免有辱先人。不过目前我对此事已经拿定主张，因为我已在复活节那天受了圣职。多蒙已故的刘威斯·德·包尔公爵的孀妻咖苔琳·德·包尔夫人宠礼有加，恩惠并施，提拔我担任该教区的教士，此后可以勉尽厥诚，恭待夫人左右，奉行英国教会所规定的一切仪节，这真是拜（我）三生不（有）幸。况且以一个教士的身份来说，我觉得我有责任尽我之所及，使家家户户得以敦穆亲谊，促进友好。因此我自信这番好意一定会受到您的重视，而有关我继承浪博恩产权一事，您也可不必介意。并请接受我献上的这一枝橄榄枝。我这样侵犯了诸位令媛的利益，真是深感不安，万分抱歉，但请你放心，我极愿给她们一切可能的补偿，此事容待以后详谈。如果您不反对我踵门拜候，我建议于十一月十八是（日），星期一，四点钟前来拜谒，甚或在府上叨扰至下星期六为止。这对于我毫无不便之处，因为咖苔琳夫人决不会反对我星期日偶尔离开教堂一下，只消有另一个教士主持这一天的事怀（情）就行了。敬向尊夫人及诸位令媛致候。您的祝福者和朋友

威廉·柯林斯

（注：括号中字乃笔者改正或补充之字。）

中文小说译成英文当然更难，因为要在英文里表达出人物的生动描述及各种对话的语气，对中国译者来说，很不容易。现在请大家试看红楼梦译本之一小段，以见一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谷歌中搜索到的译本：

Four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twenty-three years ago the heavens were out of repair. So the Goddess of Works set to work and prepared 36,501 blocks of precious jade, each 240 feet square by 120 feet in depth. Of these, however, she only used 36,500, and cast aside the single remaining block upon one of the celestial peaks. This stone, under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had become, as it were, spiritualised. It could expand or contract. It could move. It was conscious of the existence of an eternal world, and it was hurt at not having been called upon to accomplish its divine mission.



此译文实际上是对故事情节的叙述，还要加些补充，不能看作翻译。以下是另一版本的译文：

The Empress Nu Wa (the goddess of works), in fashioning blocks of stones, for the repair of the heavens, prepared, at the Ta Huang Hills and Wu Chi cave, 36,501 blocks of rough stone, each twelve chang in height, and twenty-four chang square. Of these stones, the Empress Wa only used 36,500; so that one single block remained over and above, without being turned to any account. This was cast down the Ching Keng peak. This stone, strange to say, after having undergone a process of refinement, attained a nature of efficiency, and could, by its innate powers, set itself into motion and was able to expand and to contract. When it became aware that the whole number of blocks had been made use of to repair the heavens, that it alone had been destitute of the necessary properties and had been unfit to attain selection, it forthwith felt within itself vexation and shame, and day and night, it gave way to anguish and sorrow.

笔者不知两个译者为什么都要把女娲译成 Goddess of Works。中国神话中，宇宙原来是混沌一片。后来盘古开天辟地，气之清者上升为天，气之浊者下沉为地。再后来女娲用泥土造了人。传说共工与祝融因吃天鹅蛋之争，共工撞不周山，天塌洪水泛滥，女娲乃有补天之举。关于量度单位“丈”，一直没有统一的译法。有的译者将其换算成英制或公制单位，有的译者就把单位名称音译过去。笔者以为音译法使外国读者毫无概念，不足取。笔者不才，也将此段文字试译于下：

Long ago when Goddess Nuwa shaped stones to fix the heavens, she made 36,501 cubes of common stone, each 40 meters high and 80 meters square, at the Wuji Cliff of Mount Da-huang. Goddess Wa used only 36,500 cubes, one left unused and deserted at the foot of Qing-gen Peak of that mountain. No one knows that this cube of stone, after refinement, developed human intelligence. When it came to know that other stones had all been employed for the repair of the heavens and only itself had been left in the cold as a useless one, it, therefore, sighed with a self-pity and wailed in shame day and night.

6. 诗词

诗是语言运用的最高境界。诗的语言应该是最精练、最有节奏的语言。所以，诗的翻译更难于散文的翻译。在语言的精练方面，古代诗比现代自由体诗更明显，不论



中文诗或英文诗都一样。这是因为古代的写作语言结构与现代的写作语言结构不一样。先谈中文,古代语言中用四个字就能表达的意思,在现代白话文中须用多于四个字来表达,于是这个精练性就丧失了,但这种表达获得了通俗性,故而有得有失。但对写诗所要求的精练性来说是不够的。

(1) 诗是否能翻译

有人说诗是不能译的,因为译到另一种语言里去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原诗的风味。这句话说了等于白说。不同的语言当然有不同的风味。唐诗译成英文,难道还会有唐诗的风味吗?如果因为这种情况而说诗不能译,岂非因噎废食?所以诗还是要译的,中译英或英译中的终端诗,要希望还保持原诗的风味,那是休想,但译后的文字间保有另一种语言里的诗味,这是应该的。如果到了另一种语言里没有诗味,就不是诗了。

(2) 外国人能译中国古诗吗

有些国人确实有这个疑问,但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戇大腔”。有的外国人甚至看得懂《老子》,还有的在学《易经》。如果有的外国人在学唐诗,对他而言翻译应该不成问题。反过来,中国人也不是个个能译唐诗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译者是哪国人,而在于是否能够通过学习获得这种翻译能力。

(3) 关于“诗人译诗”

现今有一种说法:只有诗人才能够译诗,或者说得更明确些,只有本身也是写诗的人才能把诗译得好。推其理由是因为诗人有诗感,可以使得被译成的诗也具有诗意。理论上来说,这句话可能有些道理。试想:不会写诗的人,甚至可能不知诗为何物,如果去译诗的话,很可能译得走样,甚至不知所云。不过,这种说法得加一个条件才能成立,即:这个诗人要对两种语言里的诗体都有一定的造诣。否则,这跟非诗人译诗有什么两样呢?这里还要弄清一下诗人的定义。怎么样的人才算是诗人呢?如果说曾出版过诗集或在公开发行的诗刊上登过诗的人才算诗人,那么平时写诗,但无缘出版的人,算不算诗人呢?后者的诗可能写得比前者还要好。再有,出版在纸质媒体上的诗作,如果只是散文分分行,实际上毫无诗意,这种人是不是有资格被称为诗人呢?他们即使懂得些外语,能否真正把诗译好呢?所以,笔者认为只要对两种语言有深厚造诣的人都有资格译诗,不管是否有诗人的“头衔”。

(4) 英文诗里有诗用语法吗

练习中诗英译的人会觉得诗行里对语法的要求跟写一般文章不一样,所以怀疑诗中是否有诗用语法。其实,确切地说,诗歌并无一套特殊的诗用语法,而是有一些适于诗行形式的惯用法。譬如:①每行诗不一定都要用完整句,也可以用不完整句,达意即可,如 A red, red rose, 就成一行诗。有时动词出现在第二行,如 Grows in my garden. 有时第二行也未必有动词,如 In a secluded place. 所以,诗行经常出现非完整



句。②诗行里容许对平时写作时的正常词序做一定的颠倒，以押韵或符合格律的需要。但这种颠倒必须符合阅读习惯，颠倒后要仍可以理解，不能乱颠倒。例如：A love / ly rose / that grows / in a / seclu / ded place。其中 that 的插入是为了要个轻音节，以至后面 grows 成了从句。不过在第二句里完全可以加个主要动词。如果 grows 要与下句押韵，则必要颠倒词序，如 In a / seclu / ded place / a love / ly rose / that grows。这样把地点状语颠倒至句首，还是符合惯例的。但不能这样颠倒：A love / ly rose / in a / seclu / ded place / that grows。因为那样，that grows 似乎被用于修饰 place。这种颠倒的惯例是：状语可以前后置放，主谓语可以颠倒。如：In a / seclu / ded place / now grows / a love / ly rose。有时，形容词可颠倒而放在名词后面，如：a rose so lovely grows in a secluded place。如还有其他颠倒情况，大家请读英文诗时注意，这里不一一列举。

(5) 中英古诗比较

在中英诗的互译中，先得把这两种诗对比一下，庶可知道该怎样翻译。英文古诗正如中文古诗一样，是有格律和韵的 (Meter & Rhyme)。常以四行 (Line) 为一节 (Stanza)，每行分成音步 (Foot)，常用有四音步、五音步、六音步等。每一音步中，有两个音节或三个音节。音步中的常用格律有抑扬格或短长格 (Iambus，两个音节，一轻音+一重音)；扬抑格或长短格 (Trochee，一重音+一轻音)。其中抑扬格是最常用的。其他较不常用的格，这里暂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英诗中的长音或扬音，可对应于中文古诗里的平声，而其短音或抑音，可对应于仄声。当然对平仄的安排和长短音的安排，在两种语言的诗歌中是不同的。

英诗中韵的格式，以四行来说，可以有 AABB，ABAB，ABBA，AABA 几种。行数越多，可变性越大，就像数学中的排列组合一样，但这种排列组合限于一个诗节之内，其后的诗节往往重复。这与中文古诗里有押韵一样，只是格式不同。

中文格律体诗里句数固定，每句中字数固定，并且平仄声字交替使用，当然读来音韵铿锵，节奏感强，而在现代白话诗中，句数不定，字数不定，也不讲究平仄声的使用，如果一句中有七个字，都用仄声字也无所谓，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读得比古体诗更悦耳动听。这种情况在现代英文诗中也有。从语言写作结构来说，现代英文比古代英文简短精练，但从诗来看，古代英诗讲究音步及轻重音节的交替出现，类似中文古体诗中的平仄，而现代英诗非但不必押韵，而且句数字数都可以不固定，轻重音节交替也任其自然，不像在古诗中有规律。所以，现代英诗读起来也没有古代英诗好听。有些现代英诗的一行句子很长，怎么也读不出诗的韵味来，幸好这种情况不常见。

诗的翻译当然比散文的翻译对译者的要求高。但许多格律体诗与现代诗的翻译几乎没有差别，也就是说，译者只需把原诗按意思互译成自然的长短句形式，而不用考



虑原诗是古体诗或现代诗。甚至有些押韵的原诗，到了译诗里就没有了韵，而有些像分行的散文。这是最差等的翻译。俗话说“人往高处走”，作为译者当然要追求最优等的翻译。这在古体诗的互译中最能体现出来。所以笔者一直试图用古典诗体形式来翻译另一种语言的古典诗。同时，翻译必须忠实原意，意思要扣得准，这就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如译诗的意思走了样，还不如自己写，何必搞翻译，且也对不起原作者。这是笔者在翻译中的第一个自我要求。此外，笔者还要求自己在译诗时做到形式上的美观统一和音韵上的和谐优美。译诗也要达到诗般的语言境界，才能与原诗媲美。

(6) 举例探讨

1) 中译英

以下是两首中文古体诗词译成的英文诗。请先看中文原诗。第一首乃唐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原诗如下：“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诗已有外国人译过，译文如下：

A morning rain has settled the dust in Weicheng,
Willows are green again in the tavern dooryard.
Wait till we empty one more cup,
West of Yang Gate there'll be no old friends.

此诗已基本将原意译出，但不知为什么要用 dooryard 一词，原诗中似乎没提到，且 Weicheng 也反映不出是什么，加之句式也不太整齐（指音节多少而言），又不押韵，所以尚可改进。笔者以为，外国人翻译中国诗词，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外国人很少能深刻理解中国诗词的文化背景及遣字造句的内涵。即使有中国人在一旁帮助讲解，也得看这个中国人对诗词有多少研究。否则也属“隔靴搔痒”，虽然薄一点，但还是隔着一层。现在笔者将这首诗试译如下：

The morn rain o' Wei Town has laid the light dust clean;
And willow trees around the inn look fresh and green.
A cup of farewell yet, oh you, I do entreat,
For West across Yang Pass, and friends but seldom meet.

这首译诗采用了古典英诗格式中的六音步（Foot）抑扬格（Iambic）。所以每行中有十二个音节。译诗第一行里有一个撇（'），表示省去一个字母。这里省去一个辅音“f”，即“of”，是古典英诗中常用的形式，用在这里更有古味。笔者这里采用的是



AABB 押韵形式，即每两行结尾用相同的韵。“Morn”是“Morning”在诗里的简略形式，可省去一个音节。“城”字译成“town”，比音译好，音译是没有其他办法中的办法，如人名只能音译，在译诗歌时一般最好采用意译，外国人较能理解。“lay dust clean”乃一习语，说明雨把尘埃清扫掉了。原诗中有“轻尘”，所以用“light dust”。本诗里用“willow trees”，而不用“willow”，是为了多放置一个音节，也使轻重音可交替出现，构成抑扬格。原句中有“新”字，所以这里用上“fresh”一字。“A cup of farewell yet”就是“one more cup”的意思，但套用了 Burns 的 Auld Lang Syne 一诗中“we’ll take a cup o’ kindness yet”的结构，更显古朴，且构成抑扬格。这可看作英文诗里用典的一例。“oh you, I do entreat”是诗中常用的颠倒词序，目的是押韵。正词序应为“I entreat you”。“do”在这里是加强语气。“entreat”有“要求”之意，在中文里也可理解为“劝”。语气词“oh”在这里的目的也是添加一个音节，加上一个语气词，不影响诗歌含义，同时使译诗读起来更朗朗上口。“For”在句首，意思是“因为”，原诗中有这层意思，而且用了“for”又可在句首构成一个轻音节，使重音落在“west”上。“across”有“在另一边”的意思，意为“到了关外”。中文里的“关”字在英文里常用“Pass”。“but seldom”意为“几乎不能”，与原诗中的“无”字意思非常近，读上去比单用一个“no”字更好听。

第二个例子是唐代孟浩然的《春晓》。原诗如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此诗也有外国人翻译过。译诗如下：

I awake light-hearted this morning of Spring,
Everywhere round me the singing of birds;
But now I remember the night, the storm,
And I wonder how many blossoms were broken.

原诗没有“心情轻松”的意思，不知译者为什么放上“light-hearted”一词，而“风雨”也未必指“storm”。由此可见，且不论押韵与否，外国人译中国古诗在达意方面总是差了一点。笔者试译此诗如下：

I wake up at the dawn of Spring,
And hear the birds ev'rywhere sing.
As sounded the wind and rain o'er night,
I wonder how many blooms alight.

这首译诗的押韵模式也是 AABB。为四音步抑扬格。其中一撇（'）的应用，在



第二行里省掉一个元音“E”，即可省去一个音节；在第三行里省掉一个辅音“v”，使“o'er”变成一个音节，也等于省了一个音节。第三行是倒装词序，应是“the wind and rain sounded”。句首“as”表示“原因”，原诗中隐含着这个意思，用在这里使第三、第四两句在语意上起连接作用。第三、第四两行中都多了一个轻音节，这在译诗中是容许的，就像中国古诗里的拗句一样。第四句句末的“alight”作动词，意为“落下来”，与上句末字押韵。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词应该怎么译才好。下面是南宋辛弃疾的一首词《采桑子》。原词如下：“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此词未见有外国人译过，笔者英译如下：

When young, I don't have any notions what woes really mean;
Just love to get on floors so high.
Just love to get on floors so high;
To write new poems, I try to say the words of woes and spleen.

But now I fully have ideas of what woe really is;
About to speak, but hold it back.
About to speak, but hold it back,
I only could say how good is Autumn, so cool it is.

这首译作也采用了抑扬格，但原词是长短句，所以译作也采用长短句。长句有十四个音节，构成七个音步；短句有八个音节，构成四个音步。这样，在形式上也扣住了原词。看上去似乎是两个音节相应于一个汉字。这也是一种高难度的自我要求。再看一首选自“革命烈士诗抄”中一位在上海龙华监狱里遇难的无名烈士的遗诗。原诗如下：“龙华千古仰高风，烈士身亡志未终。墙里桃花墙外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笔者译诗如下：

Sublime's the deed for ages Longhua admired;
The great will lives on though the hero died.
Blood within the walls and peach blossoms without;
In red and freshness they will both abide.

此诗押韵采用 AABA，对应于中文诗，第三句不押韵。“高风”当然是 sublime



deed。“千古”可以有不止一种说法，但音节要尽可能少，所以用 for ages，一轻一重。“仰”就是 admired，虽然读音与下面两个韵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但从宽韵的角度讲，还是过得去的。第二行中的 will 是名词，解释“意志”。“志未终”是未完成。“未完成”在英文里当然有这个说法，但用 lives on 更生动，也包含了“未完成”之意。最后行中 abide in 意为“存在于”。中文里“一般鲜艳一般红”，就是“共存于鲜艳和红的状况中”，这样表达使英文诗意更浓。再例如北宋王安石的《梅花》。原诗如下：“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笔者译诗为：

At a wall corner some plum trees grow;
Alone 'gainst cold white blossoms blow.
Aloof one knows they aren't the snow,
As faint through air soft fragrances flow.

此诗用四音步抑扬格，主要在诗首诗尾用了头韵和相同的尾韵，显得整齐。此属巧合。不可能首首诗都这样。其中 gainst 前的 “'” 省掉了 a，少个音节。此译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被刊登于《英语学习》杂志。

这种译法也有其缺点。上述几个例子也有巧合的成分在里面，因为翻译诗词，又要讲究押韵和格律，经常会有颠倒情况，有时他要加些什么，或漏掉些什么。在译诗里加些英文词是为了凑足音节，而漏掉一些词也是为了使诗句不多于规定的音节数。如唐代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笔者英译如下：

The Yellow River far up in white clouds Rises,
The single small town lost among peaks myriad feet high.
The Tartar flute mustn't play the tune of “Willow Snapping”,
Since the spring wind the Jade Gate Pass never crosses.

第一行里为了押韵有个倒装。第二行里的 small 是多余的，因为原文中没有说那个城的大小，是为了凑个音节。第二、三行应该押韵，但为了不使音节超标，也不能因为要押韵而改变原文意思，所以只能放弃押韵。且第三行中“怨”字也未译出。所以这首译诗达意不够确切。确切达意的原则是不能多词，当然也不能少词。如：唐朱庆馀的《宫中词》：“寂寞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笔者之英译如下：



The flowers in the quiet time with the gate shut,
The beauties, in jade pavilion, standing,
Want to say things' bout palace with feeling,
But speak before the parrot, they dare not.

主要问题是第二行里的“相并”两字，如果译成 *together standing*，就要多出三个音节，破坏了这行的格律。所以只能把“相并”两字丢掉不译。由此可见，要按英诗的格律押韵来译，也会产生问题。最近笔者正在试图不用英诗的格律和押韵方式来译，以达意确切简洁为主，当然诗行也要考虑有一定的起伏。仅举一例：“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英译如下：

There's a beauty, wow!
Can't forget once seen.
If not see her for a day, oh,
I'll go mad thinking of her.

第一行中，“兮”字也译作 *wow*。看到这么一个美人，当然会发出惊叹 (*wow*)。第二行简洁到头了，再也不能少一词。第三行用 *oh* 来译那个“兮”。第四行这个 *I* 不能省。第二行中 *I* 可以不要，因为任何人会对美人“见之不忘”，却不可能人人“思之如狂”。这里指的只能是个特定的人，当然就是写这节诗的人，即 *I*。这首译诗里没有多一词，也没有少一词。

2) 英译中

再看古典英诗如何译成中文诗为好。听说曾有人把莎士比亚的剧本译成中文的京剧唱本形式。这肯定比译成白话文句子要难，也是一种高难度的自我要求。而本人也尽量采用中文诗里的古典形式来译古典英诗，以求得一致。第一首原诗为：

Dirge Of Love

by Shakespeare

Come away, come away, Death,
And in sad cypress let me be laid;
Fly away, fly away, breath;
I am slain by a fair cruel maid.



My shroud of white, stuck all with yew,

O prepare it!

My part of death, no one so true

Did share it.

Not a flower, not a flower sweet

On my black coffin let there be strown;

Not a friend, not a friend greet

My poor corpse, where my bones shall be thrown.

A thousand thousand sighs to save

Lay me, O where

Sad true lover never find my grave,

To weep there.

译诗如下：题为“爱之挽歌”

无常尔来矣，置我于柩床。一息已云绝，杀我乃姣娘。

麻经与紫衫，速备慎毋忘。无人爱我深，乃肯殉我亡。

竟无一好花，撒余灵柩旁。竟无一良朋，吊余埋骨场。

不须为余泣，葬余在遐荒。亲友无觅处，免其徒悲伤。

译诗采用了五言古风形式，当然没有平仄，只押韵。译诗基本上译出了原诗之意，读者不必每字紧扣。如果不对照英文原诗，该中文译诗读起来仿佛就是一首原创的中国古风诗。

第二首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TO HIS LOVE

by Shakespeare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Sometime t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 declines,
 By chance, or nature's changing course, untrimm'd.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e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e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est.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译诗题为“致其所爱”。译诗如下：

我欲将君比夏昼，君更娇艳更媚柔。疾风吹摇五月蕾，夏日苦短行矣休。
 时或骄阳何炎炎，常见金乌遭遮掩。美人之美易消逝，偶失天夺亦可怜。
 君之常夏永不逝，君之花容能久驻。阎罗终未拘君去，不朽君因不朽句。
 世间有人眼能瞬，我诗长存君并存。

译诗基本上扣住原诗的意思，且用了十四句，每句对应于原诗的一行。翻译诗无法再用平仄。能用上平仄的，一定是巧合。否则就会意思不能紧扣。笔者认为扣住原意是最要紧的，能押韵尚在其次，能否符合平仄律，则纯看是否能巧合了，不必强求。译诗首四句押一个韵；第二个四句押另一个韵；第三个四句押另一个仄韵；最后两句押韵。“瞬”字本是“鹰瞬”之意，这里借用来作“人眼看”。按国内出版的“新编诗韵”，属十五痕，可与“存”字押韵。译诗又要达意，又要押韵，不太容易，只能照不同的韵书押。总算有个根据而已。如果最后两句不求押韵，用个“视”来代替“瞬”，则较自然。现在再看一首无名氏的诗，如下：

A DILEMMA

Lady, when I behold the roses sprouting,
 Which clad in damask mantles deck the arbors,
 And then behold your lips where sweet love harbors,
 My eyes present me with a double doubting:
 For viewing both alike, hardly my mind supposes,



Whether the roses be your lips, or your lips the roses.

这是一首英文中较古的诗。第二行中“clad”是“dressed”的意思。“which”是指“roses”，后面的“deck”是动词，“装饰”之意。“double doubting”意为“双重怀疑”。译诗题为“双关词”（原语意为“双关语”，用“双关词”可带有古意）：

美人兮余见蔷薇开，开绚烂兮缀亭台。观卿唇兮撩人情怀，余目惑兮费疑猜：
彼同此兮余竟莫知，蔷薇卿唇兮抑卿唇乃蔷薇？

译诗每句对应原诗各句，基本上表达了原诗的意思，因无法用五言或七言来译，所以只能用骚体（即仿屈原“离骚”之体，故称“骚体”）。译诗前四句押一个韵，后两句押另一个韵。所以中文译诗该采用的体裁，要根据不同情况而定。又例如下：

COUNSEL TO GIRLS

by R. Herrick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
Old Time is still a-flying: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will dy dying.

The glorious Lamp of Heaven, the Sun,
The higher he's a-getting,
The sooner will his race be run,
And nearer he's to setting.

That age is best which is the first,
When youth and blood are warmer:
But being spent, the worse, and worst
Times, still succeed the former.

Then be not coy, but use your time;
And while ye may, go marry:



For having lost but once your prime,
You may for ever tarry.

原诗中 ye 是 you 的古体,“a-”用于代替介词,表示“正在”的意思,是古典英诗中常用的形式。笔者将其中译如下,诗题译为“劝女于归”:

采采蔷薇,及彼未萎;日月其迈,韶华如飞。
今夕此花,灼灼其姿;翌日何如,将作枯枝。
朝曦灼灼,灿若天灯;其光熠熠,载耀载升。
弥高其行,弥短其程;日中必昃,言曛言暝。
年当破瓜,妙龄之佳;精血方盛,及春年华。
一旦虚度,将自怨嗟;韶光如旧,爰征以遐。
劝汝莫羞,及花仍稠;采之拮之,觅一良俦。
韶华易逝,岁月难留;良辰一误,永无好逑。

笔者把此英诗译成四言的诗经体形式。英诗的每行译成两个四言句,并按诗经体的要求押韵换韵,也尽量采用诗经中的用语形式,使译诗也带有盎然古意。现在的译者把不管是古典英诗或现代英诗,一律译成现代白话体新诗形式,容易是容易了,风味就消失殆尽。不过,如果白话文译得精练些,有节奏感,又押韵,倒还可取。

[作者简介] 海外逸士(吴兴禄),男,双语作家及诗人,加州“名诗人俱乐部”荣誉诗人,文心社资深社员,名列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的“美国名人录”。研究方向:诗词古文,英文文学诗歌。

[电子邮箱] xlwoo2000@gmail.com

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研究

文化话语权视域下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定位与思考

彭红艳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

摘要：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原创网络文学应运而生、蓬勃发展、享誉海外。尤其是近 20 年网络文学的发展蔚为大观，作家作品数量和用户规模几乎是传统文学领域无法企及的。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文学及其 IP 改编的影视作品等在全球各大翻译网站和视频网站上赢得了大批受众的竞相追捧，打破了一直以来中国文学在世界舞台上“失语”的尴尬境遇，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自信心。由此可见，网络文学也能讲好中国故事，其海外传播更有助于增进国际受众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认识、了解和认同。在新时代背景下，学界应当破除文化偏见，对网络文学进行准确定位，根据其海外传播的成功经验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其发展成为屏幕时代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强大力量。

关键词：网络文学；中国故事；海外传播；文化自信；文化话语权

Research on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with Respect to the Position and a Future Prospect

Peng Hongyan

(Graduate School &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China's 40-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promoted the emergence, vigorous development and overseas popularity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literature in the past 20 years has become a spectacle. The number of its writers, works and readers are almost beyond the reach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online literature and its IP adapted films and TV series have won a large number of audiences in major translation websites and video websites around the world, breaking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aphasia"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world stage, and greatly enhancing the confid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refore, online literature can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and its



overseas dissemination help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we should abolish cultural prejudice, orientate online literature accurately, standardize and guide it according to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and make it a powerful force to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discourse power, and to construct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screen age.

Key Words: online literature; Chinese stories; overseas disseminatio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discourse power

客观而论,文学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话语实践。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了网络文学的应运而生、蓬勃发展、扬帆出海。有论者指出,“改革开放解除了人们的精神枷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网络文学提供了自由、兼容的创作氛围;改革开放时代的自主择业与自由创造,提振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造就出庞大的网络文学创作队伍,释放出强大的文学原创力;改革开放创造的物质财富,激发了中国人的文化消费热情,增强了数字技术传媒领域的文学消费力;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助推网络文学迈入产业轨道,打造出数字化时代新的文化产业”(欧阳友权, 2018: 141)。在解放思想、革新观念、张扬个性、追求创新的时代语境中,借着各类新媒体涌现的东风,网络文学颠覆了传统文学范式的权威话语,开创了“全民写作”“全民阅读”的繁荣局面。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然而,新时代的“中国有很好的‘故事’,却缺少理论上相应的好的‘话语’来讲述它”(李德顺, 2014)。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呈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故事,还革新了讲述故事的方式和渠道,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外受众竞相追捧,“有望与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等全球流行文艺一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代表本国特色的文化输出力量”(邵燕君,等, 2018: 119)。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破除文化偏见,对网络文学进行准确定位,不断总结其海外传播的成功经验,探究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机制和路径。同时,网络文学应当增强社会责任感,承担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话语权的时代使命。

一、总结成果:坚定文化自信

1. 发展历程

诚然,“网络文学的超常发展既是中国社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人的



文化自信在网络文学创作上的生动体现”（欧阳友权，2018：141）。迄今为止，全国共计45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中文在线”“掌阅科技”和“阅文集团”三家网络文学企业已经上市。据《2017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网络文学驻站创造者已达1400万人，签约作者达68万人，其中47%为全职写作；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高达1647万部（种），签约作品132.7万部（种）；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总计达129.2亿元。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络文学读者规模已经突破4亿，具有本科和以上学历者占比为62.3%”。^①

不难发现，各大书店的畅销榜上，玄幻武侠、悬疑推理、古风言情等网络小说不一而足。天下霸唱的《鬼吹灯》、海晏的《琅琊榜》、蝴蝶蓝的《全职高手》等类型丰富的网络小说在各大书店抢尽风头。更有甚者，在各大图书网站上，网络文学畅销书的评论数远远高出许多传统文学作品。据《2018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诞生了网络文学史上第一部评论超过150万的作品《大王饶命》。显然，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网络文学有着浓厚的阅读兴趣。

此外，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庞大读者群体的网络小说已然成为影视、动漫、游戏等IP改编的最佳选择。一方面，网络小说内容新颖，可供选择的题材类型非常丰富；另一方面，网络小说积累的读者会转变为IP改编产品的受众群体，能够增强改编产品的影响力。截至2017年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出版纸质图书6942部，改编电影累计1195部，改编电视剧1232部，改编游戏605部，改编动漫712部”^②。《花千骨》《择天记》《鬼吹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如懿传》《延禧攻略》等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席卷全国，其收视率和网络播放量远远高于同期播放的传统文学改编剧。

2. 译介现状

其实，早在2009年左右，网络文学就从东南亚地区走进了海外读者和观众的视野。与传统文学“走出去”所不同的是，网络文学及其改编作品在海外广受欢迎不是依靠官方组织的对外译介活动，而是海外的众包译者、翻译网站、出版机构、视频网站自发译介与传播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专门翻译并连载中国网络小说的海外网站已有120多家，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网站包括WuxiaWorld、Gravity Tales、Volare Novels、Novel Updates、LNMTL、Rulate、L'Empire des novels等，其受众群体遍布东南亚、日韩、欧美等世界主要地区。截至2017年，“超过500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泰语等十多种语言文字，海外中国网络文学网站日均访客超过50万人，日均访问量超过500万人次”^③。《盘龙》《逆天邪神》《妖神记》《我欲封天》《莽荒纪》等类型丰富的网络小说深受海外受众赞誉。

除了海外翻译网站和视频网站在全球推广中国网络小说，近年来国内的网络文学网站开始设立国际站点。据《网络文学海外传播（2017—2018）研究报告》显示，阅



文集团旗下起点国际(Webnovel)“已经上线了200余部翻译作品,接近9万章……覆盖东方幻想、言情等13个热门品类”(杨晨,2019),各类作品赢得了全球读者高分好评。如横扫天涯的《天道图书馆》,“阅读人次高达7700万,蝉联榜首10个月”(同上)。据《2018网络文学发展报告》透露,目前Webnovel“累计访问用户已超2000万,覆盖了北美、欧洲、日韩、东南亚等全球各大地区;点击量超千万的作品共计69部,累计产生评论量超370万条”^④。2018年4月,Webnovel开启了海外原创板块,海外作者可以创作中国式网络小说,“目前海外作者已超12000人,共审核上线原创英文作品19000余部”^⑤。由此可见,中国网络文学及其IP改编产品在全球有着不可估量的市场潜力和影响力。

中国网络小说打破了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英剧、美剧、好莱坞大片等西方强势流行文化的拘囿,在海外普通大众读者间掀起了“狂欢式”的追捧热潮,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引爆点”。由此可见,网络文学能够得到海外普罗大众的认同,对于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将逐步建立起“互联、互通、互文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李蕾,2018),促进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与融合。

二、准确定位:破除文化偏见

中国网络文学“紧密关注日常生活,在不同文化阶层群体之间进行解释和沟通,因其流行性和受关注度成为构建社会文化议程的一个新维度”(许苗苗,2018:146)。毋庸讳言,中国网络文学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影响力和海外传播力,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其意义和价值。当然,同其他新事物的成长一样,网络文学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有鉴于此,社会各界应当厘清网络文学固有的特质,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其进行不偏不倚的定位,才能增强其发展的“后劲”。

网络文学是媒介变革作用于文学场域的结果,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现了文学创作和IP改编的良性循环。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众化、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和互动性。一直以来,“传统文学依靠思想和艺术品质对网络文学抱有傲慢与偏见,网络文学背靠市场对传统文学抱有傲慢与偏见。实际上,它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它们都能从对方那里得到重要的支持和营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健全的文学生态”(李敬泽,2014)。网络文学的民间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创造性,其特有的叙事方式和传播渠道,体现了新的文学语境中普通大众的文学需求和阅读心理,这是网络文学充满活力的根源所在。

因此,主流文学界和评论界应当破除文化偏见,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以艺术品质论高低,而不在于它是出自普通网民之手还是来自传统作家笔



下，是纸质出版的还是网络首发的”（欧阳友权，2016：76）。事实上，网络文学不乏具有文学和艺术分量的优质作品，其娱乐功能对于海外普罗大众而言更有亲和力。应当充分考虑网络文学的通俗性，面对网络文学提出的问题，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应当总结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成功经验，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其成为屏幕时代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强大力量。

三、启示与思考：提升文化话语权

1. 把握受众心理机制：阅读快感

中国网络小说能在纸质畅销书出版机制如此发达的西方世界得以广泛传播，正是因为网络小说的新鲜、有趣带给广大读者的阅读快感。首先，网络小说，尤其是海外读者青睐的仙侠、玄幻小说，以中国古典神话为创作灵感。那些富于想象力的中国故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充分满足了海外读者的猎奇心理和审美期待。其次，网络小说非常“重视对场景的描摹，建构立体化的空间感，追求视觉化效果”（黄发有，2017：125），非线性的多维叙事为读者构建了自我想象的理想空间。从网络小说构建的想象世界中，读者试图寻找被压抑的“本我”，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和困惑。无论是玄幻、仙侠小说，还是都市、言情小说，文本中塑造的各种角色均反映了读者的某种心理机制，读者阅读时会有强烈的“代入感”，幻想自己是故事中的某个角色，从而获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企及的心理或身份认同。

如此一来，可通过大数据分析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的网络点击量、图书销量和馆藏量、影视剧的收视率和网络播放量，分析海外图书网站、网络文学翻译网站、电视频道、视频网站、社交平台等传播载体的用户评论，考察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效果，了解海外受众的阅读需求和审美偏好，更有针对性地选取那些可读性强、富有感染力、蕴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题材进行译介。让普通读者喜爱的网络小说率先走向全球，有利于激发海外读者进一步阅读和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改变国际受众群体对中国文学一贯的负面认知，逐步认可中国文学与文化，从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2. 新媒体融合传播：多元渠道

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社交媒体等是网络文学海内外传播的主要媒介。这些新媒体平台，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很强，是普通读者最活跃的地方，具有“侵略式”的舆论影响力。“传媒为王的时代，传媒批评的意义谁也不敢小觑，文学生产的能量大爆炸，每一年度问世的长篇小说，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终结”（张志忠，2018：61）。除了对外输出各类版权，中国网络文学主要通过海外翻译网站、视频网站、众包译者等民间力量自发进行译介和传播。这些民间翻译力量正是基于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平台，将国内热门的网络小说及其改编作品迅速传递给海外



受众,并通过这些平台建立评论互动的社群,让网络小说渗透到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强受众“黏性”。

数字化时代全球读者的阅读方式已发生诸多变化,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必须考量当下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应当积极开发网络文学IP改编的各种艺术形态,充分利用海外各大图书出版、销售和推广平台以及海外影视作品翻译、播放和宣传平台,满足各类受众的审美偏好,从而扩大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范围。此外,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也可借助海外普罗大众触手可及的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这些平台的用户规模庞大、覆盖的地域范围广,可以吸引世界各国的受众参与网络文学作品的讨论和传播,有助于增强网络文学的国际知名度。“屏读”时代对屏幕媒体的忽略,必将使文学作品传播力大打折扣。以全媒体形式进行多元立体的融合传播,是增强中国文学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必然路径。

3. 对话的传播思维:多维互动

网络文学不仅改变了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媒介,而且变换了作者和读者的传统主客体地位。作者不再是建构意义的权威“主体”,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转而积极参与作品意义的生产。也即是说,网络文学提供了一个对话场域,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几乎同时在场,且作者和读者的互动性很强,作者连载的故事很快得到读者的评论,作者甚至会根据读者的即时反馈改变后续的情节。因此,读者“不是单纯被动地破译和了解认识对象,而是透过直接参与和反馈来影响和改造认识对象”(吴思敬,2004:63),成为阐释和构建作品意义的“主体”。而作为“他者”的海外受众,并不是被动地“听”故事,而是用自己的话语形塑创作主体的行为。

网络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充分彰显了“复调理论”(polyphony)所强调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对话性,传统上被边缘化的民间力量都可以参与言说与被言说。事实上,“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能动地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作品才能够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中”(朱立元,2004:63)。这样的对话模式增强了网络小说的渗透力,能够吸引海外受众积极参与到生产和传播的各个环节。有鉴于此,网络文学对外传播需要树立一种与受众对话的思维。在翻译、出版以及传播的过程中,可以专门设置一些交流平台,如论坛、社区等,供海外受众探讨网络文学作品及其蕴含的中国文化。例如,“武侠世界”等翻译网站专门设置了“Forums”板块,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如此一来,中国文化话语能够通过网络文学的广泛传播,逐渐渗透到国际受众的日常交流中。

4. 遵循传播规律:市场导向

网络文学是大众化的通俗文学,产业化运营需要吸引资本的注入,其消费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创作和改编势必会以受众的审美趣味以及市场的文学需求为导向。相比



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更关注读者反应，贴近市场需求意识更强，因而具有占领普通读者市场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网络文学市场导向的特质也招致不少批判。学界不少论者担忧网络文学过分强调读者的“快感”，导致相同类型的作品重复创作、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事实上，他们往往忽略了网络文学残酷的竞争淘汰机制，那些广受欢迎的作品都经过了亿万读者的点击量和评论检验，只有真正具有文学性与故事性的作品才能从文学博弈场中脱颖而出。因此，网络文学的受众和市场思维绝非忽视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

目前，在海外市场最受欢迎的网络小说主要是玄幻、仙侠、都市、言情等类型。这些网络小说能够在海外市场迅速传播，正是因为其故事题材满足了海外受众的审美偏好和接受心理。“快餐式”的文化体验能够打破传统文学在海外市场遇冷的尴尬境遇，说明网络文学能够满足海外市场的文学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网络文学进一步“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遵循海外翻译网站、粉丝群体、众包译者自发译介与传播的市场机制，才能保持网络文学与民同乐的活力，维护其海外传播建立的良好局面。同时，应当加强对网络文学的引导，挑选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作品进行对外译介，避免低级庸俗的作品大行其道，继续为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注入强大的驱动力。

5. 创作、翻译与传播人才培养：多点突破

毫无疑问，要增强网络文学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强网络作家、网络文学评论、网络文学翻译和传播等各方面的人才培养，多点多面突破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可能面临的困境。网络作家群体创作的各类优质故事题材是网络文学在海外广受欢迎的关键所在。新时代为“网络作家提供了新生活、新故事、新人物、新题材、新语言”（陈崎嵘，2018：26），应当加强对网络作家群体的扶持和引导，发掘和培养更多具有“大情怀、大志向、大目标、大境界”（陈崎嵘，2018：25）的网络作家，创作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文关怀、“展现泱泱大国的气派、风度、神韵”（同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并通过IP改编等多种艺术形式传播到全球各地。

目前，基于传统文学而建立的文学评论体系无法匹配网络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导致网络文学评论十分滞后，未能与网络文学创作实现有效互动。中国网络文学作家和作品数量极其庞大，亟需培养专业的网络文学评论人，探究网络文学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发掘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不言而喻，权威的文学评论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有助于扩大网络文学的海外知名度。有鉴于此，如何培养、发掘和引导专业的网络文学评论人，加强与海外权威书评机构或书评人的对话，增进海外受众对网络文学的了解，增强其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此外，网络文学海外传播需要各类译者群体通力合作。显然，热爱网络小说的海外众包译者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民间翻译力量。他们大多以英语为母语，在中国学习或



工作过,熟悉中国语言文化,对网络小说的思想内容有着全面深刻的理解,是网络小说及其改编影视剧最主要的译者群体。再者,全球专门翻译中国网络小说的网站都有成熟的翻译团队,也是网络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翻译阵地。因此,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众包翻译”的运作模式,充分调动众包译者的翻译热情,同时大力培育多语种的专业译者,推动海内外译者的交流合作,那么中国网络文学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将不可限量。

四、结语

毫无疑问,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有着殊异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但二者都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而非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区分。网络文学充分融合了图书出版、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更具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具活力和朝气。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通俗化、大众化、娱乐化的特点,加上新媒体传播的优势,充分满足了海外受众的审美诉求,赢得了大批国际受众的青睐和认可。网络文学逐步走进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消解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话语,对于培养海外受众的阅读兴趣、增强中国文学的吸引力、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具有不容小觑的作用。事实证明,网络文学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代表中国形象、传承中国文化。网络文学企业和作家应当肩负起增强中国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时代使命,弘扬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念,不断书写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故事。同时,文学领域应当树立互动、对话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理念,将更多可读性强、富有感染力的正能量故事分享给海外受众,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构建世界文学版图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①引自《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http://www.colpc.cn/2018/0915/1031.shtml>.2018-09-15 读取。

②引自《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http://www.colpc.cn/2018/0915/1031.shtml>.2018-09-15 读取。

③引自《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http://www.colpc.cn/2018/0915/1031.shtml>.2018-09-15 读取。

④引自《阅文集团:2018年网络文学发展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834027.html?device=geek>

⑤引自《阅文集团:2018年网络文学发展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834027.html?device=geek>



参考文献

- [1]陈崎嵘. 改革开放宏阔背景下的网络文学 20 年[J]. 杭州(周刊), 2018(16):23-26.
- [2]黄发有. 媒介融合与网络文学的前景[J]. 天津社会科学, 2017(6):117-125, 141.
- [3]李德顺. 如何用“中国话语”讲透“中国故事”:关于思想理论建设重点的新思考[N]. 北京日报, 2014-03-24.
- [4]李敬泽. 网络文学: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N]. 人民日报, 2014-07-25(24).
- [5]李菁. 新时代网络文学再出发:世界舞台,中国故事[EB/OL]. 中国作家网. [2018-09-15]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915/c403994-30295441.html>.
- [6]欧阳友权. 改革开放视野中的网络文学 20 年[J]. 中州学刊, 2018(7):141-145.
- [7]欧阳友权. “茅奖”视野中的网络文学[J]. 小说评论, 2016(1):75-80.
- [8]邵燕君, 吉云飞, 肖映萱. 媒介革命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8(2):119-129.
- [9]吴思敬. 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J]. 河南社会科学, 2004(1):61-64.
- [10]许苗苗. 网络文学 20 年发展及其社会文化价值[J]. 中州学刊, 2018(7):146-150.
- [11]杨晨. 《网络文学海外传播(2017—2018)研究报告》发布, 网文出海进行时[N]. 出版商务周报, 2018-09-16.
- [12]朱立元. 接受美学导论[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 [13]张志忠. 四十而不惑 大道更开阔——“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研究”感言[J]. 文艺争鸣, 2018(12):60-62.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招标课题“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翻译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 2017SISUHY005)及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重点项目“中国网络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2009-2019)”(项目编号: SISU2019YZ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彭红艳,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翻译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 翻译与文化、中国网络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

[电子邮箱] angelina520peng@126.com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葛浩文英译《狼图腾》 文化意象的失落研究

赵自强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小说《狼图腾》是一部讲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知青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时与草原狼、游牧民族相依相存的故事，包含了丰富的蒙古族文化意象。这部作品不仅深受国内读者喜爱，同样也深受国外读者欢迎，尤其是英译本，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化意象，作为文化内涵的一种表达形式，能够正确将其翻译、表述出来，对文化传播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探讨葛浩文译作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失落问题，梳理文化意象的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并对文化的对外翻译提出相应对策，从而助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化意象翻译；《狼图腾》

A Study of the Loss of Cultural Image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Wolf Totem*

Zhao Ziq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Abstract: *Wolf Totem* is a novel about an educated urban youth being sent out to the countryside or mountain area in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who lived with coyotes and nomad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the novel contains rich Mongolian culture. This work is popular not only among domestic readers, but also among the foreign readers, especially its English version which has a wide influenc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Cultural image, as a symbolic express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should be correctly translated and expresse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in Howard Goldblatt's version, sor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imag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cultural translation, so as to pro-



mote the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Key Words: Cultural imag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olf Totem*

一、引言

小说《狼图腾》是作家姜戎的作品，主要讲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知青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时与草原狼、游牧民族相依相存的故事。小说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意象，尤其是蒙古族文化意象。该书在中国出版后，被译为 30 种语言，在全球 110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截至 2014 年 4 月，该书在中国大陆再版 150 多次，正版发行近 500 万册，连续 6 年蝉联文学图书畅销榜的前 10 名，获得各种奖项数十余种。

葛浩文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30 多年来，葛浩文笔耕不辍，先后将萧红、莫言、虹影、阿来、姜戎等二十几位中国现当代最著名作家及其 50 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推向海外。葛浩文翻译的中国作品多，涉及的作家广，翻译风格多样，他本人也已经成为海外汉学界中最重要的翻译家，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翻译的《狼图腾》英译本 *Wolf Totem* 是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唯一获奖的中文母本图书。

通过笔者检索，发现目前学界对于《狼图腾》英译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一，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葛浩文翻译的合理性，如：张秀琴、笪鸿安（2012），叶桦（2017），孔新柯（2017）等的研究。其二，从不同侧面探讨《狼图腾》译文的成功之处，如：李慧敏（2009），徐颖（2012），张慧、石春让（2017）的研究。其三，文学输出路径研究，如：吕敏宏（2012），李燕（2015），曹文刚（2016）。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对葛浩文英译《狼图腾》的褒扬、赞同，或以《狼图腾》为个案探讨中国文学的输出路径。但鲜有研究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探讨《狼图腾》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翻译失真的问题。小说《狼图腾》中蕴含大量的文化意象，因此对于文化意象的翻译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葛浩文对大多数文化意象采取的方法为删除、扭曲、概括化，这显然不利于文化传播。

自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去”效果并不显著。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对文学“走出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尝试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探讨《狼图腾》的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翻译问题，通过文本对比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葛浩文把哪些文化意象较好地传播到了英语世界，哪些文化意象在葛浩文译本中被误读、扭曲、屏蔽、变形，导致文化意象失落，未能把中国文化意象传播出去，尝试提出有效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意象的策略或方法。



二、文化意象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文化意象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形成的。谢天振认为“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其中一部分文化意象还与各个民族的传说,以及各个民族初民时期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谢天振,2013:140)。方梦之认为“文化意象是蕴含文化意义的意象,它是在一定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和很强的语境适应性”(方梦之,2004:310-311)。李占喜和何自然则认为“文化意象在不断地发展、丰富,并且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李占喜、何自然,2006)。归纳总结,可将文化意象定义为: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自己特色、反映自己文化内涵的一种文化符号,也就是有着独特文化寓意的文化符号。

中国跨文化传播学者孙迎春在作品《跨文化传播学导论》一书中,给跨文化传播下的定义为:“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共享和互动的过程,不仅关联不同文化的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还涉及人类社会诸多文化要素的扩散、渗透、迁移。”(孙英春,2008:2)换言之,跨文化传播即是不同国家、民族等在信息知识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传递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学者针对于传播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其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则是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论文中提出的“5W模式”^①(又叫做“拉斯韦尔模式”)。该理论被英国传播学者麦奎尔(Denis McQuail)进行了图示化处理(见图1)(陈力丹、闫伊默,20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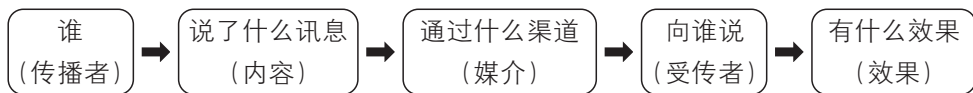


图1 拉斯韦尔的线性传播模式

将文化意象的翻译与拉斯韦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翻译便是媒介,也就是渠道。黄友义先生曾说过:“翻译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道,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黄友义,2008:54)他强调翻译这一渠道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重大作用和重要地位。对于文化作品的海外翻译,翻译这一媒介影响着“受传者”(读者)所接收到信息(原文本)的独特性、真实性、完整性,进而影响到传播效果。根据上图(图1),笔者推理出文化意象的线性传播模式(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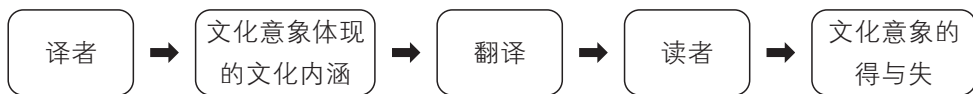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意象的线性传播模式^②



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张建，2001），那么译文中文化意象的“得”与“失”则是检验文化意象中文化内涵传递的重要尺度。从图2可以推断出，影响“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在于翻译和读者。谢天振曾说过，“文化意象的跨文化传递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如何转换，也即翻译的问题，其背后蕴含着不同民族文化如何相互理解、如何正确交流，以及彼此丰富的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谢天振，2013：144）。因此，要想达到较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促进文化对外传播，首先就要解决翻译问题。另外，也不能忽视读者作为受传者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从源头把控，即选取优秀的、具有丰富文化意象的文学作品进行译介，促进文化传播。

三、《狼图腾》中文化意象的翻译

蕴含丰富文化意象的小说《狼图腾》“在图书馆馆藏量、海外获奖情况、西方主流媒体报道刊载量、专业和普通受众的评价等方面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其译介效果令人鼓舞”（鲍晓英、游春艳，2017）。这表明《狼图腾》在海外是十分受欢迎的。通过英汉语文本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译作中，原作中的有些文化意象得到了传递，达到了文化传播的效果。例如：

两年前陈阵从北京到达这个边境牧场插队的时候，正是十一月下旬，额仑草原早已是一片白雪皑皑。（姜戎，2004：4）

Two years earlier, in late November, he had arrived in the border-region pasture as a production team member from Beijing; snow covered the land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The Olonbulag is located southwest of the Great Xing'an mountain range, directly north of Beijing; it shares a border with Outer Mongolia. Historically, it was the southern passage between Manchuria and the Mongolian steppes, and, as such, the site of battles between a host of peoples and nomadic tribes as well as a territory in which the potential struggles for dominance by nomads and farmers was ever present.（Goldblatt, 2008: 2）

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额仑草原”。额仑草原作为故事发生地，对于了解整个小说具有重要意义。葛浩文并未只翻译此专有地点名词，而是补充说明了额仑草原的地理位置（额仑草原位于大兴安岭的西南部，北京北部，与蒙古国相邻）和历史地位（历史上，它是满洲和蒙古大草原之间的南部通道。因此，它是许多民族和游牧部落之间的战争之地；并且游牧民和农民为争夺这片土地的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潜在斗争也一直存在）。结合“文化意象的线性传播模式”，易发现文化意象（包括文化意象的文化



内涵)经过翻译这一媒介(渠道)传递给读者(受传者),读者能够清楚地理解明白这一文化意象背后的文化内涵,有效地传播了文化。

但是,在葛浩文的译作中出现了大量文化意象失落的现象,他对大多数文化意象采取的翻译方法为删除、扭曲、概括化,这显然不利于文化传播。下面,笔者结合具体实例,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根据葛浩文在翻译中采取的方法,从三方面探讨、分析《狼图腾》中文化意象的传播效果。

1. 文化意象翻译的删除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于“删”字的解释为去掉(文辞中的某些字句)，“删除”的解释为删去多余的文字。那么，文化意象翻译的删除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的文化意象删除，不翻译。

在葛浩文的译作中，存在大量的删除文化意象的翻译方式。在原文本中，每一章节的开始都有按语（或案语），这些都是作者引用的与狼或者是与章节内容相关的论述。比如，小说第一章便引用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内容“‘犬戎族’自称祖先为二白犬，当是以犬为图腾”和《汉书·匈奴传》的内容“周穆王伐猋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姜戎，2004：3）。这两句按语都暗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象。其一，“犬戎”（或猋戎）是旧时少数民族的称谓，指一直生活在西北的游牧民族。其二，第一句中的犬与第二句中的狼表意大致相同。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古时候的犬虽然饲养在家里，但是其外形和凶猛程度与狼类似。因此第一句的“犬”和第二句的“狼”意思是相似的。两句话都表明了“狼”是犬戎族的图腾，文化内涵丰富。葛浩文在此处采取删除的翻译方法，切断文化意象的表现渠道，显然没有实现文化的传播，更谈不上传播效果。

其次，姜戎在原作中的《理性探索——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内容（姜戎，2004：364-408）被删除了。作者在这部分，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对民族精神的文化根基进行推理和论证——小说所倡导的“狼图腾”精神。这部分包含了大量的文化意象，尤其是一些史料，这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葛浩文在译作中对这部分内容采用了删除的翻译方法，造成原文本内容的缺失，切断了文化通过翻译这一重要途径传播的渠道，造成文化意象的失落。

同时，在文章内容部分涉及到的一些具体的文化意象也被译者删除了。比如：

可能正是大青马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将陈阵出窍的灵魂追了回来。也可能是陈阵忽然领受到了腾格里（天）的精神抚爱，为他过早走失上天的灵魂，揉进了信心与定力。当陈阵在寒空中游飞了几十秒的灵魂，再次收进他的躯壳时，他觉得自己已经侥幸复活，并且冷静得出奇。（姜戎，2004：5）



Maybe it was the horse's extraordinary courage that summoned back Chen's departed soul, but when that spirit, which had hovered in the frigid air for a moment, returned to his body, he felt reborn and was extraordinary tranquil. (Goldblatt, 2008: 4)

在这个例子中，葛浩文在翻译时将具有蒙古族特色的表达“腾格里（天）”删除。蒙古语中的腾格里是一个带有宗教文化色彩的文化意象表达。腾格里（Mongke Tengri）^③神，在蒙古民间宗教里是最高神，他被认为是“古代蒙古人顶礼膜拜的创世神”（那木吉拉，2001）。腾格里被认为是创造了世间万物，掌握着世间一切事物的变化。蒙古族人民都很尊敬腾格里。在例句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人们对腾格里的崇拜和尊敬，他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葛浩文删除了“腾格里（天）”这一文化意象的翻译，造成了文化意象的失落，不利于文化传播。

2. 文化意象翻译的扭曲

“扭曲”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被解释为“扭转变形；歪曲（事实、形象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8：960）。文化意象翻译中的扭曲指的是虽然翻译了原文的文化意象，但是翻译错了，歪曲了原有的文化意象。比如：

可是农耕人口恶性膨胀的势头谁能挡得住？连蒙古的腾格里和中国的老天爷也没辙。（姜戎，2004:189）

But I'm afraid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among peasants can't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not by Mongols' Tengger and not by our Old Man in Heaven. (Goldblatt, 2008: 295)

在这句话的翻译中，葛浩文将“老天爷”翻译为“Old Man in Heaven”显然歪曲了“老天爷”本来的意思。在汉语中“老天爷”一词主要有如下两个意思：其一，“老天爷”指的是天帝，是神话传说中的主神，也是儒教所信奉的最高神。《尚书·召诰》中说道，“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这里边的“皇天上帝”也就是天帝、老天爷。可见其宗教意义重大。比如，余华在作品《在细雨中呼喊》写到这样一个句子：“老天爷在看我们。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其二，在现代汉语中，“老天爷”除了上述提到的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表达一种感叹。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句子：“我的老天爷啊，你吓死我了。”在这句话中，“老天爷”是一个感叹词，表示受到惊吓后发出的惊呼。

而我们将“Old Man in Heaven”回译，则为“在天上的老人”，显然与“老天爷”要表达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由此可见译者歪曲了“老天爷”背后真正传达的文化内



涵。在例句中,作者将蒙古族所信奉的最高神“腾格里”和汉族的“老天爷”类比,都是强调其宗教意义。前者用的是直译,一定程度上能够传达其文化内涵;后者则是误译,歪曲了“老天爷”的真正含义,显然传播渠道(翻译)出现问题,不利于读者正确理解其文化内涵,造成文化意象的失落,不利于文化的对外传播。

3. 文化意象翻译的概括化

“概括”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被解释为“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简单扼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8:419)。那么,文化意象翻译的概括化则是将原文中具体的描述(包括细节描写、用典、修辞等)进行概括化翻译,直接翻译出原文表达的核心意思。比如:

人马与侧面的狼群越来越近,陈阵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万千的架势。(姜戎,2004:5)

And he knew how important it was not to show fear. (Goldblatt, 2008: 5)

在这句话的翻译中,葛浩文采取的是概括化的翻译方法。葛浩文并没有将原文中的细节、用典一五一十地翻译出来,而是概括了当时陈阵内心的活动和情绪。但是,这样显然没有将“空城计”“诸葛孔明”这样的文化意象翻译出来。

“空城计”为三十六计之一,该典故出自著名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小说中写道,蜀国将领马谡失守街亭,魏国将领司马懿带兵直逼西城,诸葛孔明无兵可用,但是沉着冷静迎敌,并大开城门,自己在城楼上弹琴。魏国将领司马懿以为其中有诈,便带兵退去。现在“空城计”表示掩盖力量空虚,以此欺骗对方的策略。“诸葛亮”这个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国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发明家。^④诸葛亮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

在这个例子中,葛浩文将带有文化意象的“空城计”“诸葛孔明”等词语采用了概括化的手法进行翻译。这样在其传播过程中就造成了文化意象的失落,导致读者所接收到的文化意象是缺失的。显然其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文化意象的对外传播。

四、对策建议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人民网—人民日报,2017)。因此,推进文化的对外传播格外重要。文学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其对外传播则是重中之重。文化意象作为文学作品中有着中国特色文化内涵的特定表达方式,只有完整地将其传播出去,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下面笔者拟结合上文提到的文化意象传播模式,探讨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从源头选取文化意象丰富的作品进行翻译传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包含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和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除了这些作品以外,还有现下热门的武侠小说等。这些作品中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象,涉及到物质、生态、宗教、语言、社会等方面。比如,作家阿来的作品《尘埃落定》蕴含丰富的藏族文化意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意象,等等。这些优秀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象如若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一定有利于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其次,优化传播渠道,使文化意象在传播过程中减少亏损,最大程度地保证传播过程中文化意象的完整性。在笔者所说到的文化意象传播模式中,翻译作为一种渠道,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传递文化意象,笔者建议从译者选择、译者素质规范、翻译策略选取等方面进行优化,最大程度减少文化意象失落的现象。关于译者的选择,中外合译的方式无疑将是最好的方式。通过中外译者的合作协商,最后打磨出的译文一方面能够传递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能适应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满足译入语读者的兴趣。关于译者素质,译者应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熟悉源语言和译入语的语言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要熟练掌握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技巧;译者也要遵守该有的职业道德。关于翻译策略,在文化意象的翻译过程中建议采取深度翻译策略^⑤,这样有利于将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传达出来。

最后,从“受传者”也就是读者的角度出发,作为文化意象的源头,我们应增强文化自信,对读者保持信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民族之林中一朵璀璨的奇葩,具有着独特性和巨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应对中华文化保持一种自信,相信其一定会吸引外国读者。同时,我们也知道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中文和中国文学产生兴趣。他们在不断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因此,我们也应对读者保持高度的信任,坚持文化自信,这样才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五、结论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有着五千年文明积



淀,“走出去”是一种必然趋势。文化意象作为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自己特色、反映自己文化内涵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具有独特的文化寓意,其翻译的“得”与“失”对于文化传播效果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翻译时选取具有丰富文化意象的作品,优化文化意象对外传播中的翻译渠道,增强文化自信,同时对读者保持自信,一定会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达到最佳的文化传播效果。

注释

- ① 5W 模式即是:Who(谁),Say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
- ② 所谓文化意象的“得”是指:在译文中文化意象被正确翻译和表达出来,传达了文化内涵,有着良好的传播效果;文化意象的“失”是指:在译文中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出现了“失落”与“歪曲”,未能传达文化内涵,无传播效果。
- ③ Mongke Tengri 这是腾格里在蒙语中的叫法。
- ④ 引自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8%E8%91%9B%E4%BA%AE/21048?fr=aladdin>
- ⑤ “深度翻译”是由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1993年的一篇名为《深度翻译》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这样的‘学术’翻译,即以评注或附注的方式力图把译文置于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翻译,显然有实行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鲍晓英,游春艳.《狼图腾》英语世界译介效果研究[J]. 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1):119-125.
- [2] 曹文刚.从《狼图腾》版权输出看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传播中国出版[J]. 中国出版,2016(19):62-64.
- [3] 陈力丹,闫伊默.传播学纲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4] 方梦之.译学辞典[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5] 黄友义.让翻译事业更好地为跨文化交流服务[J]. 今日中国,2008(7).
- [6] 姜戎.狼图腾[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 [7] 姜戎.狼图腾[Z]. Howard Goldblatt. Wolf totem-A Novel.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2008.
- [8] 金岳霖.形式逻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9] 孔新柯.改写理论视角下《狼图腾》英译本中生态话语的翻译研究[D]. 郑州:郑州大学,2017.
- [10] 李慧敏.对《狼图腾》的英文翻译——*Wolf Totem* 中蒙古族文化的意象分析[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09(12):92-93.



- [11]李燕. 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91-95.
- [12]李占喜, 何自然. 从关联域视角分析文化意象翻译中的文化亏损[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40-43.
- [13]那木吉拉. 蒙古族神话中的腾格里形象初探[J]. 西北民族研究, 2001(2): 45-57.
- [14]吕敏宏. 从《狼图腾》版权输出看如何构建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发行的新模式[J]. 出版发行研究, 2012(07): 35-38.
- [15]人民网—人民日报.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8).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9.html>.
- [16]孙英春. 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7]谢天振. 译介学(增订本)[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18]徐颖. 《狼图腾》英译本中的“文革”词语翻译[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 125-126.
- [19]叶烨. 生态翻译学下《狼图腾》中文化特色词的翻译报告——以葛浩文省译内容为例[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17.
- [20]张慧, 石春让. 葛浩文对《狼图腾》中蒙古族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特征[J]. 昌吉学院学报, 2017(5): 74-78.
- [21]张建. 英语对外报道并非逐字英译[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4): 24-28.
- [22]张秀琴, 笪鸿安.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看葛浩文译本《狼图腾》的适应选择[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2): 80-84, 93.
-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翻译协会 2018 课题“跨文化传播视角下文化意象翻译研究——以《狼图腾》葛浩文英译本为例”(项目号: YX2018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自强, 男, 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文学批评、译介学。

[电子邮箱] 15708450943@163.com

翻译史研究

抗战时期大后方军事翻译述论

罗 天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在长达 8 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曾与多国有过合作，其间军事翻译活动不可或缺。军事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学、语言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目前学界对此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对大后方军事译著的探讨更是缺乏。本文在大量收集整理相关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力图总结大后方军事翻译的概况。研究发现，抗战时期由于中外军事合作和军事院校、情报机构、宣传机构、作战部队的需要，有 500 余部军事译著得以出版。这些译著涵盖军事理论、军事情报、军事科技、军事宣传等主题，积极服务于抗战。本文认为，军事翻译是抗战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前线士兵而言，是子弹，是一种有效的武器；对后方民众而言，是一种激励民众抗战到底的宝贵精神食粮。总之，军事翻译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翻译；军事；抗日战争；大后方

Military Translation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1937–1945)

Luo 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Translation was inevitably involved i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as it was fought between countries speaking different languages for eight years. However, up to now there exists no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into such military translation, nor adequate discussion about military translated works in the rear area (or Kunmingtung-ruled area).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military translations published in the rear area, finds out that over 500 military books are translated in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operation, for the urgent need of milit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lligence agency, publicity bureaus as well as fighting troops. These translated books cover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military theory,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ity. This paper, therefore, holds that for the civilians



in the rear area, such military translation is an inspiration for a relentless resistance against invasion; and for the soldiers in the battlefield, it serves as a weapon used for victory over the enemy. Military translation, with a great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war, has als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China's victory over Japan in the WW II.

Key Words: translation; military;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rear area

一、引言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使用不同语言的部落或民族之间开始战争以来,军事翻译就客观存在于战争的各个阶段。若按全面抗战的时间阶段计,抗日战争长达8年之久,牵涉到的国家众多(中、日、美、苏等),因而抗战期间军事翻译语种丰富、类型多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学、语言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已经有一些论述。《中国口译史》第三章名为“军事战争中的口译”,简单罗列了为英、美、苏等国盟军担任翻译的口译人员、担任对日宣传的翻译人员10余人(黎难秋,2002:167-172)。何宇编纂有西南联大1944届部分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的口述史资料(何宇,2004:212-259)。《在同一面旗帜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一书收录6篇来自军事译员的口述(邓贤,2005)。罗天通过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分析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活动,发现4000余名译员在制空权、军事情报、武器装备、协同作战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滇缅战役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罗天,2011;2012)。

笔译方面,《中国翻译通史》介绍了军事家刘伯承的翻译成就,罗列了抗战时期解放区出版的几本军事译著(马祖毅等,2006:375-397)。《军事翻译家刘伯承》描述了我现代军事翻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刘伯承从事翻译、培养翻译人员的经历。对刘伯承抗战时期组织翻译和校对《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等军事著作的情况也有详细介绍(陈石平,成英,1988)。

现有文献表明,抗战军事翻译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1)口译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中印缅战区的军事译员进行研究的领域,特别是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从军担任美军翻译官的历史;(2)笔译方面,主要关注马恩列斯军事译著以及对刘伯承军事译著的介绍和评价。然而,抗战军事翻译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对史料的梳理尚不够全面、深入和系统,大量史实还有待发掘,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国统区)、沦陷区的军事笔译情况少有涉及等。

本文聚焦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军事翻译,特别是笔译问题,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各种史料,对军事翻译活动和成果进行论述,以反映中国军



事翻译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揭示抗战对军事翻译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军事翻译对于抗战的作用。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有：①民国时期出版的相关书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军事》《图书书目 抗战时期出版 1937—1945 第 1、2 辑（初稿）》《旧版抗战文献知见录》《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旧版抗战文献知见录》《无法尘封的历史 抗战旧书收藏笔记》等；②有关抗战研究的书籍，如《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二战研究在中国》等；③各地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档案馆等；④全国各地编纂的文史资料等。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上述资料统计的军事译著应该只是当时军事翻译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军事翻译成果由于涉及机密不能刊印，使用之后大多销毁，很难留存；能够刊印的，由于年代久远，经历动荡，大多难觅踪迹。对于这部分军事翻译成果，我们没有条件进行统计和研究，这是本研究的一大缺憾。

二、大后方军事翻译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解放战争成为社会生活的轴心。国内各阶级、各党派暂时将阶级、党派之争置于次要地位，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总体上说，大后方的抗日救亡意识强烈。中国与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进行着频繁的合作交流，这是抗战时期军事翻译的宏观历史语境。

抗战时期，大后方对军事翻译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国际军事合作，主要是截至 1938 年的中德军事合作，1938—1941 年的中苏军事合作和 1941—1945 年的中美军事合作；②各军事机构需要对敌友军事情报进行收集、整理、编译等工作；③满足国民政府各军事院校了解国外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动态的需要；④国民政府战时宣传机构也需要对后方民众进行国民军事教育、宣传动员，报告世界战争动态，对敌进行反战宣传等。

根据笔者统计，抗战时期国统区共出版军事译著 530 余本。从年代分布来看，1940、1941 年两年中出版图书的数量较高，年均 80 种，其余年份维持在每年 60 种左右（见图 1）。而抗战之前的 1911 年到 1930 年，我国的军事翻译总数为 119 种，年平均仅 4 种（马祖毅，等，2006：126），两者对比，说明抗日战争促成了军事翻译的快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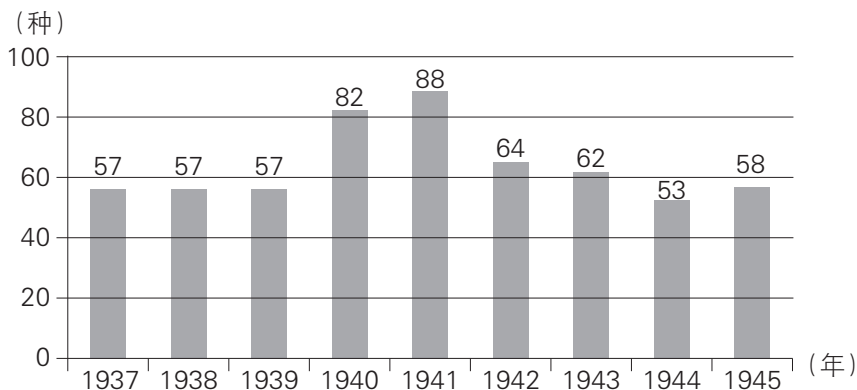


图1 抗战时期军事译著历年出版数量

抗战之前,中国的文化出版中心为北京、上海、南京,军事译著也大多在这些地方出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战时期的军事译著有71%在重庆出版(见图2)。这是因为战时的重庆,有众多军事院校集聚于此,在渝军事机构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频繁,知识分子云集,出版机构也纷纷迁来,种种因素导致了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军事翻译一枝独秀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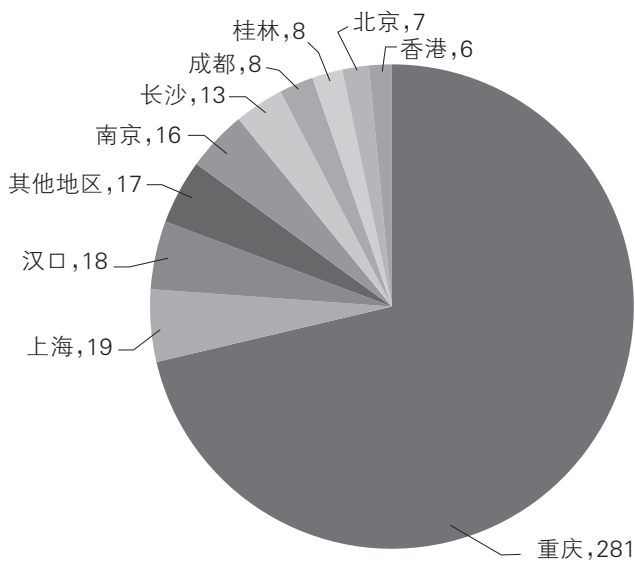


图2 出版地分布情况

在530余种军事译著中,有430余种已标明或能综合有关线索判定原文作者的国籍。其中106种来自美国,占25%;75种来自德国,占18%;75种来自苏联(包括俄国),占18%;69种来自英国,占16%;69种来自日本,占16%;23种来自法国,占6%;6种来自意大利,占1%(见图3)。

统计数据说明，译自二战同盟国（美、英、苏）的军事原著占了大约 65%，表现出翻译选材方面强烈的倾向性。一方面，其目的在于获悉盟国动态，向盟军学习战略战术；另一方面，中美、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对军事译著的选材有着重大影响。例如，1941—1945 年间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修建印缅公路以及联合作战、军用物资援助、空军支援、装备训练军队等领域。这些合作涉及到不少军事资料文献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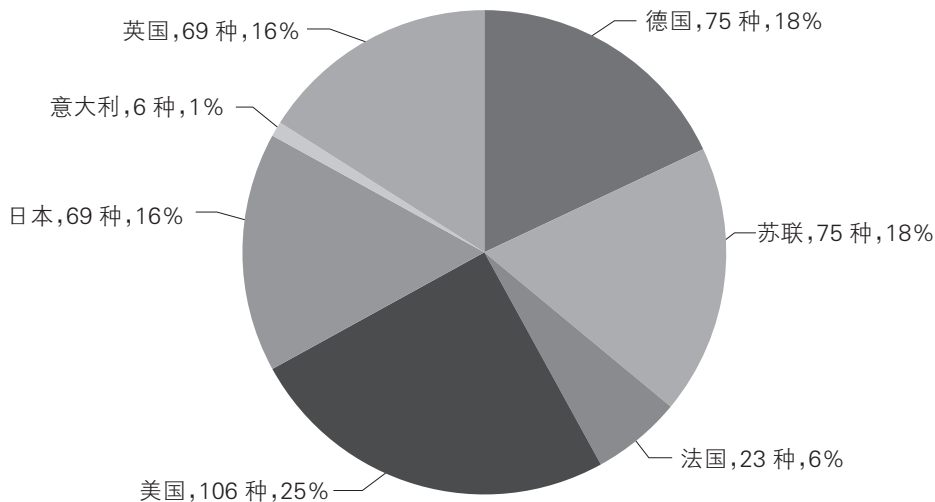


图 3 原文作者国籍分布情况

译自轴心国的军事原著占 35%。其中，译自德国军事理论家或军事顾问著作的译著也占了不少的比例。这是因为自民国起以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军事领域的模仿学习对象，加之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德国曾经有多位军事顾问为中国国民政府整训军队，配备武器，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此外，译自日本的军事著作也不少，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敌国军情和战略战术思想。

根据吴树凡（1991:12-14）和方梦之（1997:347-348）对军事翻译内容的分类，结合抗战时期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军事翻译分为军事理论、军事情报、军事科技和军事宣传 4 大主题。根据统计，军事译著的主题分布如下（见图 4）：57% 集中在军事理论，目的是译介世界各国的军事思想、军事学术；20% 有关军事情报，目的是译介敌友方面的军事、政治等动态，特别是作战信息等；16% 为军事宣传，如战争新闻、纪实、报告文学，军事人物传记等，报道国内外战场动态；只有 7% 的译著事关军事技术。

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按照军事理论、军事情报、军事科技和军事宣传四大主题，对国统区的军事译著进行简要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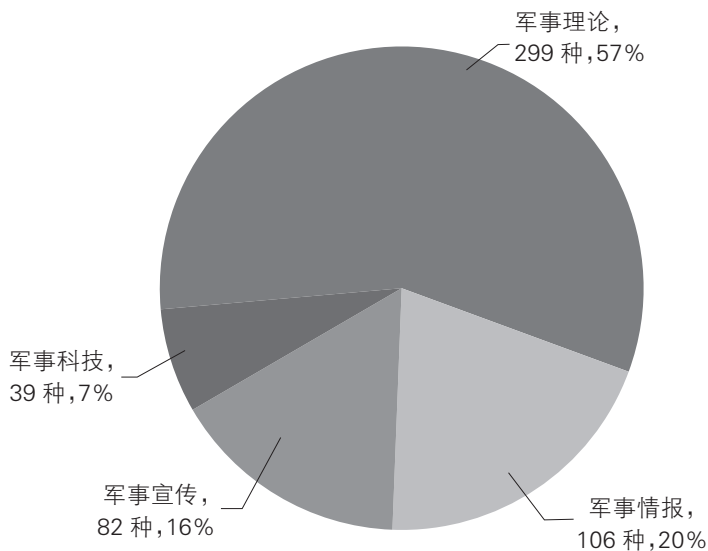


图4 译著主要分布情况

三、军事理论译著

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版的军事理论译著共有 299 本。其中,军事学术译著所占比例最大,有 269 本。

1. 军事思想译著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军事思想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通常包括战争观,战争与军事、国防问题的方法论,作战指导思想和原则,军队建设及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等。

抗战时期,大后方非常重视对经典军事理论的译介。例如,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所著《战争论》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代表,总结了拿破仑战争及以前的一些战争经验,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暴力运用与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若干作战原则。该书是世界经典的军事名著,至今在许多国家仍被列为军事院校必读之书。抗战时期,该书在国统区至少有 5 个不同译者的译本,曾刊印多版:①黄焕文编译的《大战学理》(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在渝、沪、京均有出版。②陶希圣、杜衡合译的《克劳塞维茨战争原理》,重庆南方印书馆 1945 年出版。③李浴日所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转译自日本成田赖武的译著,广东韶关世界兵学社 1944 年出版。④训练总监部重译的《战争论》(上、下卷)。⑤傅大庆从德语译本翻译而来的《战争论》(上册),学术出版社 1940 年出版。

德国鲁登道夫所著的《全民族战争论》也是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提出了现代战争是“全体性战争”或“全民族战争”的总体战理论。该书界定了全体性战争之本质和



基础（即民族之精神的一致团结），指出了经济与全体性战争的关系，强调了国防军之实力、成分及其使用，并论述了全体性战争的实施和主帅。抗日战争期间，亟需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对军队的全力支持和团结协作，因而此书具有极强的借鉴作用。此书在国统区共有3个不同译者的译本，至少出版6个版次：①董问樵所译《全民战争》；②张君勱所译《全民族战争论》；③邱祖铭所译《整个战争》。

2. 军事学术译著

军事学术是关于战争指导和武装力量建设的理论及其应用的各学科的总称，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制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军事教育训练学、国防经济学、军事运筹学，以及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军事心理等学科。其中，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是军事学术的主导部分。

（1）战略学译著

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军事译著中，有关战略学的有10多本。这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队了解西方战略学发展动态的需要密切相关。战略学是研究战争全局和全局性战争指导规律的学科。战略学在军事学术中居于主导地位。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实战运用，主要内容包括：现代战争中战略指挥、战略进攻、战略防御、战略机动、战略突袭、战略保障等。具有代表性的战略学著作有《机械化战争》《海军战略》《制空权》等。这些著作均在大后方得以译介。

抗战时期，机械化战略对于抵抗日军侵略也极为重要。英国富勒（John C. Fuller）所著《机械化战争论》介绍了机械化战争的发展史、理论及实例，创立了机械化战争理论。该书由李志纯翻译，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英国著名军事家李特尔·赫德（Liddell Hart）的著作分析了二战初期英法联军失败的原因及改进方法，并附有德军战略的分析。该书由蒋学模翻译，以《机动防御战略》一名出版。

抗战时期制空权的争夺相当激烈，因此有关空军战略的著作也被译介。例如，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的《制空论》提出了空军制胜论。该书由冯德彪、游崇鼎翻译，重庆青年书店出版。又如美国空军战略战术权威塞凡斯基（Alexander P. De Seversky）所著的《空军称霸时代》，包含空军称霸时代、海军的没落和驳林白的谬论三篇文章，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编译。

抗战时期，海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相应地，也有一些海军战略译著得到出版。例如，美国马汉（Alfred T. Mahan）所著的《海军战略》，内容有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之战略形势，日俄战争之研究，海岸设防与海军战略之关系等，提出了“海权论”的思想，阐述了海军战略理论体系。该书由蔡鸿干翻译，海军第二工厂学术研究室出版。



(2) 战术学译著

抗战时期国统区有关战术学的军事译著约 80 余本。战术学,是研究战斗规律和战斗指导规律的学科。其主要内容有:战斗的本质特点和要素,战斗的特点和规律,战斗诸要素,诸战斗队形、各军种、兵种在战斗中的地位、作用和使用原则,战斗的指挥和协同;进攻战斗,防御战斗等。

陆军一直是中国抗战部队的主力,因此,译介国外先进的陆军战术理论对于抗日军队而言就尤显重要。例如,苏联军事理论家德重昂达非洛夫所著《苏联现代陆军作战之特质》,由宋逢春译,介绍了现代陆军的状况、作战地准备位置、作战与连续作战。

抗战时期制空权的争夺相当激烈。自然,军事翻译对国外空军战术也十分重视。例如,沙波夫讲授,空军第十二中队所译《空军战术讲义》,由航空委员会军政厅编译处出版。内容有:空战、日本轰炸机之战术、驱逐机与轰炸机之协同、空军在山地战之效能、防空、侦察等。该书另附“敌机袭川袭渝要图”,突出其译著强烈的针对性。又如(捷)米克谢著,郭麟、郭道武译《空降部队》,由重庆陆大出版社出版,主要内容有:空降观念之发展、低地国家中之空降部队、巴尔干战役及克里特岛、空降部队之战术运用、降落、空降师等。

鉴于日军在中国屡屡使用化学武器,因而有必要译介化学战术方面的书籍。例如,泼冷颠斯(M. Prentiss)所著、孙宝则译《化学战术》,探讨了各兵种的化学战术及技术、化学战的防御法。该书“译者序”中写道:“近月来国人对化学战似已略加注意,宜昌之役,已证实敌人使用毒气,重庆且有着手防毒设施之议,惜一般人对于化学战仍乏智识:所以敌人施毒时,到底将成何状态,个人的防御和集体的防御,究应怎样,本书至少可以解决这许多苦闷的问题。”这段话显示出化学防御的军事译著对于抗战的重要性。

(3) 军事心理学译著

心理攻势对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很重要。抗战时期,有关军事心理的译著至少 5 种。法拉哥(Ladislav Farago)主编,美国国家精神委员会组织编写,萧孝嵘、丁祖荫翻译的《德国心理战》(*German Psychological Warfare*)一书介绍了全面战争中之心理和德国心理战;其目的在于使美国人明了德国纳粹军事心理学的背景、组织、功用及其发展,以利美国国防。该书的译介可以为我国抵抗日军的心理战提供借鉴。

四、军事情报译著

抗战时期国统区有 40 余种译著讨论军事情报和间谍。军事情报是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敌对国家、集团和战区的有关情况以及对其研究判断的成果。它是制定



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其内容通常包括：敌方军事思想，战略方针和作战意图；军队编制、装备和部署，特别是武器的配置；军事人物；军队训练素质，作战特点；兵要地志，军事目标；战场准备；战争潜力；后勤保障等等。我方情报人员通过各种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搜集的资料，是军事情报研究的物质基础。经验证明，对军事情报判断和使用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作战的胜败。

1. 军事情报学译著

军事情报学对于情报的收集、间谍的使用，以及对敌方间谍的防范都有指导意义。因而，国统区也出现了这方面的译著。例如，史威来（W. C. Sweeney）著，袁进荣译的《军事情报》一书，讲述军事情报的演进、定义、搜集、判断、分配，各级情报员的必备条件以及现代战争的各种问题等。路威（R. W. Rowan）著，胡愈之翻译的《战争与间谍》介绍了现代战争与间谍、现代间谍制度的发展、间谍工作的基本原则、女间谍、反间谍制度、历史上的间谍等。

2. 敌军国情和军情译著

专门论及日本国情及军情的译著也有 10 多种。鄂康乐（Taid O'Conroy）著，陈焰谟翻译《日本的威胁》，对日本的政情、社会思想及日本侵华战争进行了评述；包括日本历史、日本的灵魂、佛教与基督教、教育、日本妇女、从皇室复兴到欧洲大战时代日本爱国思想之发达、战争与战后日本、九一八事变琐言等。又如，Washington 著，由田世英译的《日本战术总论》介绍了日本战术中的登陆战、陆军、空军、空军陆战队、通信、夜间战斗、伪装、补给、装备等情况。

3. 战斗情报的翻译

战时，各战区司令部参谋处作为重要的军事情报收集、整理、研究机构，也从事了很多翻译活动，目前已发现的各战区司令部、各部队刊印的军事情报译著达 10 余本。如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处 1939 年编译的《敌第十兵站自动车队专号（敌情汇编第 914 号）》，由俘获日军缴获的文件摘译汇编而成，分两部分，包括第十兵站自动车队“金泽队”文件及第十兵站自动车队第六中队“海老原队”文件。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处 1943 年编译刊印了《第六战区常德会战获敌文件汇编》。精忠军在二三次长沙会战前后也编译了《第二次长沙会战俘虏敌军机密文件译本（敌情汇编第 919 号）》《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敌第十一军及四十军团作战情报及其他（敌情汇编第 901 号）》等译本。从敌情汇编的编号来看，所知最大的为 919 号，可以推测当时各战区司令部编译刊印的日本军事情报资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信阳战斗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军事情报翻译的重要性。信阳战斗是 1938 年 6 月至 10 月武汉会战中的一部分。10 日，日军第二集团军主力部队沿平汉铁路南下。19 日，中国军队第 809 团围歼了日军某中队，俘获了日军的一份作战文书，经过翻译和分析，



发现这是日军毛利支队的作战要旨。我军由此获知了日军的突进路线,据此事先调整了兵力,设好埋伏。23日,日军1200多人落入包围圈被中国军队歼灭(蔡仁照,2001:256)。此战,翻译的作用不可小觑。

五、军事宣传译著

军事宣传对于战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抗战时期,军事宣传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针对日军、日本国内民众及日侨的反战宣传,二是针对后方民众的世界战报道,包括报告文学、纪实、通讯报道、游记、见闻录、回忆录、战地日记等。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版了80余本军事宣传译著。

1. 世界战况的译介

战时的民众,渴望了解欧洲、太平洋等战场的动态,交战各国(美、英、苏、德、日等)的形势,以及战争中其他国家的军民生活。因此,有军事译著报道欧战、太平洋战争等局势。例如,《欧战速写》,米奇(A. A. Michie)、格莱布纳(W. Graebner)著,屯人翻译。该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通讯报道,包括:撤退敦刻尔克、轰炸鲁尔、护航、冲过封锁线、伦敦大火、伦敦空战等篇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我国对法国战局的译介较为完整。根室(J. Gunther)著,董嘉瑞译的《法国沦陷记》,讲述了法国的溃败经过。Etta Shiber著,汤一雯译《地下巴黎》,记述1940—1942年间巴黎的地下反纳粹活动。裘屈罗·斯坦因(Gertrude Stein)著,徐迟译的《解放,是荣耀的!》一书则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法国在盟军和游击队的协力作战下获得解放的过程。这几本译著为读者勾画了法国从战败、到抗争、再到胜利的三个阶段,这无疑会为抗战中的军民带来莫大的启发。

2. 反战宣传翻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要的宣传机构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对敌科)等。对外宣传的主要目的在于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残暴与日军侵略必然失败的真相,激起在华日军、日本国内民众及海外侨民普遍的反战情绪,瓦解日军。宣传的主要途径是广播、传单、报刊等。国民政府积极组织人员编译日文及其他外语书籍和宣传小册子。将英国人田伯烈(H. J. Timperley)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意大利人樊思伯著《日本间谍》等书译成日文,对日军及日侨进行反战宣传,迫使日军收敛其残暴行为(易振龙,2011:175)。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多语种译本在欧洲、美国、亚洲流传甚广,影响甚大。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当地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当时就有英美记者向外界公布日军暴行,对此进行强烈谴责。田伯烈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华记者,搜集了大量日军侵华的第一手资料,用英文编著了 *What War Means: The Japa-*



nese Terror in China 一书。他在书中首次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及宁沪一线大屠杀的暴行，公布了日军屠杀 30 万以上中国平民这一数字（文俊雄，2004）。1938 年 6 月该书在英国出版，发行 1 万册（Timperley，1938）。1938 年在纽约刊印，1940 年 3 月在印度也得到刊印。

国际宣传处早在田伯烈回英国出书之前，便购得副本，组织译者杨明赶译为中文，由汉口国民出版社于 1938 年 7 月出版，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当时正值全面抗战一周年，国民政府前后共印该书 10 万册，由国际宣传处分送各党政军各机关和各团体、社会名流等，将 1 万册交由正中书局代售，向民间展开宣传^①。国际宣传处还将该书翻译为日文版本，书名为《所谓战争》，印 1 万册，在香港、上海及海外发行。此外，该书还被翻译成其他外语。1939 年，比利时中国友谊会根据该书英文版翻译成法文，在比利时印刷发行。该书的丹麦文本在哥本哈根地区刊印 1 万册（郭存孝，2006：45）。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日文版本后来传入日本，成了对日反战宣言。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读后，曾发布《告日本全体将士书》，被迫承认在华日军在南京有“辱国行动”，并假惺惺地对全军提出“训诫”。（郭存孝，2006：45）可以看出，该书的翻译出版有助于世界人民认清日本的侵略罪行，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国际同情与声援。

还有一些军事译著主要针对国内民众，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部队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揭示日本必败的命运，激励国内民众的抗日激情，为中国抗战树立信心。例如，A. Zuxin 著，孟勃翻译的《日本侵占东北九年的“成果”》，内容包括：得不偿失的工业侵略、强占农民耕地造成荒歉、奴隶制度下的工人、日人毒化东北、奴化教育与协合会、监牢生活的武装移民等。

六、结论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军事翻译活动非常活跃，译著出版数量众多，内容十分丰富。在军事理论方面，既有译介经典军事思想的著作，也有反法西斯主义的译著；既讨论战略学，又顾及战术学；既面向军事院校军事人才培养，又针对后方普通民众进行军事普及教育；既回顾军事史，又译介国外最新军事学术，如军事心理学、国防经济学等。在军事情报方面，既介绍情报学，又论及日本等国情及军情，还大量编译事关具体战役战斗成败的重要情报。在军事科技方面，既讨论战争与科学的关系，介绍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又传播军事工程知识。在军事宣传方面，既针对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又针对我国后方民众报道世界战况。

对抗战大后方而言，翻译是一种传递军事信息、加强国际合作和沟通的手段，是



极其宝贵的精神食粮,它激励大后方军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在敌我交锋的战场上,军事翻译是生死攸关的,它成为一种武器,发挥出类似子弹的战斗力,制敌于疆场。

正如蒙娜·贝克(Baker, 2006: 2)所言:口、笔译是战争得以实现的因素之一,翻译在各方控制冲突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影响了军事冲突的发展过程。抗战时期,军事翻译广泛存在于抗日战争的各个阶段,如宣战、备战、作战等。军事翻译作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战争的进程,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

- ①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

参考文献

- [1]蔡仁照.中国抗日时期的战争[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 [2]陈石平,成英.军事翻译家刘伯承[M].北京:书海出版社,1988.
- [3]邓贤.在同一面旗帜下:抗日二战老兵回忆录[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 [4]方梦之.军事翻译[A].见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 [5]郭存孝.中澳关系的流金岁月[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6]何宇.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A].见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9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2-259.
- [7]黎难秋.中国口译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 [8]罗天.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J].王宏志.翻译史研究(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23-249.
- [9]罗天.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口译活动.译苑新谭(第四辑)[J].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280-297.
- [10]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3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 [11]钱念孙.无法尘封的历史 抗战旧书收藏笔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 [12]文俊雄.田伯烈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J].民国档案,2004(1):53-59.
- [13]吴树凡.浅谈军事翻译的地位和作用[J].上海科技翻译,1991(2):12-14.
- [14]易振龙.被湮没的抗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敌宣传[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8-8):89-90.
- [15]Baker, Mona. Foreword[A]. In Mona Baker (ed.).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Narrative Account*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
- [16]Timperley, Harold John (ed.),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A Documenta-*



ry Record. Gollancz, Ltd., 1938.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跨学科视角的抗战时期军事翻译研究（编号 16YJA74002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罗天，男，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澳门大学博士。研究方向：语篇分析与翻译，翻译及跨文化研究，军事翻译史等。

[电子邮箱] kkkluo@foxmail.com

马若瑟《赵氏孤儿》法译版中 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的翻译策略研究

唐 果

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意大利语系

摘 要：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马若瑟于 1735 年翻译了《赵氏孤儿》。此剧本在中西戏剧交流的过程中承担着媒介角色，是戏剧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在翻译的过程中，马若瑟兼及中西戏剧文学思想，开创了中国戏剧法语翻译的范式，对中国戏剧的西进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目前为止，有关马若瑟翻译的学术研究多将关注点集中在唱词部分，指出译者对原文本中唱词的删减，并以此作为评价这部翻译作品优劣的标准，还未有学者将关注点放在唱词以外的其他杂剧元素的处理上，即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的翻译处理。元杂剧《赵氏孤儿》本是兼具文学性和舞台性的剧本，其中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部分充分显示了杂剧既是文学又是艺术的二元性。所以，对这三要素的研究不仅有利于马若瑟翻译策略的清晰呈现，体现他对中国元杂剧舞台性的处理手法，也裨益于了解中国戏剧文学在启蒙时代的域外传播语境。这正是本论文需要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马若瑟；《赵氏孤儿》法译；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Spoken Parts, Formalised Title, and Role Indications in Joseph de Prémare's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Orphan of Zhao*

Tang Guo

(Department of French and Italia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The Orphan of Zhao* was translated in 1735 by Joseph de Prémare, a Jesuit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This translation plays a medi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s, and it can not be ignor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si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Joseph de Prémare combines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tic literary thoughts, creating a paradigm for Frenc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ramas, which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westwar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amas. So far,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Joseph de Prémare's translation has mostly focused on the lyrics, pointing out that the translator has deleted the lyrics from the source text, and using this as a criterion to evaluat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is translated work. Up to now, few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translation of other theatral elements besides lyrics, such as spoken parts, formalised title, and role indications. *The Orphan of Zhao* is a script with both literariness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m, the spoken parts, formalised title, and role indications fully show the literariness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Yuan Drama.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se three element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clear presentation of Joseph de Prémar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flecting his handling of the stage of Chinese Yuan Drama, but also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context of Chinese drama literature in the Enlightenment era,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is paper needs to study.

Key Words: Joseph de Prémare; *The Orphan of Zhao*'s French translation; spoken parts; formalised title; role indications

引言

活跃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汉学家霍尔巴（Rohrbacher）在回顾十八世纪法国汉学历程时总结道：“十八世纪的法国还处在一个对‘中国文学尚不熟悉’的时代。”（Rohrbacher, 1848: 518）出于语言原因，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辐射能力非常局限。十八世纪，通过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工作，中国文学首次登陆欧洲。法国翻译界知名学者霍夫（Henri Van Hoof）认为：“在中国文学西传之旅的历史中，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具有开创性意义^①”（Henri Van Hoof, 1991:62）。汉学家马若瑟曾接受过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十八世纪耶稣会来华传教的时代，是法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早期研究马若瑟汉学的代表学者是张西平，其论文《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2009）论述了马若瑟进行汉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和在汉学专著上的实践表现及成绩。其他较深入的马若瑟人物研究还包括：李真的《雷慕沙与马若瑟汉语语法著作比较研究》（2014），刘亚辉的《马若瑟〈汉语札记〉中的语法化、词汇化意识——以“以”的研究为例》（2015）。然而，上述文献中凡涉及其戏剧翻译的部分，多侧重于史实的介绍。此外，一些研究《赵氏孤儿》海外传播的学者，如刘艳春、赵长江，曾指出马若瑟对原剧本唱词的大幅删减，导致法译本不精准完整，并不接近源戏剧文化的真实状态。元杂剧作为盛行于元代的传统戏曲艺术，由于其以唱为主，所以把说白叫做宾白。明徐渭《南词叙录》曰：“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当今学者将关注度集中在为“主”的唱词部分上无可厚非。然



而,笔者认为,元杂剧是由多种表现手段整合在一起演绎的综合戏剧艺术,《赵氏孤儿》一本五折、一人主唱虽是其基本模式,然而,剧中的其他戏剧元素,如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的运用为这出戏剧增色不少。可惜这一交流语境中的《赵氏孤儿》法译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是空白。本论文通过细读翻译文本,重点研究马若瑟处理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的方式,总结出其翻译手法具有将元杂剧二元性转为单一性的特点,透视译者传播中国戏剧文化的拳拳之忱,并借助译本在启蒙时代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在中法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

一、概括性宾白部分的删除:避免信息传输过载

元杂剧的诞生离不开戏剧叙事功能的强化和戏剧故事的世俗化,因此,元杂剧的演述方式与讲唱文艺有同工之妙,大量的词话韵语穿插在故事的整体结构里。在《赵氏孤儿》剧本中有大量以“诗云”“词云”所标示的用于戏剧人物念诵的韵语。启蒙时代法国大文豪伏尔泰(Voltaire)在读完《赵氏孤儿》后也不禁感叹,《赵氏孤儿》剧本结构相对于法国古典戏剧严谨紧凑的“三整一律”(trois unités)是何等的不规则:“我们简直可以把《赵氏孤儿》看作是《一千零一夜》的戏剧版^②。”(Voltaire, 2009: 113)所以,马若瑟在翻译宾白时,尽量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努力将缺省的文化因素加以解释和传递。他在翻译时的具体策略体现在保留用以推动剧情的宾白,删除用以概括剧情大意的韵语。笔者在对比纪君祥的原剧本和马若瑟的法译剧本后,整理了宾白的残缺部分,以下展现几处实例。

首先,《赵氏孤儿》戏曲剧本中的宾白用“云”表示段落由白话和部分韵语组成。讲唱形式直接被运用在故事背景交待及人物内心情感抒发中。马若瑟翻译了大部分代表陈述的“云”,包括人物的对白和独白。原剧本中每每出现“云”的部分,作者纪君祥都会给出一个提示,这一类的“云”,马若瑟在翻译中都会标明。如第一折第四幕:

原文:(旦儿云):程婴!(诗云):可不道,遇急思亲戚,临危拖故人。(纪君祥, 1998: 217)

法译本: La Princesse, elle récite des vers: quand vous êtes dans une situation critique, songez à vos parents. Quand vous êtes en danger, confiez-vous à vos amis. (Prémare, 1755: 23)

从马若瑟翻译的用词句法上来看,译者偏向于使用简单词与简短句等将法译台词口语化,将诗词转化为散文,以通俗易懂为基本翻译准则,以符合十八世纪法国读者的解码能力。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马若瑟并没有保留全部的宾白,而是有意删除了部分。从功能上来看,马若瑟重点删除秉承辅助叙述的功能的宾白,也就是对曲词、



散白进行重复和提示的“词云”或“诗云”。以下列举两例：

第一例：屠岸贾设计陷害忠臣赵盾一族，给赵盾扣上了不忠不孝的帽子，将赵氏满门良贱三百多口赶尽杀绝。此时，公主腹中已经有了赵朔的孩子，赵朔在临死前给孩子取了一个小名叫“赵氏孤儿”。在序幕最后部分，赵朔去世，公主被囚禁，回报情况的信使朗诵了一段诗文：

原文：（旦儿云）天那，可怜害的俺一家死无葬身之地也！（赵朔唱）【么篇】落不的身埋在故丘。（云）公主，我嘱咐你的说话，你牢记者！（旦儿云）妾身知道了也！（赵朔唱）分付了腮边雨泪流，俺一句一回愁；待孩儿他年长后，着与俺这三百口，可兀的报冤仇。（死科，下）（旦儿云）驸马！则被你痛杀我也！（下）（使命云）赵朔用短刀身，亡了也。公主已囚在府中，小官须回主公的话去来。（诗云）西戎当日进神獒，赵家百口命难逃；可怜公主犹囚禁，赵朔能无决短刀！（下）（纪君祥，1998：208）

法译本：Prologue, scène III.

LA PRINCESSE.

Ciel! Prenez-pitié de nous on a massacré toute notre maison; les corps de ces innocens sont restés sans sépulture.

TCHAO -SO.

(En chantant.) Je n'aurai point de sépulture non plus qu'eux. O Princesse, retenez bien ce que je vous ai recommandé.

LA PRINCESSE,

Je ne l'oublierai jamais. (Tchao-so lui remet dans la mémoire en chantant, & se tué avec le poignard.)

Ah: Cher époux, vous me faites mourir de douleur.

L'envoyé

Tchao-so n'est plus. Son épouse est en prison chez elle, il faut que j'aille rendre compte de ma mission. (Prémare, 1755: 28)

通过对比马若瑟版本和纪君祥原剧本，很明显的看到，马若瑟删掉了最后诗云部分，即“（诗云）西戎当日进神獒，赵家百口命难逃；可怜公主犹囚禁，赵朔能无决短刀！（下）”的部分。《赵氏孤儿》的宾白具有明显的程式化特点，主要分布于开头、结尾以及剧中特定的位置，遵循着七言句的基本形式。这一段位于结尾的诗云实际上凸显了强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以获得惊心动魄的悲剧效果。“西戎当日进神獒，赵家百



口命难逃；可怜公主犹囚禁，赵朔能无决短刀”不仅通过说白交待了故事的背景及现实状况，同时又表现出了人物的个性化：公主的可怜与赵朔的决绝。因此，马若瑟删除的这部分“词云”是《赵氏孤儿》剧本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对元代观众而言，它具有广而告之的宣传作用；对读者而言，它具有剧情概要的作用。然而马若瑟认为，这些“诗云”“词云”只会将剧情复杂化。既然与剧情推动无关，故不用翻译，以免增加剧情的复杂性。马若瑟的法译版本体现出语言的通俗性、简洁性，却忽略了语言的动作性及节奏性。

何萃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戏剧叙事研究——在结构体制与历史语境双重视角下》探讨了元杂剧宾白的文学功能，指出《戏剧宾白可容纳各体文字》（何萃，2015：3）。辅助叙述功能的“词云”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对散文部分的总结概括；其二，对散文部分进行补充说明；其三，引起注意，承上启下，提起下文。功能一和功能二起重复补充剧情的作用，实际上对剧情的更新并无帮助，主要是通过“云”的形式美和韵律美加强悲剧效果。由于目标语读者从未了解元杂剧，更是对“云”的诗体功能一窍不通，所以马若瑟只对功能三感兴趣。为了进一步佐证他的翻译策略，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例：第一折第一幕开篇，屠岸贾得知公主生子，欲斩草除根，想等孤儿满月时将其立即杀死：

原文：（屠岸贾云）是真个唤做赵氏孤儿？等一月满足，杀这小厮也不为迟。令人传我的号令去，着下将军韩厥，把住府门，不搜进去的，只搜出来的。若有盗出赵氏孤儿者，全家处斩，九族不留。一壁与我张挂榜文，遍告诸将，休得违误，自取其罪。（词云）不争晋公主怀孕在身，产孤儿是我仇人；待满月钢刀铡死，才称我削草除根。（纪君祥，1998：216）

法译本：

Acte I, scène I

Tou-gnan-cou.

‘Cela est-il bien vrai ! Quoi cet avorton s’appelle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Laissons passer un mois. J’aurai toujours assez de temps pour me défaire d’un petit Orphelin. (...) Si quelqu’un est assez hardi pour cacher cet enfant de Tchao, je le ferai mourir lui et toute sa race. (Prémare, 1755: 29-30)

再一次，马若瑟删除用以概括剧情的“词云”部分，即“不争晋公主怀孕在身，产孤儿是我仇人；待满月钢刀铡死，才称我削草除根”。纪君祥创作这一段“词云”的



价值表现在：屠岸贾的出场白为反面人物定好性格基调，宾白的反复突出人物性格，“词云”通过韵律强化人物形象。该部分利用宾白塑造反面人物的凶残形象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在马若瑟眼里，此类概括性宾白部分只会让翻译语言复杂化，对汉语丝毫没有任何了解的法国文人无法理解纪君祥的语言特色，更不用提韵语创造的悲壮戏剧效果。因此，为了避免信息传输过载，马若瑟放弃韵语节奏，通过有意的删减，使法国受众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情节上。

此举标示着马若瑟翻译剧本中文学性和舞台性的脱离，二元性到单元性的转换。马若瑟对剧本《赵氏孤儿》的改译正是在挣脱翻译文学系统的束缚之后才得以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获得成功。伏尔泰在写给黎齐留公爵的信中谈道：“尽管《赵氏孤儿》结构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尽管许多事件接连二三地发生，让人应接不暇。但是主线是明亮的，戏剧利益是清晰的，这两点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艺术创作都是必要条件。然而，我们法国许多现代著作都缺乏这两点^③。”（Voltaire, 2009: 113）法国当代戏剧理论家库斯塔（Jane Koustas）把戏剧语言作为舞台话语（*discours scénique*），也就是把戏剧的舞台性放在了第一位（Jane Koustas, 1988: 131）。马若瑟看重的是《赵氏孤儿》剧本的叙事性。作为一部历史剧，马若瑟看到了此剧展现出的对历史的超脱认识，译者真正想传播的是剧情中流露的中国剧作家关于儒家精神的观念和情感。马若瑟正是被其鲜明的审美特征和丰富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选择将这部剧本介绍给法国读者。因此马若瑟在翻译的时候以还原原文情节为主，韵脚等并不是译者关注的维度。

二、题目正名简化与角色指示的替代

除了删除归纳性功能的宾白外，马若瑟还进行了题目正名的简化与角色指示的替代，通过降低剧本的表现力，让传输思想的信道保持畅通。首先，题目正名是元明杂剧的劇情提要。在《赵氏孤儿》中，纪君祥用四句的韵语概括全剧主要关目“韩厥救舍命烈士，程婴说妒贤送子，义逢义公孙杵臼，冤报冤赵氏孤儿”（纪君祥，1998: 244）。按照元杂剧的传统，最后一句“冤报冤赵氏孤儿”作为该剧的全名，而此句的末四字“赵氏孤儿”（*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即为此剧的简称。《赵氏孤儿》题目正名的含义非常重要，不仅起到了概括剧情、品题人物的意义，更主要的是，通过题目正名对剧中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进行重点评判，并明确说明剧本旦本、末本的归属。“题目正名这样的架构含义，体现的则是与剧首楔子的呼应，以及代言体、人主唱表演体制的具化反映。”（赵锡淮，2015: 27）然而，马若瑟在其翻译本中，仅仅翻译了结尾四字“赵氏孤儿”作为题目。这一做法再一次体现马若瑟的翻译活动放弃了戏剧的舞台性，呈现出单元性的特征。这种策略符合译者所处的十八世纪文学环境。



马若瑟曾撰写过一篇《关于中国人的戏剧散笔》的文章。文中他再三强调：“（在我之前）几乎无人谈论中国人的戏剧，中国人的戏剧是完全不受三一律规定限制的^④。”（Prémare, 1755: 15）马若瑟翻译文本服务的对象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文人“读者”，而不是剧院“观众”。《赵氏孤儿》的题目正名受到元杂剧作家纪君祥的重视，是因为戏班演出前可以把题目正名写在“花招”上招徕顾客，这是缘于杂剧艺术本身的大众化试听欣赏要求。而马若瑟翻译的根本目的是把元杂剧作为文学作品介绍给法国读者，纯粹为阅读而翻译。因此，题目的翻译是静态的，法国读者可以一看就懂。容易理解是译者考虑的首要问题。

再次，《赵氏孤儿》人物角色分为旦、末、净、杂。但是马若瑟在翻译过程中，完全忽视人物角色指示，用具体的人物名称代替源文本出现的四类基本角色，旦末净杂，以及每类以下更细致的区分：

原文	法译本
旦	LA PRINCESSE, Fille du Roi & Epouse de Tchao-so（公主）
正末	TCHING-POEI, ou l'Orphelin de Tchao（程勃）
冲末	TCHAO-SO, Fils de Tchao-tune, Gendre du Roi（赵朔）
正末	HAN - KUE, Mandarin d'Armes（韩厥） KONGNG - SUNE, vieux ministre d'Etat retiré à la campagne（公孙杵臼）
外末	TCHING -ING, Médecin（程婴）
外末	OUEI-FONG, Grand officier du Roi（魏绛）
净	TOU-NGAN-COU, Premier Ministre de la Guerre（屠岸贾）

在翻译的过程中，马若瑟删掉了原文本的全部角色指示，通过具体的人名来替代旦末净杂。更甚者，马若瑟担心法国读者迷失在绕口的中文名里，所以，在翻译开篇，就精心准备了一张人物列表，注明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公主（LA PRINCESSE）：Fille du Roi & Epouse de Tchao-so（皇帝的女儿即赵朔的妻子）；赵朔（TCHAO-SO）：Fils de Tchao-tune, Gendre du Roi.（赵盾的儿子即皇帝的女婿）；韩厥（HAN - KUE）：Mandarin d'Armes（朝廷将军）；程婴 TCHING -ING, Médecin（医生）；公孙杵臼（KONGNG - SUNE）：vieux ministre d'Etat retiré à la campagne（前朝归隐田间的旧臣）等等。马若瑟对角色指示的改动表明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马若瑟译戏的宗旨并不在于排演。他内心很清楚，当时的法国还没有能够胜任元杂剧演出的剧团和演员。《赵氏孤儿》中的每个角色指示都对应了丰富多彩的腔调积累。正旦“公主”是歌唱的主要女演员。末包括正末、冲末、外末。正末“韩厥”和“公孙杵臼”是歌唱的主要男



演员，外末“程婴”和“魏绛”是次要的男演员，冲末“赵朔”是首次上场的男演员。净“屠岸贾”是性格暴烈的男演员。这些看似细致入微的角色区分实际上有其严谨独具特色的结构形式，以精湛的歌唱艺术和器乐演奏为支撑。精通中国戏剧的马若瑟传教士深知，通过几百年无数中国艺人的探求和实践，北曲这一声腔系统的艺术创造才最终完成，但对于从未接触过任何中国戏剧的法国读者来说，他们不可能理解旦、末、净、杂的含义，特别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程婴并不是由正末来扮演。即便马若瑟煞费苦心解释清楚角色指示的作用，法国读者对剧中人物关系也始终琢磨不透。十八世纪汉学推广的主要人物杜哈德（Du Halde）也在其《中华帝国志》中劝告法国读者：当你们阅读《赵氏孤儿》时，“请不要过分去寻找西方古典戏剧教条化的行为规则，因为中国人对此毫不知情。请牢记，他们是生活在地球的另一端，与我们的世界是完全分离的^⑤。”（Du Halde, 1736: 419）所以，评价马若瑟的翻译本，不应该过分强调戏剧翻译的二元对立，应该立足于十八世纪的实际情况，承认文本意义的多层性。从意义的多层次性出发，就可以看清马若瑟对元杂剧的翻译主要是其对剧目的选择问题。影响译者选择《赵氏孤儿》进行翻译的因素有三点：

第一，翻译目的。介绍有关“忠”与“孝”的儒家思想内涵。马若瑟《赵氏孤儿》法译本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首次出版后，其流露的中国精神引起了当地多家知名报刊的注意。《文人期刊》（*Journal des savants*）于1756年评论道：“这个奇怪的中国戏剧值得我们认真深思^⑥。”（Anonyme, 1755: 89）十八世纪法国文学评论家巴修蒙（Bachaumont）在《秘密文集》期刊（*Mémoires secrets*）发表文章《中国悲剧》（*Tragédie chinoise*），强调法国本地读者看重的是从悲剧中获得的情感体验：“实际上，《赵氏孤儿》诗与歌混合的文体结构在十八世纪法国读者的眼中更像一部闲散的田园诗歌。但是，它激起的恐惧与怜悯的情感，足以使这部中国戏剧到达悲剧的高度^⑦。”（Bachaumont, 1781: 181）

第二，文本类型。虽然《赵氏孤儿》是戏剧文本，但是马若瑟在前言中特别注明：“《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相关的历史事件记载见于司马迁《史记·赵世家》。”（Prémare, 1755: 85）但相比史记，《赵氏孤儿》的情节明显较略。戏剧情节叙述了春秋时期晋贵族赵氏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后为家族复仇的故事，情节单线推动，清楚了。

第三，读者类型。十八世纪的法国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马若瑟在信箋中解释了元杂剧演出中演员发挥的重要性，以及读剧和观剧的区别。启蒙剧作家雷诺（Raynouard）在《外国期刊》（*Journal Etranger*）中也承认法国人对元杂剧的曲谱格律和板腔规则并不感兴趣：“人们并不期待可以在中国戏剧中找到西方艺术创作的规律。^⑧”（Raynouard, 1755: 219）因此，马若瑟从口语化和个性化这两个方面改译表演语言，



其目的是使该剧目符合十八世纪法国读者的阅读口味。

三、结语

本论文从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这三大杂剧元素入手,建立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马若瑟《赵氏孤儿》法语翻译研究体系。马若瑟的十八世纪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身份,使其译文受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干扰。马若瑟的翻译受戏剧舞台戏的羁绊和困扰,并没有展现出一个完整的元杂剧的艺术形态。马若瑟的翻译语言在文化或美学意味上有意或者无意的改动正是中西戏剧文化中“自我”与“他者”互识的写照。

马若瑟的翻译策略实际上建立在从杂剧文本意义出发的单元性体系上,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马若瑟根本没有考虑在法国舞台上演中国剧本。所以,在宾白翻译的处理上,译者删掉了影响剧情推动的诗词;在题目正名翻译的处理上,译者只保留了点名中心故事的简称《赵氏孤儿》;在角色指示翻译的处理上,译者用具体人名替代所有角色行当。这次翻译从广义上来说,是纯粹的中国古典悲剧剧本第一次和法国社会的接触。受制于戏剧独特的“二元”属性以及戏剧翻译的跨学科性质,马若瑟对宾白、题目正名、角色指示的翻译策略,体现了他对中国元杂剧舞台性的处理手法。虽然马若瑟删掉了大量能够突出表演效果的部分,导致译文在语言、风格等层面与原文本有差异,难以还原元杂剧发展、演出的历史文化语境,但正是因为马若瑟的翻译语言简明,成功地使法国读者达成对故事情节、杂剧冲突的充分理解,中国戏剧才得以展示在西方读者的面前,最终引起一系列的改变。所以《赵氏孤儿》法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起的桥梁和枢纽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①法语原文: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enfin, fait son entrée en France dans des traductions du Père Prémare, qui donne Tchao-chi-con-eulh ou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tragédie chinoise, traduite en français avec des éclaircissements sur le théâtre chinois.

②法语原文:On ne peut comparer“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qu'aux“Mille et une Nuits”en actions et en scènes.

③法语原文:Malgré l'incroyable, il y règne de l'intérêt; et malgré la foule des événements, tout est de la clarté la plus lumineuse: ce sont deux grands mérites en tout temps et chez toutes les nations, et ce mérite manque à beaucoup de nos pièces modernes.

④原文:Il y a peu de chose à dire sur ce sujet, parce que les Chinois ne se sont point assujettis à des règles fixes et certaines dans la composition de leurs pièces de Théâtre, ils n'ont



point ce que nous appelions unité d'action, de temps & de lieu.

⑤法语原文: Il ne faut pas y chercher les trois unités du temps, du lieu et de l'action, ni les autres règles que nous observons pour donner de la régularité et de l'agrément à ces sortes d'ouvrages (....) Ces règles, qui nous sont propres, ont été inconnues aux Chinois, lesquels ont toujours vécu comme dans un monde séparé du reste de l'Univers.

⑥法语原文: Cette bizarre pièce pourrait donner lieu à une multitude de réflexions.

⑦法语原文: En effet, à cause du mélange de poésie, de chant et de théâtre,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semble aux yeux des Français du XVIIIe siècle « d'un genre plus rapproché des Bergeries », pourtant, « comme elle excite la terreur et la pitié, on l'élève au rang des tragédies ».

⑧法语原文: On ne s'attend pas sans doute à trouver dans la pièce chinoise nos règles de théâtre rigoureusement pratiquées.

参考文献

- [1]何萃. 中国古典戏剧叙事研究——在结构体制与历史语境双重视角下[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5.
- [2]纪君祥. 赵氏孤儿[A]. 见顾学颉. 元人杂剧选[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207-244.
- [3]李真. 雷慕沙与马若瑟汉语语法著作比较研究[J]. 国际汉学, 2014(1): 126-135.
- [4]刘亚辉. 马若瑟《汉语札记》中的语法化、词汇化意识——以“以”的研究为例[J]. 汉语学习, 2015(1): 93-100.
- [5]刘艳春, 赵长江. 《赵氏孤儿》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J]. 河北学刊, 2015(1): 95-99.
- [6]张西平.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J]. 清史研究, 2009(5): 38-46.
- [7]赵锡淮. “题目正名”之我见[J]. 四川戏剧, 2012(1): 27-29.
- [8]Anonyme. La tragédie chinoise[J]. *Journal étranger*. 1755(9): 216-220.
- [9]Bachaumont, Louis Petit de. Tragédie chinoise[J]. *Mémoires secrets*, 1781(7): 161-163.
- [10]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M]. Paris: chez Henri Scheurleer, 1736.
- [11]Hoof, Henri Van. *Histoire de la traduction en Occident*[M]. Paris: Duculot, 1991.
- [12]Ji, Junxiang.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 Tchao-shi Guer*[Z]. Traduit par Joseph Henri Pémare. Pékin: S. N, 1755.
- [13]Koustas, Jane. Traduire ou ne pas traduire le théâtre? L'approche sémiotique [J].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1988(1): 130-146.
- [14]Prémare J. *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M]. Paris: Sorel-Desflottes, 1755.
- [15]Raynouard. Tchao-Chi-Kou-Eul, ou l'Orphelin de la Chine; drame en prose et en vers[J]. *Journal des savants*, 1834(4): 219-228.



- [16] René François, Rohrbacher.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église catholique: An 1660-1730*[M]. Liège :Imprimerie de J.-G. Lardinois, 1848.
- [17] Voltaire. *L'Orphelin de la Chine, tragédie représent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Paris, le 20 août 1755*[M]. Ed. Basil Guy,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45A.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9.

[基金项目] 此论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8 校级科研项目《十八世纪法国翻译理念框架下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SISU2018041)

[作者简介] 唐果,女,博士,博士后,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意大利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十八世纪法国文学。

[电子邮箱] sugar319@qq.com

翻译与“冒充” ——从《礼拜六》中没有原作者的“翻译”说起

钟 毅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

摘 要：鸳鸯蝴蝶派的重要杂志《礼拜六》，在1914年6月—1916年4月出版的前一百期杂志中，有大量没有标明原作者，仅有译者姓名的“翻译”小说。这些所谓翻译的小说与晚清当时许多翻译作品一样，是“著作”还是“译作”分不清楚，很多作品两者都兼而有之。本文结合美国黑人研究和“酷尔理论”（queer theory）中的发展起来的“冒充”（passing），对这些所谓的翻译小说进行分析，以说明对这些小说的理解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同时探讨这些翻译小说中的“冒充”因素，以揭示翻译矛盾的本质——让来自异域的“陌生感”与本土的“熟悉感”和谐共存。

关键词：《礼拜六》；冒充；翻译小说；译述

Translation and “Passing”: The Blending of “Self” and the “Other” in the Translated Fictions *Saturday*

Zhong Yi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Saturday*, the important magazine of the School of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was published one hundred issues between June 1914 and April 1916. In these one hundred issues, there were many “translated” fictions which only marked the translator’s name without clarifying the original author. These so-called “translations”, like many “translated work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re difficult for the readers to discern whether they were creation or translation. In fact, the elements of both creation and translation could be found in them. This paper puts these works back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such “translated fictions”. Combining with the notion of “passing” which developed from African American study and Queer Theor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lements of passing as translation in these “translated fictions”, so as to reveal how the strangenes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familiarity from local, how the “other” and the “self” could exist in harmony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Saturday*; passing; translated fiction; free rendering

鸳鸯蝴蝶派的重要杂志《礼拜六》，总共出版了 200 期。前 100 期是从 1914 年 6 月到 1916 年 4 月，后 100 期则在 1921 年到 1923 年期间出版。前一百期和后一百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在前一百期里有很多翻译的小说，而后一百期里，翻译作品却很少，“粗略估计在《礼拜六》前百期中，（翻译）就有 250 篇之多”（赵孝萱，2003：108）。这些翻译小说在《礼拜六》的出现形式有三种：一、既标明了原作者，也标明了译者。《礼拜六》中大多数翻译小说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如：前一百期中 Willam Le Queux 和 Conan Doyle 的侦探小说。二、只有译者的名字，没有标明原作者。这种形式出现的翻译小说量还不少，初步统计，前百期中这样的小说有近 70 篇，如大多数周瘦鹃的翻译都只有“瘦鹃译”的字样。三、译者的名字后面加上“译述”或者“述意”二字。这样的作品相对数量较少，除了“译述”，还有如第 71 期中的诙谐小说《诗人》，标明的是伯雄“述意”，绣铁“润辞”等。

只有标明了原作者与译者的小说，我们才能去考查其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而另外两种，是清末民初常见的“译”“述”和“译述”不分的情况，如果说当时的翻译形式存在的情况有直译、改易和杜撰，那么，《礼拜六》中后两种翻译小说，至少为改易，甚至是杜撰。翻译作品在同一本杂志中为何会出现这三种形式？为何没人质疑后两种作品作为翻译的“身份”呢？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三种形式的存在，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追根溯源；而要理解为什么这些作品会被当作翻译作品来看待，就要更详细地分析它们身上“冒充”翻译的因素。

一、《礼拜六》：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的缩影

中国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翻译高潮：始于东汉末年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又有学者按照翻译内容和对象把一部中国翻译史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邹振环，1994：1）。按此标准，《礼拜六》周刊创刊于 1914 年，正值西学翻译高潮之时。这个阶段，翻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救国、强国。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得洋务派这一翻译主张彻底破灭，也使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猛醒，认识到西人之强不仅仅在于器物，而根本在于其社会政治制度。因此，这个阶段翻译选材非常广泛——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专注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政治著作，而梁启超则倡导小说界革命，提倡翻译政治小说以启发民智，为晚清的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的兴盛揭开了序幕。

在这样的背景中，《礼拜六》中出现了大量的翻译小说是不足为奇的。作为鸳鸯蝴



蝶派的代表性刊物,《礼拜六》每周六准时出刊,在民国初期休闲文学刊物相对匮乏的背景下,它的问世无疑引来了读者的浓厚兴趣。每逢周六清早,《礼拜六》编辑发行部门前总是熙攘热闹,读者翘首以待。周瘦鹃曾回忆:“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地涌进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很多人在油墨散香的纸页间和引人入胜的文字中度过周末。”(郑逸梅,1983:164)这也客观地说明了该杂志中的小说以及翻译小说被读者接受、认可的程度。至于其中的翻译小说为何有的没有标注原作者,这恐怕也不是当时读者深究的内容。笔者认为,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无法找到或者界定原作及原作者。第19期上,滑稽小说《钥匙世界》的翻译,署名为“钱方鼎译安东新报^①”,从这样含糊的署名中,是不可能跟踪到这篇译作的原文——原文是《安东新报》上的一篇文章,还是数篇文章?是《安东新报》的哪一期?又如:第31期上的时事小说《疗妒》,署名为“半依译大陆报”,其原文依旧难以考证。《礼拜六》许多译者似乎是从西方的英文期刊杂志上转译非英语系的小说为中文,或由英文的“影戏”(今之电影)故事意述。周瘦鹃常在观看名家影戏后,把所看到的情节改编成小说,像是第二十四回《阿兄》之前就写着:“得之与影戏场。与大仲马齐名小说家 Alfhonsedaudet 之杰作。”(赵孝萱,2003:112-113)我们大概可以推知,在信息不流通的年代,《礼拜六》杂志上众多译文小说的一些来源不明确,也因此可以推知,很多译文是无法去找到或者界定原文的。

第二,以娱乐读者为目的,译意为主要翻译策略,因此出现了多种译作形态。19世纪下半叶,西方翻译小说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翻译活动就受到不同翻译目的的驱使。这些目的有为人数越来越多的阅读群体提供娱乐(如林纾的翻译作品),有知识分子渴望了解的哲学领域的革新,还有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愿望(Dollerup,2008:37)。《礼拜六》的创刊词开篇讲明了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是因为礼拜一至五“人皆从事于职业”,唯有“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闲暇而读小说也”。读小说“省俭”且“安乐”,“买笑觅醉听曲其为乐转瞬即逝”,而读小说“一编在手万忧都忘”。可以看出,《礼拜六》创刊的目的就是为了娱乐读者。在这样的目的指导之下,杂志中的翻译小说就要迎合读者的趣味,从异域来的故事当然是新奇的,故而才会有趣,易读和有味的作品才是质量上乘。因此,译者的翻译策略可以想见——至少忠实原文并不是目的,传达出故事的梗概,语言和形式更便于读者的阅读才是最好的翻译,不管译者到底是“译”或者“译述”,甚至可能就是根据读到看到的东西而“述”。

第三,译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使其共同接受这两类翻译作品。如果说《礼拜六》翻译小说的读者,对这三种译作的呈现形态并不买账,估计在前百期里也不会有近半数的翻译小说。《礼拜六》的“读者群不但多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还可能属于收



入颇为稳定的城市中产阶级。这群人或受过新式学校教育、或受过西学熏陶,在城市中从事着脑力、文化事业、行政业务或者商业贸易等活动”(赵孝萱,2003:105)。因此,这些读者一方面是“开放的”,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对翻译小说的阅读是欢迎的;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保守的”,他们仍然习惯于传统中国体例小说的阅读。因此,如果能用中国的小说体例,读到外国故事内容,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礼拜六》中的翻译小说,可以看出,虽然注明是某某人译,但仍然从语言到形式上都沿袭中国小说的呈现形式。译者与读者达成的“默契”就使得译者放开手脚,“译家与读者‘共谋’而认可和接受的、从直译到改易再到凭空杜撰等多种译作形态”(廖七一,2010:86-87)。

二、《礼拜六》翻译作品中的“冒充”因素

“冒充”(passing),是美国黑人研究和“酷尔理论”(queer theory)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Passing”一词表示“冒充”,其意思产生于美国英语,最初指“黑人冒充白人”这种社会现象。从广义上来说,“冒充”指一个人成功地摆脱自己本来的身份,以另外一种身份在社会上生活。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偏见,就会存在“冒充”现象。“冒充”有各种类型,如“性别冒充”“阶级冒充”“年龄冒充”等。就其原因来说,有的是为了机会,有的是出于安全考虑,有的是为了冒险和刺激,还有的是上述原因皆有之(黄卫峰,2008)。在性别研究中,也有这个概念。正如茱蒂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很多年前指出的,易装(cross-dressing)显示出来的是性别可以被构建的本质(Butler,1990:137-8)。易装也是一种“冒充”,与前面提到的种族中的冒充不同的是,易装的伪装太明显了,也就是说,观众是知道真相的,也知道看到的是真相的伪装。这样,观众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观察易装者是如何伪装的,以及伪装的相似程度。这一点也和翻译是一种表演行为的观点相契合,在性别研究的第二范式中,性别就已经被认为是可以构建的、当下的、即时的,进入角色的译者的性别身份是流动的。

《礼拜六》中后两种翻译类型的作品作为翻译小说并没有受到当时读者的质疑。至少当时的读者是把它们当作翻译来阅读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译者与读者在当时的社会风尚下达成的“默契”,还有这些翻译小说身上表现出来的当时翻译作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也可以说正是这些“译”和“述”难以界定的小说成功“冒充”翻译的原因。这些特征主要有:

1. 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外国

所谓场景,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后两种翻译类型的小说中,周瘦鹃的译作接近一半。他翻译的这些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有英国(第7期《写情小说:五十年前》)和第10期《悲惨纪事:心碎矣》),法国(第1期《拿破仑之友》),美国纽约



(第 21 期《似曾相识燕归来》), 甚至还有土耳其(第 10 期《札记小说: 恐怖》)。

2. 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外国

这些翻译小说中, 有以普法战争为时代背景的(第 25 期《孤村焚掠记》, 天颢译), 还有关于英国将军惠灵顿的轶事(1809 年的事, 见第 72 期《红茶花》, 瘦鹃译), 第 77 期伦理小说《慈母》是以法兰西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

3. 故事中人物取的都是典型的外国人名

仍以《礼拜六》上翻译小说最多的周瘦鹃为例, 在没有标注原作者姓名, 只署名瘦鹃译的作品中, 如第 35 期中的伦理小说《少女歼仇记》中, 女主人公的名字是“尤丽爱”, 而大坏人的名字为“奥格斯脱白奈德”; 又如第 50 期爱国小说《情人坎祖国坎》中, 女主人公的名字是“格兰德”, 她情人的名字为“楷尔”; 再如第 41 期怨情小说《玫瑰有刺》中讲故事的老人自称“无名氏”, 但“二十余年前固亦有名氏”, “自称曰波亚弗洛”, “波亚弗洛者 poor fellow 也”, “意谓吾乃可怜之人”。不管这些作品中的人物的确是原作中的, 还是译者对原作“改易”或“杜撰”之后才出现的, 这些人物的姓名, 虽与今天音译外国人名用字不同, 但都是典型的外国人姓名。

4. 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前卫”, 在当时中国本土并不常见

如: 第 32 期中的写情小说《情书》, 署名为东塾译, 故事里面出现了一个“好身手”的女司机, 开着车在纽约的街上行驶。显然民国时期街头的汽车并不多, 女司机就更少, 更谈不上在驾驶技术上的“好身手”了。又如: 第 21 期写情小说《似曾相识燕归来》(瘦鹃译)中, 中国留学生与美国女子在纽约相恋。

5. 侦探小说的体裁来自于外国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受欢迎的体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只有公案小说而无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任翔, 2011: 205)。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 20 世纪上半期开始被译介到中国, 并迅速在中国形成了侦探小说翻译的热潮。

《礼拜六》中的小说如同晚清所有小说杂志一样, 给每一篇小说都安上一个“类型”的标签, 例如“侦探小说”“神怪小说”“科学小说”等, 翻译小说也不例外(赵孝萱, 2003: 109)。《礼拜六》的翻译小说中, 侦探小说占有很大的比例, 除了标明原作者为 Conan Doyle(当时译“柯南达里”或者“柯南达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的系列翻译小说(《礼拜六》中主要的译者有小青、小蝶、天虚我生、瘦鹃、常觉)之外, 署名为“译”和“译述”的侦探小说也不少, 例如: 第 36 期的《怪客》(瘦鹃译)、第 41 期的《五万元》(静英译)、第 96 期的《吴田博士探案》(石生译), 等等。看到“侦探小说”这个标签, 读者就会认可这是翻译作品。

这些仅标有“译”或“译述”的翻译小说, 当时并没有人去质疑其是“翻译”还是“创作”, 除去当时历史的原因, 还因为这些小说身上有上述提到的四个“冒充”翻



译的因素。这样的“冒充”，或者这样的“译”“创”不分，让我们如何去区分“自我”和“他者”呢？又该怎样通过翻译中的“冒充”去更加深刻地认清翻译活动呢？

三、“自我”与“他者”，界限与联系

美国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流行一种（由白人扮演黑人的）黑人艺团表演（minstrel show，也叫 minstrelsy）。为了装扮黑人，白人演员在化妆时就要突出甚至夸大黑人的特征，如黑皮肤、大眼睛、厚嘴唇，然后上台去模仿黑人的语言和动作。黑人艺团表演是通过跨越界限去描述界限，种族身份问题不容逃避地出现了，通过舞台上对黑人原型的塑造，“白人”的焦虑得到了安慰，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他们知道了自己不是谁——不是黑人，不是奴隶，通过对黑人特征的探索，来了解自己（St. Andre, 2006: 255）。黑人艺团表演得到的结果和语言、文化的状况何尝不是一个道理？只有通过了解其他语言和文化，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只有认识了“他者”，才能够认识“自我”。

“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只有通过“跨界限”的探寻才能最终被发现，如跨种族的白人在表演中对黑人的“冒充”，跨性别的“易装”，两性之间的相互“冒充”。要“冒充”成功，使人信服，最起码的是要认识本身具有的特征和对方具有的特征。但找到“他者”和“自我”的界限并不是翻译的最终目标，翻译应该是两者的和谐统一体。

这里其实也有一对矛盾主体。20 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拉夫斯基提出“陌生化”的概念，就是要“审美主体对受日常生活的感觉方式支持的习惯化感知起反作用，要很自然地对主体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再看到或视而不见，使审美主体即使面临熟视无睹的事物时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延长其关注的时间和感受的难度，增加审美快感，并最终使主体在观察世界的原初感受之中化习见为新知，化腐朽为神奇”（杨向荣，2005：61）。文学作品使用陌生化，是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而翻译的过程看起来则是相反的，为了让译文读者读懂译文，译者不得不让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翻译过程中的“陌生”因素是原文与生俱来的，但如何在保持这种“陌生感”的同时又能让译文读者产生“熟悉感”，就给文学翻译的译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让“陌生感”和“熟悉感”和谐共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让“他者”与“自我”在翻译中和谐共存；译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这个矛盾修饰法的表达正好反映了翻译活动矛盾的本质。

图里（Gideon Toury）在《假定翻译：方法论概念与含义》（*Assumed Translation: A Methodological Concept and Its Implications*）中，提出了假定翻译（assumed translation）的概念，用来指在目标语中如果一个作品被认为是翻译，那它就是翻译。按照图里的观点，《礼拜六》里三种类型的翻译小说都是翻译，有着“奇怪”名字的人在陌生的场



所演绎异域的情节，用熟悉的语言熟悉的表现形式写出来，这又何尝不是“陌生感”和“熟悉感”的交融呢？

四、结语

对《礼拜六》里翻译小说出现的三种形式，应该将其放回民初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当时的小说翻译主要有两类目的：娱乐大众和启发民智。在明确、强烈的翻译目的的指导之下，《礼拜六》的译者更多采取的是改易甚至杜撰的策略，这些翻译小说带有外国作品的“陌生”特征，如背景、人物和情节无不透出异域风情，而归化的语言、中国传统小说的体例又让读者在“熟悉”的氛围中轻松阅读。

对《礼拜六》中只有译者署名或者明确标示为译述的小说，可以按图里的假定翻译将其归类为翻译。这些“译”“创”无法分清的小说中，有“冒充”翻译的因素，可以让人清楚地观察到小说中的“陌生”因素，而这些“他者”的特征与“自我”的特征和谐地共存，正是文学翻译应该追求的目标，也同时反映了翻译的矛盾本质。

对《礼拜六》这两类翻译小说的分析，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两个方向：第一，对“冒充”因素进行更多关注，以更好地区分“他者”与“自我”的界限，并促进“他者”与“自我”的相互了解。第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翻译可以被理解为“冒充”行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冒充”吗？翻译活动可以被归类为不同类型的“冒充”（以假充真、虽假尤真、真假难分）吗？如果翻译被看作一种表演行为，那么就总是隐含着“冒充”的因素。也许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

注释

①《安东新报》于1906年10月17日创刊，是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创办的日文报纸。

参考文献

- [1] 黄卫峰. 美国社会中的 passing 现象[EB/OL]. (2008-11-15) [2019-2-20] <http://www.yy-words.com/Article/200811/809.html>.
- [2] 廖七一. 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规范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 [3] 任翔. 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及其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4): 205-224.
- [4] 杨向荣. 陌生化[J]. 外国文学, 2005(1): 61-66.
- [5] 赵孝萱. 新论“鸳鸯蝴蝶派”[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 [6] 郑逸梅. 关于《礼拜六》周刊,《书报旧话》[M]. 上海: 书林出版社, 1983.



- [7]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 [8]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 [9] Dollerup, Cay. Translation in the Global/Local Tension[A]. In Wang Ning and Sun Yifeng (ed.) *Translatio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A Chinese Perspective*[C]. Trowbridge: Cromwell Press Ltd., 2008.
- [10] St. Andre, James. Long Time No See, Coolie—Passing as Chinese through Translation[A]. In Georges L. Bastin and Paul F. Bandia (ed.) *Charting 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History*[C]. Ottawa: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6.
- [11] Toury, Gideon. Assumed Translation: A Methodological Concept and Its Implications[A]. In Barbara Gülen, İsmail Boztaş and Christoph Veldhues (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C]. Ankara: Bizim Buro Publishers, 2002.

[作者简介] 钟毅, 女, 博士,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史; 戏剧翻译、影视翻译。

[电子邮箱] alfafa@126.com

文学翻译研究

论霍克思《红楼梦》译本名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的动因

田召见

四川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

摘 要：本文从中西叙事差异探讨了戴维·霍克思将《红楼梦》书名译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的动因，认为：源语文本选择《红楼梦》作为书名，是中国文学注重意象叙事的结果，但若照此翻译，会被西方读者误读；西方叙事学强调叙事时间线性和“首、身、尾”的叙事完整性，石头叙事贯穿小说始终，符合西方叙事模式，因此有了霍克思的这一选择。对其选择笔者表示认同。

关键词：书名；翻译；意象；叙事；差异

A Study on the Reason for Hawkes' Choice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s the Title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Tian Zhaojian

(The Intensive Language Training Center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differences, has explored the reason for David Hawkes' choice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s the title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 The writer claims that the title choice of *Hong Lou Meng* for the original novel is the result of emphasis on imagery narra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f the title translation is given as per this title of the original novel, misreading will arise among the Western readers. Western narrati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inearity of time and integrity of narration including "beginning, body and ending". The narration of stone goes throughout the novel, hence its conformity to the mode of Western narration and David Hawkes' choice, with which the author of current paper agrees.

Key Words: title; translation; imagery; narration; differences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具有独创的文人风格的叙事特征，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



白话小说的发展已至巅峰。《红楼梦》的外文译本众多,其中英文的全译本有杨宪益夫妇的三卷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和戴维·霍克思翁婿的五卷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①。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写道:“[空空道人]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海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曹雪芹,1964:3-4)在这一回中并未出现《红楼梦》的书名;《红楼梦》的书名是在第五回出现的:“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在同一回中,“[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曹雪芹,1964:60)。

霍克思为什么舍弃《情僧录》《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而选择《石头记》的英译作为译本的书名呢?要知道,在霍克思译本(简称“霍译本”)之外的英语译本中,R. Thom 和 E. C. Bowra 都把书名译为 *Dream of Red Chamber*; H. B. Joly 和 F. McHugh & I. McHugh 将书名译为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王际真将书名译为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 S. Bonsall 将书名译为 *The Red Chamber Dream*, 杨宪益、戴乃迭将书名译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黄新渠将书名译为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这些版本都用了核心词 Red Chamber 或者 Red Mansions。要探究霍克思书名翻译的动因,需从中西叙事差异来找寻答案。

二、《红楼梦》的意象叙事

谈到中国文学,意象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关于意象,《周易·系辞》就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之句,但句中之“象”乃卦象,属易学,是古代哲学的思想。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里有“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之句,是“意象”一词首次用于文论。所谓“意象”,就是通过客观的“象”,来表现文学作品创作主体的主观的“意”,象后寓意,借物抒情。意象多用于诗歌体裁,在宋词、元曲也常见。唐代诗人李白《静夜思》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通过“明月”意象寄托其思乡的情怀;北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开篇是“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通过“寒蝉”意象表现悲凉的氛围;元曲名家马致远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通过一系列意象的组合来表达凄凉悲苦的意境。

除了诗体文字,在小说文体中也有意象的存在,《红楼梦》里就蕴含着大量的意



象。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红楼梦》以诗词曲赋来描绘人物、刻画人物个性和展开故事情节，诗词曲赋融入小说中，使小说具备“文备众体”的特征。小说中诗词曲赋各类韵文多达二百余篇，已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若舍之，则会使小说中大部分章节的叙事中断、情节不完整。大量的韵文使《红楼梦》富含意象，而小说中的散体文字也充满着诗性和意象。曹雪芹“含象写事”，将意象渗透到叙事文本的方方面面中，起着串接叙事结构、保留意义的含蓄与优美的功效。杨义说过：“叙事作品存在着与诗互借与相通之处，意象这种诗学的闪光点介入叙事作品，是可以增加叙事过程的诗化程度和审美浓度的。”（杨义，1997：276）

《红楼梦》采用意象叙事的另一原因是由清朝盛行的文字狱造成的。“清代的文字狱，从顺治朝就有了，而以康、雍、乾三朝为最炽，见于记载的就有八千余起，‘一字相牵，百口莫辩’。”（曾扬华，1988：114）写《红楼梦》时，曹雪芹正处于乾隆时期，文字狱迫使他出言有忌，何况曹氏家族经历过抄家之祸，曹氏既想写出曹家的遭际，又假托石头记录之事是“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的虚构，且“无朝代年纪可考”，足见曹氏笔法的“狡狴”之处。曹雪芹使用了类似春秋笔法的曲笔，来显示其“微言大义”，以针砭时弊，抨击社会罪恶。基于这样的初衷和手法，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和隐喻，以传递曹雪芹的思想和见解。

《红楼梦》意象众多，其中“红”意象贯穿小说始终。中国有“尚红”文化，曹雪芹披阅小说十载、增删其五次的场所名为“悼红轩”，意为悲悼大观园的女儿们。宝玉在大观园的住所叫“怡红院”，他的别号叫“怡红公子”，宝玉喜欢穿红，有偷吃胭脂、爱红的习惯，意象隐藏的是宝玉对女儿们的眷恋。“红楼”意象，意指贵族富豪，而小说第五十二回薛宝琴述及的《真真国女儿诗》有“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的诗句，“朱楼”与“红楼”互指。第五回《红楼梦》曲的《引子》有“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以及本回贾宝玉所品之茗“千红一窟”，都隐喻了对薛宝钗（“金”）与林黛玉（“玉”）等“薄命司”众女儿悲剧命运的悲悼。本回另一曲《世难容》有“红粉朱楼春色阑”之句，说的是红楼及红楼中的女儿春光将尽，隐喻其悲剧命运，与小说第二十三回的“落红成阵”的意象隐含一致。至于《红楼梦》的“梦”，最有名者当属第五回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梦”了。“梦”的意象隐喻了一切皆梦幻。“红”“红楼”和“梦”的意象组合，蕴涵着“忽喇喇似大厦倾”，红楼难逃覆灭的命运，“红楼”乃一“梦”耳！

脂砚斋所评依据于八十回本《石头记》，而程高本续了四十回使其成为一百二十回本后更名为《红楼梦》，《红楼梦》的书名命名更看重的是意象背后涵义的深刻。



三、霍克思对《红楼梦》意象的翻译处理

在霍译本中,“悼红轩”“怡红院”“千红一窟”“落红成阵”分别翻译为 Nostalgia Studio,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Maiden's Tears, The red flowers in their hosts are falling. 除了“落红成阵”的译文有“红”(red)译出,其他三例的“红”意象消失。霍克思在其译本的导言中也承认“红”意象在译文中的某种丧失(some sort of loss)^②,他认为“红”意象在中国小说中往往象征着“春天”“青春”“财富”和“繁荣”;然而在英语中不仅没有这样的蕴含意义,且在英语文化中“红”易产生的联想是“红润的脸颊”或“红唇”。可见,拥有西方文化背景的霍克思对《红楼梦》中的“红”意象有着与有尚红文化的中国读者迥然不同的理解。

的确,把“怡红院”“怡红公子”和第五回《红楼梦曲》中的“红楼梦”译为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Green Boy、A Dream of Golden Days^③有霍克思的道理;但是,这两处的 Green 至少让中国读者和研究者们不解,更何况的确损失了“红”意象,不能让英美读者体会到中国的尚红文化。试想,如果“怡红院”和“怡红公子”被译成了“快绿院”“快绿公子”,那么怡红院中的“蕉棠两植”^④(黛玉主“绿”——忧愁;宝玉主“红”——热烈)的意象,是不是都要以“绿”来译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要想避免小说里面那么多的“红”字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霍克思翁婿的五卷译本里每一册的封底都印着这样的一行字: *The Story of the Stone* (c. 1760),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one of the greatest novels of Chinese literature。由此观之,霍克思对 red 并未一概排斥。霍克思在译“绛珠草”和“绛芸轩”的“绛”(赤红、火红)时,前者译作 Crimson Pearl Flower, 后者译作 Red Rue Study^⑤。绛,亦红色,霍克思为何不回避此红意象?对于 red,《朗文当代英语词典》有一释义是 the color of blood, 此解释可使人联想到“暴力”“血腥”,这也许是霍克思避免 red 一词使用的另一因素吧。霍克思把第一卷前五回楔子里出现的两处《红楼梦曲》译为 A Dream of Golden Days “黄金岁月的梦”,是刻意回避 red 一词的使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对 golden 的一项释义为: “a golden period of time is one of great happiness or success”, 显然译者强调的是快乐时光,而不是“红”和“红楼”的意象。The Golden Days 是霍克思和闵福德所译的五卷本的第一卷的标题,来自于《红楼梦曲》的译文,而霍克思却将《红楼梦》书名译作 *The Story of the Stone*。

霍克思本人对书名的翻译有什么说法呢?在译本第一卷的导言中^⑥,霍克思指出:脂砚斋的八十回本是以《石头记》命名的,而他翻译所据的底本程乙本(一百二十回本)的书名是《红楼梦》。脂砚斋的八十回本又称为脂本或脂批本,是带脂批的抄本的总称,脂砚斋曾四次评点《石头记》,所以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书名。那么,霍克思为什么不直接采用程乙本的书名《红楼梦》呢?他认为译作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一类的书名会对读者有误导, 因为书名唤起的意象是卧于红房睡觉的人, 充满了妩媚与神秘, 但这不是“红楼”的本意。他还说: “红楼”是有红墙的高楼, 像古时北京的宫殿、庙宇和衙门, 是富裕和富丽堂皇的象征, 而老百姓的住宅呈灰色。他还认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这个译名有歧义, 它既可以指娇养的富家女子之梦, 又可指过往辉煌之梦幻。他曾打算将第五回出现的《红楼梦曲》译作 *A Dream of Golden Girls*, 但 *Golden Girls* 容易让人联想到晒日光浴晒得黝黑的美女, 与小说中娇花似的美女出入甚大, 因而作罢。

既然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或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这类书名有意象误导和歧解, 那么避之而选择 *The Story of the Stone* 来译小说书名确实理由正当。然而, 冯全功认为: “虽然, 石头亦是一个修辞原型, 但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远不如《红楼梦》中的三个修辞原型丰富、深厚, 可以说霍译书名是得不偿失的”^⑦。(冯全功, 2012, 4: 247) 笔者认为, 这个结论是站在源语文化角度而言的, 没有站在译者为何选择该书名的角度去考虑, 这样的评判对于颇受西方读者欢迎的霍译本《红楼梦》和霍克思本人都有失公允。

四、西方叙事观对霍克思翻译《红楼梦》书名的影响

从上文不难得知, 霍克思对小说译名的选择不是以源语文本中的意象为重的。虽然西方在诗歌领域由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在 20 世纪初发起了意象主义运动, 倡导诗歌里的意象要具有准确性, 但实际上, 意象主义运动是庞德受中国古诗和日本俳句中意象使用的影响而发起的, 其根源不在西方。受制于东西方文化差异, 意象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所指与能指是不同的。依笔者看来, 霍克思对小说译名的选择是出于对西方叙事观的依循。

首先, 西方叙事学强调叙事时间, 而中国叙事学却淡化时间观念。西方叙事按日、月、年的线性展开, 而中国叙事则是倒过来的年、月、日的顺序模式。《红楼梦》不以历史线性的精确时间叙事, 而代之以春夏秋冬的四季更迭叙事。小说起首借女娲补天的神话引出小说的叙事者, 时间更是模糊。这种“烟云模糊”的手法与西方小说常从一人一事一景写起的手法大异其趣。为了造成“无朝代年纪可考”之假象, 曹雪芹还用以前朝代的地名称呼来命名人物活动的地名场所, 如小说中出现的“苏州郡”的“郡”实际上隋朝时已废止, “金陵”一地, 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已更名为南京。小说中虽然有“月”“日”的时间和大观园中的怡红院、潇湘馆和蘅芜院等空间场所, 但这些时空点只是便于叙事安排的切分。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思想下, 大的时空背景的模糊性使相对具体的时空切分意义减弱。小说时间和地点的模糊化, 是曹雪芹为避免文字狱所采用的叙事手法。为弥补缺陷, 对“石头”的记载充当了时间线性和串接事件的功



能,而“红”“红楼”“红楼梦”是纯意象性的,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其次,与线性时间相承的是事件的完整性,西方叙事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特别强调情节,指出作为构成悲剧情节的事件必须要有‘首、身、尾’。”(转引自林岗,1999:115)这句话正是说明了西方叙事要求完整性,事件要有因果关系且是有机结合的。然而,《红楼梦》这部皇皇巨著,由于事件众多,其叙事并非是单一结构,而是呈立体网状结构,包括宝黛钗的爱情纠葛、影射整个封建社会的贾府的兴衰荣辱、大观园女儿的悲剧命运、四大家族的相互照应和刘姥姥的三进大观园等多条线的齐头并进,好似一个个事件拼缀在一起,缺乏西方“首、身、尾”的叙事结构。正如浦安迪(Andrew H. Plaks)所批:“中国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在‘外形’上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的‘缀段性’(episodic),一段一段的故事,形如散沙,缺乏西方 novel 那种‘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结构,因而也就欠缺所谓的整体感。”(浦安迪,1996:56)这一批评一语中的。

或许意识到《红楼梦》叙事结构的缀段性,曹雪芹安排了亚神话的石头叙事,以此作为串联情节的黏合剂。小说的开端述及女娲炼石补天所剩之石,被遗弃在青埂峰下,是石头的“出世”;石头由一僧一道携入尘世历劫,石头幻化为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经历人间的繁华以及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感情纠葛,是石头的“入世”;其后又还原成石头,由僧道携回青埂峰下,是脱离尘世,即“出世”。石头、贾宝玉和宝玉降生时口中所衔之玉实乃三位一体,石头“出世—入世—出世”的经历,也就是主人公宝玉的一生。

女娲遗弃石头于青埂峰的亚神话为故事之“首”,历劫后再次回到青埂峰为故事之“尾”,是首尾照应的叙事安排。在小说叙事的“身”上,石头作为叙述的线索贯穿始终。一方面,石头作为小说的叙述者,《红楼梦》第一回有这样的文字:“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曹雪芹,1964:2)。可见,石头(有时自谦为“蠢物”)是故事的叙述者。另一方面,“石兄”在好几个章回里插入评论,以整理头绪,接续叙事线索。比如《红楼梦》的第六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的前五回是整本小说的缩影、概说或者楔子,而第六回则是正文的发端,是石头记载的开始。这一回从刘姥姥进荣国府写起,在这之前有石头的评论:“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曹雪芹,1964:68)由此观之,石头评论起着接续故事、理出叙事头绪的功效。再比如在小说的第十八回,顽石出现并参与评论:“看官听说:这‘蓼汀花溆’及‘有凤来



仪’等字，皆系上回贾政偶试宝玉之才，何至便认真用了？想贾府世代诗书，自有一二名手题咏，岂似暴富之家，竟以小儿语搪塞了事呢？”（曹雪芹，1964：203）从“看官听说”（霍克思译为：Stone's Note to Reader），便知是石头此时插入叙事语流中进行评论。此处，石头的评论有串接上下文和说明因果的作用。

这部小说既然源自石头所记，取名《石头记》的理据是充分的。《红楼梦》本名《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提到《石头记》时，脂砚斋的旁批云：“本名也。”程本的程伟元序中也说：“《石头记》是此书原名。”该书早期抄本无一例外地名曰《石头记》，改名《红楼梦》，是后来的事（邹进先，2015，5：30）。小说被改名为《红楼梦》，是看中“红”“红楼”“梦”的意象，突出“红楼幻灭”的主旨，其开篇的“梦”“幻”字样也说明此点。《红楼梦》的名字所具的意象是从中国文化和哲学考虑的，分散、隐藏于文中，与西方“首、身、尾”这一强调事件的线性、因果链的叙事传统不太相符。相反，石头叙事符合西方“首、身、尾”的叙事习惯。

小说“本名”是《石头记》，石头也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那为何小说的作者在第一回提到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曹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而第五回又提到《红楼梦》？胡适认为这些作者和书名是“曹雪芹自布的疑阵”。香港著名红学家马力（1952—2007）认为：“作者为了逃避文字狱所尝试的曲折手法，首先就是在书中列举了其他的题名。”（马瑞芳、左振坤，2004：111—112）的确，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这种曲折的“烟云模糊”手法既能鞭挞社会的罪恶，又能明哲保身。然而，这些书名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书名选择造成了困难。

对上述“曹雪芹自布疑阵”的几个书名的翻译，《情僧录》译为 *The Tale of Brother Amor*，霍克思用 Amor（古罗马的爱神）来译“情”，而用 Brother 来译“僧”，brother 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的释义为：a male member of a religious group, especially a monk。“情僧”指贾宝玉，因不能践约“木石前盟”的爱情而看破尘世，后来出家为僧。《风月宝鉴》借用的故事是：《红楼梦》里贾瑞想勾引王熙凤而被后者整治，于是病入膏肓；跛足道人要贾瑞看他送来的镜子的背面，告诉他这样才能治愈，结果贾瑞不肯看背面的骷髅，而看正面中王熙凤招手欲与他做爱的景象。贾瑞贪恋风情，最终暴卒。作者以此告诫世人红尘美景不可眷恋。霍克思译《风月宝鉴》为 *A Mirror for the Romantic*，预伏贾瑞的故事，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译文正是 Wang Xi-feng sets a trap for her admirer, And Jia Rui looks into the wrong side of the mirror, 与《风月宝鉴》的译名映照。“风月”指“男女间情爱之事”，用“the Romantic”来注解贾瑞其人其事，合适。《金陵十二钗》的译文是 *The Twelve Beauties of Jinling*，是指大观园里十二钗“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无论是宝黛的爱情故事、贾



瑞凤月宝鉴的故事,还是金陵十二钗的故事,它们都只是小说中的一部分,不能体现小说的叙事结构,皆非正解。那么依照其他英文版本,将小说书名译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抑或是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之类又如何?这一问题在第三点中已述及,霍克思认为此译法有误导和歧解。小说中“红楼”和“梦”的意象只是隐喻和象征,并非按西方读者熟知的“首、身、尾”的叙事线性安排,而是散落、渗透于小说的行文之中,读者需细细品味,方解其中意味和奥妙,但由于文化和叙事的差异,小说的意象很难在西方读者的大脑里铭刻上印记。再者,“红楼”在小说起首并未述及,而在第五回才出现,将书名译成《红楼梦》,西方读者会大惑不解。

既如是,霍克思选择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作为《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译名,使整个叙事成为一个完整体,上下承接自然,符合西方的演绎写作方式,是霍克思对中国意象的“舍”和西方叙事观的“取”的结果。霍译本书名的翻译是照顾读者的“归化”翻译,是“读者中心论”的体现。

五、结论

综上所述,既然霍克思认为“红”“红楼”等中国意象叙事会使西方读者误解小说含义,那么他作为译者,从目的语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自然会摒弃注重中国意象叙事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或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作为译本的书名。石头叙事贯穿小说的始终,符合西方“首、身、尾”的叙事模式,所以霍克思采用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作为译本的书名。

注释

①杨宪益夫妇的三卷译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在 1978—1980 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戴维·霍克思翁婿的五卷译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于 1973、1977、1980、1982 和 1986 年由企鹅集团出版。顺便提一下:David Hawkes 的名字应译作“戴维·霍克思”,因为他本人曾用中文在《红楼梦学刊》(1980 年第 1 辑)上发表《西人管窥〈红楼梦〉》一文,署名“霍克思”。

②这段文字在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的导言第 45 页:One bit of imagery which Stone-enthusiasts will miss in my translation is the pervading redness of the Chinese novel. One of its Chinese titles is red, to begin with, and red as symbol—sometimes of spring, sometimes of youth, sometimes of good fortune or prosperity—recurs again and again throughout it. Unfortunately—apart from the rosy cheeks and vermeil lip of youth—redness has no such connotations in English and I hav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reds have tended to turn into English golds or greens (“spring the green spring” and “golden girls and boys”



and so forth). I am aware that there is some sort of loss here, but have lacked the ingenuity to avert it.

③霍克思在译书同时参考脂本。该抄本在《情僧录》后有一句：“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霍克思把这句话译为：Wu Yu-feng called it *A Dream of Golden Days*. 之所以其他汉语版本删去这一句，笔者认为第五回警幻仙姑将新制作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子演唱给宝玉听，若是吴玉峰题《红楼梦》，这不是和警幻仙子新制的《红楼梦》曲子冲突了么？霍克思在翻译第五回时，将“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译为“You can do the twelve songs of my new song-and-dance suite ‘A Dream of Golden Days’”，不知他想到第一回的吴玉峰题名《红楼梦》没有？

④《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十七回（第196页）：宝玉道：“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说一样，遗漏一样，便不足取。”霍译：芭蕉 plantains，海棠 crab-apple blossom；“红”“绿”二字译为“the red and the green”；可见，霍克思想完全避免“红”意象是不可能的。

⑤参见霍克思译本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1)，第53页和197页。

⑥参见霍克思译本第一卷导言18—20页。

⑦冯全功此处所说的“三个修辞原型”是指“红”“红楼”和“梦”，来源见参考文献的第2条。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高鹗(清).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 [2] 冯全功.《红楼梦》书名中的修辞原型及其英译[J].红楼梦学刊,2012(4):237-252.
- [3] 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 马力.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A].马瑞芳、左振坤.《红楼梦》奥秘解读[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110-121.
- [5]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6]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7] 曾扬华.红楼梦引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 [8] 邹进先.《红楼梦》“石头”意象的来历及其寓意[J].红楼梦学刊,2015(5):30-39.
- [9] Hawkes, Davi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1)[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3.

[作者简介] 田召见,男,四川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红楼译学,语言学,成人英语教学。

[电子邮箱] tianzhaojian@126.com

“对等”还是“超越” ——以《道德经》两个英译本“意象再现”对比为例

张丽颖

中国网英文部

摘要：虽然许渊冲本人并未直接提出“超越理论”一说，然而事实上他已搭建起自洽的框架，形成了全面的“超越观”：优化论、竞赛论和创译论为其译论本体，“三化”为其实践方法。本文将《道德经》亚瑟·威利和许渊冲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后认为，相较于践行对等理论的威利译本，许译本更多实现了中国典籍“意象再现”。因此，许渊冲“超越观”于汉英古典文学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对等；超越；《道德经》；意象再现；文学翻译

Equivalence or Transcend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Dao De Jing* in Terms of Image Reproduction

Zhang Liying

(China.org.cn,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Although “Transcendence” has not been termed by Xu Yuanchong as a translation theory, his “View on Transcendence” boasts a de facto self-sustain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Optimum Theory, Theory of Rivalry and Innovative Translation as the ontology and “Three Hua” (Specification, General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as the method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Arthur Waley’s and Xu Yuanchong’s versions of *Dao De J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Taoist text. After comparing Arthur Waley’s Equivalence with Xu Yuanchong’s Specification, General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it holds that Xu’s version, which is a full manifestation of his “View on Transcendence”, excels Waley’s version in terms of “image reproduction”. Therefore, Xu’s “View on Transcendence” serves as a proper guidance on Chinese-English classic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Key Words: equivalence; transcendence; *Dao De Jing*; image reproduc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引言

五千言的《道德经》，是东方智慧的瑰宝，被人们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哲学宝典，自始至终贯穿并影响着华夏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截至目前，这一被誉为“东方《圣经》”的典籍精粹已被译成 28 种语言，译本达一千余种。在《道德经》的 182 个英译本中，亚瑟·威利的译本一直在西方翻译界享有盛誉。自 1934 年出版以来，这一译本每隔四到五年就要再版一次。尽管这一译本广受西方读者欢迎，但在翻译理论家眼中，它却不尽完美，其原因主要在于威利所采用的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和表层意义的翻译策略，致使其未能有效传递文本的深层意象。2011 年，许渊冲译本问世，打开了《道德经》英译的新局面。本文认为，许译之所以卓然而立，是因为其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不断进行着对话与重建、纠正与平衡、完善与超越，努力实现译文语言的自由驰骋与原文意象的再现。让人不禁感叹，当全世界译者还挣扎在必然王国中孜孜以求“对等”时，许渊冲的翻译已进入自由王国，发乎原文，实现超越！正因如此，他所翻译的《道德经》才在“意象再现”方面表现卓然，成为独立于原文之外的伟大文学作品。

一、《道德经》汉英文学翻译属性

《道德经》以韵文形式著成，多四字句式，读来朗朗上口，具有诗歌的音韵美和形式美。著名哲学家张世英说：“中国哲学著作几乎同时都是文学著作，哲学家大多同时是文学家和诗人，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张世英，2007：152）。《道德经》是哲学经典著作，其语言是诗体语言，有大量格言式表达，可以说，《道德经》显著的语言特点就是文学性。《道德经》的汉英翻译实质就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本身有传递模糊语言背后深意、传达文化承载意象并实现原文审美价值的难点，因此与其他文本的翻译相比，汉英文学翻译极具挑战性。

汉英文学翻译中，中国文化意象的翻译是译学家讨论的热点。“意象”本为中华文化的特有产物，属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象”为万物，意思是圣人以万物象征的方式尽达其意；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写到“意”“象”合一，“窥意象而运斤”，意思是物象用它的形貌来打动创作者（工匠/作者），使创作者心里产生情理反应，也就是说精神靠物象来贯通，物象情化即为意，意象浑然一体。中西意象艺术都有着各自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在实践与理论上有许多共同点和不同点（李玉良，2017：10），并且，汉英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着“意象空缺”的现象（董成，2014：146）。因此，在汉英翻译中再现中国文学作品中丰赡的中国文化意象，难上加难。《道德经》本身充满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特有的意象，无时无刻不传递着深远的意义，给读者带来丰富的



联想和回味。翻译时对此不加以处理很容易造成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歪曲。所以,《道德经》中丰富的文化意象能否得到再现,必然是判定译文高下的不二法则。

二、翻译的“超越”讨论

西方的翻译标准虽无定论,但在诸多标准中对等理论影响尤为深远,译学家视角从形式对等、意义对等到功能对等。新理论披挂上阵时,人们往往发现,这些理论无非是对等的另一种表述。但对等理论在处理中西文化“意象空缺”时似乎丧失了用武之地。马会娟对对等理论的这一局限性有精辟的论述:“对于文学翻译,特别是有着很高艺术欣赏价值的严肃文学,把等效论作为检验和衡量译文的唯一标准是不妥当的。”(马会娟,1999:78)西方翻译家也在思考“对等”针对不同文体适用程度的差异,彼得·纽马克说:“‘equivalent effec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which has a degree of application to any type of text, but not the same degree of importance.”(Newmark, 2001: 49)事实上,在“对等”指挥着翻译家和译学家思路的同时,翻译的“超越理论”悄然随行。

1. 瓦特·本雅明的文学翻译超验论

在《译作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这样说道:“语言的表意包含必须的两面:意象性和意象性对象,不同的语言,意指方式固有不同,但意象性对象如一,即纯粹语言。”本雅明所说的“纯粹语言”,是一种超历史的语言间亲族关系所依赖的意图(阿伦特[德],编,张旭东,等,译,2008:86),它并不意味什么,也不再表达什么,而是托付在一切语言中不具表现性和创造性的言词(黄海容,2007:90)。这一“超越理论”从本质而言更多体现的是宗教意义的超验论,“纯粹语言”最终升华为“上帝的语言”。本雅明认为,翻译家的错误是试图保存本国语言本身的偶然状态,所以必须回到语言的最基本因素,以求达到语言和启示的太初一致。据此,很多研究瓦特·本雅明的国内学者认为,本雅明是现代西方译论家中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深刻阐述翻译超越理论的评论家(兰宁鸽,2007:169)。

事实上,本雅明的超越理论更确切地说是超验理论。他充分考虑了不同语言及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鼓励译者以“纯粹语言”为媒介实现译文对原文文字上的超验。根据这一理论,实现超越的关键在于找到抽象透明的“回归上帝”的“纯粹语言”,在这个先验的、不可企及的境界里,原语和译语达成和解。然后,本雅明对“纯粹语言”的模糊界定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另外,有研究者认为,本雅明赋予翻译终极救赎的使命,其思想意图表达了“现世永远不完美,乌托邦永远无法企及”,译者依然不断做着“困兽之斗”(黄海容,2007:92)。这一猜想亦契合他的切线之喻,即译者稍微触碰原文意义这一无限小的点,随机便如圆之切线般无限远离在语言的自由王国。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本雅明理想中的翻译是实现超验的“纯粹语言”，而最好的译者也只能稍微触及原文所期望表达的“启示”。在这一交织着各种悲观和乐观的逻辑框架下，译者做着无望的挣扎，他们的能动性几乎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

2. 许渊冲的文学翻译“超越观”

2014年，我国文学翻译家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他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别人都在谈对等，我在谈超越。”（王一，2014）许渊冲强调翻译的“超越”绝非偶然，这是他六十余年文学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结晶。虽然他并未明确把“超越”作为其自创的理论进行系统性阐述，但是其“超越”翻译观已呈现出完整的理论框架，并凝练出指导汉英文学翻译的有效策略，达到通过突破语言束缚全然传达民族文化神韵的目的，最终实现中国古典作品的“意象”再现。他用翻译《尤利西斯》的例子阐释了自己的翻译“超越观”：

詹姆斯·乔伊斯在写《尤利西斯》时，造了两个字。英语中原本有Yes（是）和No（不是）两个词，他却调头换尾，把Yes的Y摆到No前面，就变成Yo；把No的头N放到Yes前面，就变成Nes，这怎么翻？这是他自己造的字，大家就觉得为难了……我怎么翻呢？Yes和No就是“是”和“非”，也可以说“有”和“无”。那么，Yo就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Nes就是“无事生非，无中生有”。事情就是这样，你要往深里想，往中华文化里想。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灵魂体现出来啊。（王一，2014）

如前所示，许渊冲认为翻译应翻出民族文化的“味道”“灵魂”，这里的“味道”“灵魂”实质上是中国古典文学所讲求的“意象”。鲁迅先生所说的意美实乃意象之美。我们知道，翻译美学从文艺美学中借鉴了大量的术语和理论资源来描述艺术再现的美学。古往今来，中国文艺美学欣赏中“意象”“意境”“神”“妙”等概念贯穿于历代美学家的论述中，也构成了翻译美学的基本概念。因此，译者保持与原作相同的情境，深刻反映原作意境，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相同的象境，即为“意象再现”。可以说，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是否达到“意象再现”的目的以及企及的程度都可以成为判断译文优劣档次的标准。

三、许渊冲翻译“超越观”的理论框架

许渊冲的所有翻译论述都没有将“超越”归结为自己的一个理论。追溯他的翻译实践以及研究的全过程，我们发现他的“超越”已具备包括理论渊源、理论本体、实



践方法和理论目的在内的完整理论框架,本文称之为文学翻译的“超越观”。以许渊冲为代表的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源自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理论本体由优化论、竞赛论、创译论组成,实践方法论是“三化”。这是一个译者与原著进行对话与重建、纠正与平衡、完善与超越的全过程,译者在这一译论框架中享有充分的积极性和主动权,其理论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原文学作品在译语中的“意象再现”。

1. 许渊冲“超越观”的认识论基础

许渊冲的“超越观”强调“美”和“创造”,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质,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在翻译理论领域的践行,贯穿其间的是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比如,他认为《论语》中“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渊源(许渊冲,2014:11)。在许渊冲看来,翻译既不逾矩,又能从心所欲,这是种积极的翻译观,与“困兽”的翻译超验论是不同的视角和心态。

2. “超越观”的译论本体

许渊冲“超越观”从理论上而言,可分为优化论、竞赛论和创译论。在新版《翻译的艺术》总论部分《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中,许渊冲首次使用优化论。广义的优化论指整个许渊冲的翻译价值体系;而狭义的优化论是相对“对等”而言的:文学译文应该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如果对等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那么,优化论和对等论是相同的。如果对等的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那就要舍“对等”而取“最好”或“优化”(许渊冲,2006:5)。在他的评价体系中,西方的翻译宗旨是消极对等,中国译论不仅要求“不逾矩”,还要“从心所欲”,才能达到“知之好之乐之”(许渊冲,2014:11)。

竞赛论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竞赛。竞赛的结果一般是译文不如原文、有时可以并列冠军、有时甚至可以胜过原文(许渊冲,2003:241)。许渊冲的竞赛论强调对“美”的追求和“再创造”,揭示了文学翻译的客观规律。艺术是对自然的美化,翻译是对原作的美化(许渊冲,2003:261)。竞赛论使文学翻译发展成为翻译文学,进而成为世界文化。

创译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忠实于原作的意图”“发挥译语优势”以及“随心所欲不逾矩”(许渊冲,2003:21)。保持原文的艺术魅力就需要以创译所得弥补翻译所失,追求原文深层内容而有而表层形式无的东西,也就是本雅明所述抽象晦涩的“上帝的语言”——“纯粹语言”,并灵活运用适合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从心所欲”地达到“意象再现”。

优化论、竞赛论和创译论共同构成了许渊冲翻译“超越观”的译论本体,在对翻译“超越观”的具体实践中,“三化”是“超越观”的方法论。



3. “超越观”的方法论——“三化”

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罗新璋，2009：774）。受到钱锺书“化境理论”的启发，许渊冲提出了“超越观”的实践方法“三化”，即深化、浅化和等化（张智中，2006：75）。许渊冲的文学翻译作品践行“三化”的翻译策略，采用译语读者所理解、喜好并欣赏的语言充分再现原文意象。

所谓“深化”，应该包括加词、“分译”等在内（许渊冲，2003：91），力求将原文语言背后内含的深意传达出来。王维《山居秋暝》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结尾。诗句表层意思是尽管春天的芳菲随时令消逝，隐居的人在秋色中，自可以流连忘返，而文字深层上却传递了诗人远离官场、洁身自好的意象。苏轼赞誉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的确，诗歌前几句的描绘已将读者带入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的旖旎风光中。末尾一句既言诗人之志，又对话读者，表达了诗人对美好社会的希冀。译者与原文对话的深度决定了译文能企及的高度。许渊冲采用“深化”的翻译方法，并没有将“王孙”译为“hermit”或“me”，而是译为第二人称“you”（许渊冲，2014：67），既使“以物芳而明志洁”这一深层意象跃然纸上，又令读者倍感亲切，回味无穷。

所谓“浅化”，应该包括减词、“合译”等译法在内（许渊冲，2003：91），将晦涩复杂的原文变得易于理解。也就是说，译者需要不断调整纠正，以达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平衡。李白《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中，“渝州”指今重庆，这一点英语读者未必知晓。诗人秋夜行船，首次离开家乡。在船上，他看到了峨眉山间吐出的半轮明月，山月的影子映在平羌江水中，随江水流淌。诗人睹月思人，想到船由清溪出发，向三峡驶去，故国故人已再难相见。基于对“离别”这一主题的把握，许渊冲对此句的译文采取了浅化的方法，减去地名“渝州”，只译出“不见”为“when you are out of view”（许渊冲，2014：7），达到了译文与原文深层意义的平衡：虽未抵异地，故国故人随行船逐渐远离已让诗人感慨万千，依依惜别情的意象自在其中。

等化涉及的具体翻译策略包括动态对等、典故移植、词性转换、主谓互换、主动与被动互换等。《长干行》（二首其二）中“淼淼暗无边，行人在何处？”一句，许渊冲将其译为 So dark the boundless grew! Where could your roving ship abide?（许渊冲，2014：27）从语言形式的层面而言，译文与原文并不对等，原文作者以思妇的口吻感慨“你（夫君）现在在什么地方”，而译文却是“你的小船现在停靠在哪里”。仔细揣摩后我们发现，思妇的丈夫乘船到各地经商，船到之处即为他的暂居之处。所以，译文在意义层面忠实原文，语言也更加形象直观。不违意义之“矩”，却在语言层面自由驰骋，这



是“等化”的真正涵义。

大量翻译实践表明,通过“三化”这一具体方法,许渊冲翻译“超越观”能够有效指导汉英文学翻译。接下来,我们就将通过对比《道德经》两个英译本——威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进一步说明许渊冲翻译“超越观”的有效性。

四、《道德经》两个英译本——威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对比研究

本部分对《道德经》两个英译本——威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旨在说明在指导汉英古典文学翻译方面,许渊冲的翻译“超越观”较对等理论更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许渊冲译本运用“三化”,即深化、浅化和等化的翻译方法,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不断进行对话与重建、纠正与平衡、完善与超越,使意象忠实再现,而语言“不拘一格”,给人“别有天地非人间”之美感,使英语读者对《道德经》这一最具影响力的道家著作“知之、好之、乐之”。

1. 亚瑟·威利的对等和许渊冲的深化

所谓“深化”,包括特殊化、具体化、加词、一分为二等译法,如果译文内容比原文内容更深刻了,那就是“深化”(张智中,2006:75)。“深化”方法的运用使许渊冲译本冲破语言形式的躯壳,与思想“灵魂”深度对话,呈本初之意境,传原作之神韵。

例 1: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威利译: For truly 'Being and Not-being grow out of one another,

Difficult and easy complete one another,

Long and short test one another,

High and low determine one another,

Pitch and mode give harmony to one another,

Front and back give sequence to one another. (亚瑟·威利, 译, 1999: 5)

许 译: For “to be” and “not to be” co-exist,

There cannot be one without the other:

Without “difficult”, there cannot be “easy”;

Without “long”, there cannot be “short”;

Without “high”, there cannot be “low”;

Without “sound”, there can be no “voice”;

Without “before”, there cannot be “after”;

The contrary complement each other. (许渊冲, 译, 2012: 8)



“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六对看似平常的概念，具有同一的相互关系，蕴含深邃的哲学意境——“万物相对”“世间一切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威利译本只着表层即止步不前，将“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译为“complete”“test”“determine”“give harmony to”和“give sequence to”五种不同表达，语言形式虽与原文对等，实则未能传递原文“有无”永远相生相伴，对立两面相依相存的哲学意象。许渊冲运用“深化”的方法，跨越时空，与老子思想对话，将这种同一关系用“Without..., there can not be...”一个结构表达，清晰再现原作哲学意象。语言平实易懂又充分有力，排比结构更添形美及音美，不能赞一辞。此外，译文末尾增加了具有总结性质的一句，使原文蕴含的哲理意象更加明晰。说理后总结的写作手法也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方式，实乃点睛之笔。

例 2：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威利译本：When there is Tao in the empire,

The galloping steeds are turned back to fertilize the ground by their droppings.

When there is not Tao in the empire,

War horses will be reared even on the sacred mounds below the city walls.

(亚瑟·威利，译，1999：99)

许 译：When the world goes the right way,

battle steeds are used for tillage.

When the world goes the wrong way,

pregnant mares are used in war. (许渊冲，译，2012：53)

老子借马的意象强调了遵循大道的重要性：君王遵循大道，则天下安定太平，战马亦可在田地耕种，帮助生产；反之，君王不遵循大道，天下将战事连绵，混乱不安，以至母马生产仔驹于郊野之地。此处，“走马”及“戎马”的表层意义确是“the horses that are galloping”（奔跑的马）和“war horses”（战马），但将其置于整句描绘的意境之中，就会发现，其所指的意象实为“war horses”（战马）和“mares in wars”（参战的母马）。威利译本拘泥于表层意义，虽实现了词与词间的对等，然未能再现原文的真实意象。许渊冲译本运用“深化”的方法，牢牢把握意象本真，重建并纠正原文，将“走马”和“戎马”分别译为“battle steeds”和“pregnant mares”，看似与原文不符，却准确再现了真实意象，可谓超越原文。

观上述两例可知，对等理论指导的威利译本囿于原文语言形式和表层意义，忽略文本深层意象的再现；而许渊冲译本采用“深化”的方法，与作者思想深度对话，纠



正与重建原文意指方式,既使原作意象“归全反真”,又极富形美和音美。

2. 亚瑟·威利的对等和许渊冲的浅化

“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二为一等类译法。“浅化”把深奥难懂的原文化为浅显易懂的译文。(张智中,2006:75)许渊冲运用“浅化”的方法,化繁为简,超越可观的意指方式,呈现意象凝聚的文化内涵,完成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沟通。

例3:六亲不和,有孝慈。

威利译本: It was when the six near ones were no longer at peace,

That there was talk of “dutiful sons”. (亚瑟·威利,译,1999:37)

许译: When family is at odds,

filial sons and kind parents are needed. (许渊冲,译,2012:24)

何为“六亲”,历代说法不一。但“释虽殊而意多偶”,无论“六亲”的具体所指如何变化,这一意象凝结的中华民族对家庭的珍视却永恒不变。威利译本力求对等,将“六亲”译为“the six near ones”,殊不知这种译法虽实现了语言形式的对等,语言背后的文化思想却完全缺失。“the six near ones”究竟为何?恐西方读者难以琢磨。许渊冲运用“浅化”的方法,不究“六亲”繁复所指,直取意象关键内涵,将其译为“family”,虽不着原文语言形式一丝痕迹,其核心意旨已全然呈现。

例4: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威利译: To know when one does not know is best.

To think one knows when one does not know is a dire disease.

Only he who recognizes this disease as a disease,

Can cure himself of the disease.

The Sage's way of curing disease,

Also consists in making people recognize their diseases,

As disease and thus ceasing to be diseased. (亚瑟·威利,译,1999:151)

许译: It is good to know that you do not know;

It is wrong to pretend to know what you do not.

Since you know what is wrong,

so you will not be wrong.

The sage is not wrong,



for he knows what is wrong,
so he will do no wrong. (许渊冲, 译, 1999: 24)

本句中“病”的意象隐喻“危险有害的事物”，引申为动词，意思是“认为某物危险有害”。威利译本力图实现译文与原文对等，保留隐喻手法，将“病”及引申动词义分别译为“disease”和“to recognize something as a disease”，表面上再现了意象，实际却因忽略中西喻体意象的差异造成了意象失落。许渊冲运用“浅化”的方法，在意指方式的“舍”与意象本真的“得”之间找到平衡，将“病”译作比喻义——“something wrong”和“to take something as wrong”，意指方式有所牺牲，意象内涵却在译入语中获得了新生。

观上述两例可知，对等理论指导的威利译本为意指方式和表层意思所累，虽有再现原文意象之初衷，却南辕北辙，偏离了意象的确切含义；许渊冲译本采用“浅化”的方法，对原文语言进行纠正与重建，舍与译入语难以相容的意指方式，舍读者难以理解的表层意思，终得原作灵魂内涵，实现意象忠实再现。

3. 亚瑟·威利的对等和许渊冲的等化

亚瑟·威利的对等，主要表现在词法句法上，与传统意义的对等大同小异，而许渊冲的“等化”包括灵活对等、词性转换、正说、反说、主动、被动等译法（张智中，2006：75），其目的是打动读者，让读者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当原文深层意思与表层意思相同且译入语中恰有合乎原文含义的固定表达时，“等化”的方法就派上了用场。“等化”的运用使许渊冲译本关注中西意象喻体差异，探寻更加符合英语读者语言习惯，更加贴近西方文化背景的对等意象，由“差异”出发，抵达意象内涵高度“同一”之彼岸。

例 5：“有无”

威利译：“Being and Not-being”

许 译：“to be” and “not to be”

“有无”是《道德经》中极为重要的一对意象。威利将其译为“Being and Not-being”，而许渊冲则译为“to be”和“not to be”。两种译法都忠实原文，但许渊冲的译文中植入了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典故——哈姆雷特的经典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并且，这句独白蕴含的深奥哲理与“有无”承载的深邃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许渊冲译本更能引起译文读者的共鸣。



例 6: 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威利译: It is upon bad fortune that good fortune leans,

upon good fortune that bad fortune rests. (亚瑟·威利, 译, 1999: 123)

许译: Weal comes after woe;

woe lies under weal. (许渊冲, 译, 1999: 65)

老子借“福”与“祸”这对意象再次阐发事物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哲学命题。威利译本追求词间对等, 将“福”“祸”译为“good fortune”和“bad fortune”, 并无不可。但许渊冲译本着眼更深层次的对等, 探究译语文化, 将其译为英语中的固定表达——“weal and woe”, 意象内涵高度“同一”, 语言则更具音韵美, 不失为对原作的完善与超越。

观上述两例可知, 受对等理论影响的威利译本虽能传递原文意思, 但相比许渊冲译本却略显逊色。原因在于, 许渊冲译本运用“等化”的方法, 未直接对原作意象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 而是另辟蹊径, 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对等意象, 对原作进行重建与完善, 实现意象内涵的忠实再现及译文在接受效果上对原作的超越。

对《道德经》两个英译本——威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的对比研究, 充分证明了许渊冲的翻译“超越观”能有效指导汉英古典文学翻译。之所以这样, 主要原因在于, “三化”即深化、浅化和等化方法的运用, 能够帮助译者与原作思想展开深度对话, 对原作语言形式不断纠正与重建, 把握意指方式与意象内涵间的平衡, 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对等意象, 从而使译文忠实再现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意象。

结 论

“对等还是超越”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定义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对等理论”和包括严复“信、达、雅”、泰勒“翻译三原则”、诺德“功能加忠诚”等传统译论一样, 认为原文应该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许渊冲则独树一帜, 提出了翻译“超越观”, 即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译者能让译文与原文比美甚至可以超越原文。许渊冲翻译“超越观”指导下的译文冲破原文形式和表层意思的束缚, 以简洁凝练而又极具艺术性的语言准确再现原文意象, 使英语读者对原文“知之、乐之、好之”, 内容深刻, 语言优美。可以说, 这样的译文本身即是经典的文学作品。

本研究遵从许渊冲的竞争论, 将《道德经》两个英译本——威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 深入探讨“对等”与“超越”, 评析哪一译论能够更好实现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象再现”。经研究发现, 许渊冲译本确然有其优势, 具体表现在许渊冲译本做到了以有限的言语传递无限的意境, 并且其语言也更易为英语读者理解。这恰恰证明了拥有完整理论体系的许渊冲翻译“超越观”较语言对等论, 更能有效指导汉英



文学翻译。

总之,许渊冲的翻译“超越观”促使译者重新选择指导汉英文学翻译实践的翻译策略,让译者及翻译理论家重新审视与构建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同时,许渊冲翻译“超越观”在《道德经》英译中的运用证明了它能够有效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更全面地再现文化“意象”。笔者期待这一翻译策略在促进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外译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阿伦特(德),编,张旭东,等,译.启迪:本雅明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2008:86.
- [2]董成.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汉英文化意象与翻译策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46-150.
- [3]黄海容.本雅明翻译观述评[J].中国翻译,2007(4):87-92.
- [4]兰宁鸽.本雅明的翻译超越论对诗歌翻译的启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169-172.
- [5]李玉良.《诗经》意象翻译——方法与审美效果[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1):10-18.
- [6]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74.
- [7]马会娟.对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的再思考[J].外语学刊,1999(3):74-79.
- [8]王一.别人谈对等时,我在谈超越——独家对话 2014“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得主许渊冲[EB].解放网 http://www.jfdaily.com/life/bw/201408/t20140815_670398.html,2014-08-15.
- [9]亚瑟·威利,译.大师经典文库·道德经[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 [10]许渊冲.许渊冲英译王维诗选[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67.
- [11]许渊冲.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化梦[J].中国外语,2014(5):11-18.
- [12]许渊冲,译.许译中国经典诗文集·道德经[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
- [13]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5.
- [14]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5]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2.
- [16]张智中.许渊冲与翻译艺术[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75.
- [17]Peter Newmark. *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作者简介] 张丽颖,女,北京市中国网英文部编辑,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电子邮箱] zhangliying0710@qq.com

论《长恨歌》英译的失衡：在文学性重构与明晰化取向之间

张 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摘 要：王安忆《长恨歌》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奖，其英译本功不可没。但在译作中，隐晦曲折的审美传递与基于接受的明晰化考量之间涌动着张力，由此而生的不和谐因素不容忽视。本文以“文学性”囊括文学中的美学成分，重点考察《长恨歌》英译本在文学性重构与明晰化取向之间的失衡，以求从反面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环节以启发。

关键词：文学性；明晰化；《长恨歌》英译；圆满调和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The Imbalance between Literariness Recreation and Reader-Based Explication

Zhang Xin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he nomination of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by Wang Anyi for 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is largely attributed to its translation. However, the disharmony in the translation caused by the tension between aesthetic elements compensation and reader-based explication cannot be overlooked. With the aesthetic elements in literature epitomized by the concept of literarines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balance between recreating literariness and intensifying explic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Hopefully, the criticism on the negative examples in the translation can draw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goes abroad.

Key Words: literariness; readabilit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perfect harmony



一、引言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以上海为背景，将复古怀旧的情调融入了对一名女子跌宕情感历程的叙写，自1996年首次出版后，反响热烈，频获嘉奖。《长恨歌》于2000年获茅盾文学奖，后又改编为同名影视作品，更于2018年9月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小说英译本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 亦被誉为经典，助力《长恨歌》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奖，堪称中国文学成功译介的范式之一。英译本的成功接受或能彰显译者对读者的关照，但《长恨歌》作为民族文学，它的价值与全貌是否得以忠实复现，亟待进一步考察。经分析，本文以为，审美传递消解于明晰化阐释的失衡现象在《长恨歌》英译本中并非无迹可寻。

《长恨歌》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陈毓贤（Susan Chan Egan）指出，为了照顾译文的可读性，他们做出了背离原作风格和语体上的变动（Berry & Egan, 2008: vii）。自然，如“通顺达意”这般关乎明晰化的考量几乎作为一种普适原则，制约着本体论意义上的译者行为，但在创造性的文学翻译中，延长译文读者感知美学成分的路径重于基本信息的流畅灌输。《长恨歌》的成功译介离不开译作所凸显的译语取向与明晰化，但在朝向达意与接受靠拢的合力中，译者对审美信息的安放才是体现文学翻译创造性价值的关键。《长恨歌》在意义攫取中千疮百孔，即使在读者接受的掣肘下，它被剥离的美学成分亦须补偿。如此，《长恨歌》的英译可谓内外交困，掣肘重重，难免出现了不够协调的痕迹。

本文借用“文学性”这一概念囊括文学中带有民族文学特征与作家个人色彩的美学成分，重点考察《长恨歌》英译本在文学性重构与明晰化处理之间的取舍，探索文本中的不和谐因素，以求通过批评个中反例，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环节有所启发。

二、文学翻译视域下的文学性与明晰化

若要考察《长恨歌》英译本在文学性重构与明晰化取向之间的得失，须先对文学性的历史内涵及具体表现做整体性廓清。文学性这一概念起源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之一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Lemon & Reis, 1965: 107）雅各布逊将文学性局限于语言层面，侧重通过辨识日常语言与诗性语言提炼文学性，即认为文学性在于“对普通语言实施有系统地破坏”。文学观念随时代流转而嬗变，语言层面的“变异”显然无法概括文学性的全部内涵，但隐寓其中的“陌生化”概念确为文学性的重要成因之一。

南帆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文学性的界定属于本质主义，即视文学性为文学



中固定不变的本质,与之对立的非本质主义则关注于在文学样式的比较中动态定夺文学性。20世纪末期,解构主义思潮中的文学性概念甚至出现了向非文学文本扩张的倾向,试图消解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南帆,2005:56-57)。对于后来涌现的这类针对文学性的种种消解性阐释,笔者无意全盘否定,并以为新理解或能阐发新意义,甚至拓宽文学研究的疆域。然而,在考察文学翻译中文学性重构的语境之下,寻求具化文学性概念的途径至关重要。换言之,若不从文学性具体表现的视角审视文学翻译,文学性与文学翻译的关联便会局限于高度抽象的理析,文学翻译的实践和翻译批评的实践皆无法获得关照。

史忠义提出:“文学性存在于话语从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存在于形象思维之中。形象思维和文学幻想、多义性和暧昧性是文学性最基本的特征。文学性的定义与语言环境以及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史忠义,2000:127)这一论断回归了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性概念,拓宽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视界,然对于文学翻译而言,亟待进一步具象化和明晰化。

童庆炳结合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与诗学因素,发表了“文学性即审美性”的论断,进而提出审美性的五种体现:“气息”“氛围”“情调”“韵律”和“色泽”(童庆炳,2009:57)。这固然对俄国形式主义视野下文学性概念的扬弃与超越,也在可操作性上胜过非本质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视域,但“气息”“氛围”等术语层级过高,意义隐晦,范畴叠合,在考察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再现方面,针对性不强,适用性不足。

曾祥宏有的放矢地将文学性置于文学翻译的视野中考察,认为文学性重构在文学翻译中可具化为语言修辞层面、文体风格层面、文化意蕴层面和审美意境层面,同时受翻译外因素制约(曾祥宏,2013:18)。相较之下,曾祥宏所提的四个层面高度凝练且相对独立,有助于廓清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全貌,有利于翻译批评的展开。

综上所述,文学性无论如何具化,本质上都是一种“异化”,此一异化背后隐寓着民族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共有期待,即曲折读者感知美学成分的路径,延长读者体验审美因素的历程。倘若以日常语言共性为原点,文学语言特性则是一种极端变体,朝陌生化靠拢,而以排除歧义、力求精准为典型的科学语言特性是另一种极端变体,往明晰化发展。“明晰化”这一术语最早由维奈和达贝尔内(Vinay & Darbelnet)提出,意指“将原作的信息在译作中以更为明确的方式表述出来”(贺显斌,2003:63)。这种“更为明确的方式”或具化为语言形式的归化,或体现于语体正式性的变更,或聚焦在解释性翻译的采用,总归倾向于缩短读者接受原文内容的路径,提升读者接受基本信息的效率。在文学翻译的视域下,明晰化处理关乎信息传达及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文学性复现关乎审美传递及文学价值构建,两者本不可偏胜,却常在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操纵中产生张力与冲突。



本文以曾祥宏的文学性四分法为基本考量,结合上述对文学性概念的代表性论断,兼顾王安忆《长恨歌》及其英译本的审美特征,拟对《长恨歌》英译本在文学性重构与明晰化取向掣肘下的表现进行阐发,所涉视角涵盖四个方面:文化意蕴、审美意境、形式意味与陌生化、文体风格与含蓄性。

三、文学性与明晰化掣肘下的《长恨歌》英译

《长恨歌》以20世纪上海为底色,叙写了弄堂女子王琦瑶风雨飘摇而浪漫传奇的人生际遇。她容颜姣好,闭月羞花,获选“上海小姐”后踏入盘根错节、喧嚣嘈杂的情场,与几名男子纠缠不清;她命途多舛,几经沉浮,繁华旧梦终在时移势迁中幻灭成空。

《长恨歌》的叙事别具一格,弱化了小说常见的对话语言,强化了语言的记叙性,但又不完全朝向白描靠拢,而是于典雅中见现代意味,于素净中见伤怀愁绪。“曾经沧海”“近水楼台”等中华文化意象随处可见,典雅的“中国味”弥漫全篇,段落冗长、直接引语“去引号化”等形式偏好释放纯叙述语言之张力,激发疏离的审美体验。凡此种种,皆成就了《长恨歌》独特的文学性,下文拟针对部分译文在文学性重构和明晰化处理掣肘下的表现展开批评。

1. 文化意蕴的再现

在对纯叙述性语言的追寻中,王安忆不忘以中国文化的独特意蕴点缀文本,因而《长恨歌》里的中国味随处可见,彰显了文学性重要的一面。但译作中的中国意蕴有失有得,试看下例:

原文:于是就有流言兴起,说王琦瑶的表兄之类的在《上海生活》当差,走的是近水楼台。(王安忆,2003:43)

译文: And so gossip and rumors proliferated. Even one suggested that Wang Qiyao had a cousin who worked at *Shanghai Life* and it was he who had got her into the magazine. (Berry & Egan, 2008: 44)

此例中带有中国烙印的文化意象“近水楼台”被译者略去,取而代之的是“表兄将她介绍给《上海生活》”这样的大白话。译文虽使基本信息得以准确传达,但以折损原作审美信息为代价换取简约明晰的接受效果,这一做法值得商榷。谢天振这样界定文学翻译中的“译者职责”:“译者不应满足于传达原文文化意象的一般意义,而应将尽最大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文化意象也视作自己的一种职责。”(谢天振,2007:109)上例中的译文显然毫无保留文化意象的意识,作为文学性具象之一的文化意蕴消解在



了明晰化的读者取向中。反观下例,译语表现大有不同:

原文:王琦瑶也有如鱼得水之感。(王安忆,2003:41)

译文: Wang Qiyao in turn took to the attention like a fish to water. (Berry & Egan, 2008: 41)

此处的译文不仅完整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旨,还保留了成语“如鱼得水”中“鱼”和“水”的文化意象,履行了译者职责。相较例(1),该译文实现了“本旨”传达、读者接受和文学性重构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2. 审美意境的重构

除了再现带有民族烙印的文化意蕴,审美意境的重构也是在文学翻译中补偿文学性的关键途径。在王安忆的个人情感与读者的审美意识的参与下,《长恨歌》中堆叠的物象化作意象,不同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打开了读者接受中生命律动、韵味无穷的想象空间。请看下例:

黄浦江闪闪发光,江面有一点一点金银斑,是飞翔的水鸟。(王安忆,2003:41)

原作叙事视角按“发光的江面”“江面的金银斑”“飞翔的水鸟”的次序徐徐切换,有条不紊。意象的排列是作者在审美意识参与下遣词造句的结晶:抬眼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必是波光粼粼的茫茫江面,继而注意到江面上模糊不清的金银斑点,最后稍作辨认方才识出飞翔的水鸟。视角的合理切换蕴含着空间美,空间美进而成就了读者脑海里的画面美,意境终于得以释放。对于原文的审美信息,译者如何处理的呢?试看译文:

The Huangpu River glistened; the seagulls soaring above its waters looked like tiny silver spots. (Berry & Egan, 2008: 41-42)

在译文中,读者刚把目光从茫茫江面收回,尚未来得及体会细细辨识金银斑的趣味,水鸟便强行凑到眼前,实在扫兴。固然,英语句式重焦点信息,一般从前向后扩展,但此处保留原文意象的列序并不会阻碍内容的传达。反而,一味对句式结构进行明晰化处理以照顾译语阅读习惯,会致使视角动态切换中的空间美荡然无存,译文意境支离破碎,文学性折损大半,文学性与明晰化的平衡亦无从谈起。



3. 形式意味与陌生化的还原

20 世纪初,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这一概念。根据杨向荣的总结, 所谓陌生化就是使之陌生, 延长审美主体关注的时间, 增加其感受的难度, 强化审美快感 (杨向荣, 2005: 61)。申丹认为, 在文学叙事中, 文体价值的实现要么在于恰当选择常规用法, 要么在于违背常规用法规则 (申丹, 2017: 28)。以“强化审美快感”为导向的“违背常规用法规则”即笔者拟在此讨论的陌生化概念, 通过形式手段实现的陌生化效果贯穿了《长恨歌》全篇, 译者在还原形式意味与陌生化方面的努力是本部分考察的重点。

首先, 译者在译序中提道: “在中文原作中读来尚可的长段落与流水句多在译文中断开。” (Berry & Egan, 2008: vii) 此处需澄清一点, 尽管中文语篇的分段频率一般低于英语语篇, 但《长恨歌》的分段频率过低, 整页都无段落划分的情况实属常见, 如此形式处理显然令原作读者感到陌生, 怎能以“读来尚可”轻描淡写? 这一贯穿整部小说的陌生化处理凸显了作者对纯叙性语言的追求, 亦是《长恨歌》文学性的具象之一, 译者将其明晰化而放弃重构文学性的行为有待商榷。

此外, 作家通常通过对话和心理描写传递人物特有的声音, 吸引读者目光, 构成前景化。但王安忆追求纯叙事导向的“背景音”。她坦言: “我以前写人物对话, 总是‘他说……’‘她说……’照录不误, 现在这种写法我总力求加以避免。……归根到底, 小说语言是一种叙述性的语言, 也可以说是语言的语言或抽象性语言。” (叶红、许辉, 1995: 29) 因此, 《长恨歌》中的直接引语不用引号或分段标记, 这便又是一例通过形式手段实现的陌生化, 贯穿全文, 下例仅是冰山一角:

吴佩珍便揭底似的说: 你不是讲每天都可看见谁谁谁的? 王琦瑶见表哥脸上下不来, 就圆场道: 下回再来吧, 天也黑了, 家里人要等了! (王安忆, 2003: 31)

对于原文拒绝以引号和分段标记人物对话的形式特征, 译者有否关照呢? 请看对应译文:

Wu Peizhen caught her cousin in a lie. “Didn’t you tell us that you are always running in to all these big name stars at the studio every day?” she protested.

Wang Qiyao took pity on the cousin and tried to smooth things over. “It’s getting dark. We had better come back some other time. Our parents will be worried!” (Berry & Egan, 2008: 33)

诚如译者在译序中所言: “考虑到英文的可读性, 译者在直接引语处 (以使用第一



人称代词为标记)添加了引号,切分了段落。”(Berry & Egan, 2008: vii)原本,段落冗长、直接引语“去引号化”等形式处理成就了带有作家印记的陌生化,如此,作者向故事靠近,而读者与故事疏远。但在译语文本中心论的操纵下,隐去的引号遭到还原,冗长的段落遭到切分,形式上的明晰化致使作者、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面目全非,带有作者标志的陌生化消解于朝向基于可读性的明晰化考量靠拢的合力。

4. 文体风格与含蓄性的复现

“文体”指向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广义地说,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要素是文学性,前文分析已从不同角度多有涉及,但此处所提的文体风格侧重考察含蓄性。语言表达的含蓄性延长了读者领悟文本的时间和美学成分传递的路径,强化了审美体验,映射出隐寓其中的文学性。汉语本身的意念主轴特性与王安忆复古怀旧的情调使得含蓄性在《长恨歌》中显露得毫不含蓄。请看下例:

(5) 他背地里和片厂的人说,珍珍是个丫头相, 不过是荣国府贾母身边的粗使丫头,傻大姐那样的。(王安忆, 2003: 33)

上句中的“荣国府”“贾母”和“傻大姐”等均出自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原文不直接呈现对珍珍的评价,而以《红楼梦》的元素点缀其中,让读者带着《红楼梦》的熟悉世界,进入到《长恨歌》的陌生世界,曲折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文本含蓄性不言自明。试看对应译文:

Behind their backs he described Zhenzhen to his colleagues as a graceless servant girl right out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little cleaning maid who thinks she is special just because she is employed in a large, wealthy household. (Berry & Egan, 2008: 35)

尽管译者增补不加注解的异质表达“*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的行为意在补偿译文的含蓄性,但由于多数译语读者脑海里并无《红楼梦》的前结构,这一处理与其说是补偿含蓄性,不如说是弱化可读性。且如吴赞所言,译者还“隐去了书中具体人名、地名的次要文化信息,如‘荣国府’泛化为‘a large, wealthy household’,‘贾母’略去不提,‘傻大姐’泛化为‘a little cleaning maid’”(吴赞, 2012: 67),此类明晰化的处理又是对原文含蓄性的背离。然而,在文化与读者前结构差异的参与下,上例的翻译不可避免地摇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可读性的弱化与文学性的失落或在所难免,翻译之憾或在于此。

若上例的含蓄性是内容上的,下例的含蓄性便体现在形式上:



王琦瑶人在事中，心里有的全不是那些。(王安忆，2003：43)

原文前后分句之间并无连词标记，一方面源于汉语“以意补形”的功能发挥，另一方面彰显了王安忆淡然叙说的笔触风格，寓含蓄性于细微处。但连接标志的凸显导致了形式的背离，请看译文：

Although she was the target of their attention, she had very different things on her mind.
(Berry & Egan, 2008: 44)

通过补出“Although”一词，原文含蓄的逻辑关系遭到显化甚至改写。首先，考虑到王安忆文风的连贯性，隐匿原文内的逻辑更倾向于语气平淡的顺承关系，而非引人注目、带前景化意味的让步关系。其次，译者以形式手段显化逻辑关系的行为尽管是为关照译语审美考量，却也全然消解了原文的含蓄性。译文顾此失彼，离文学性重构与明晰化取向的平衡相去甚远。

四、结语

正文部分的译例批评或能说明，在关照读者接受的前提下，成功译介的《长恨歌》英译本仍具备进一步重构文学性的空间和平衡文学性与明晰化的余地，此一余地或能具化为基于读者接受考量的明晰化处理分别与文化意蕴、审美意境、陌生化、含蓄性之间的折中调和。

在本文选取的案例范围内，译文出现了四种有待商榷的翻译倾向。首先，在翻译带有中国文化烙印的表达时，译者取基本信息而舍文化意象。其次，译者忽视了原作遣词造句的深意，未能在重构审美意境方面做出努力。此外，对于带有陌生化意味的形式，译者滥用明晰化手段进行处理。最后，译者以显化处理抵消原作固有的含蓄文风。究其根本，上述四方面的明晰化倾向皆源于译语审美考量与读者可接受度，却弃体现文学翻译创造性价值的文学性重构于不顾，忽视了在文学性与明晰化之间实现平衡的可能。

以上针对《长恨歌》英译本中不和谐因素的总结或能从反面予中国文学“走出去”中的翻译环节以对策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启示。谢天振在界定文学翻译的性质时提出，与属于非艺术范畴的非文学翻译不同，属于艺术范畴的文学翻译不仅要传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审美信息(谢天振，2007:134)。此处的“审美信息”大致对应本文强调的文学性，而“基本信息”的传达则与以解释为手段、接受为目的的明晰化处理息息相关。自然，对于以成功译介为目的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译者须在



明晰化手段的参与下搭建传递基本信息与文学性的桥梁。但达意、接受与文学性重构三者不可偏胜,倘若如前文所析译例般,任凭文学性消解在对达意与接受的关照之中,即使为译语读者所接受,中国文学的价值与面貌亦无法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世界文学之林。

参考文献

- [1] 贺显斌. 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现象[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4): 63-66.
- [2] 南帆.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56-61.
- [3] 申丹. 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4] 史忠义. “文学性”的定义之我见[J]. 中国比较文学, 2000(3): 122-128.
- [5] 童庆炳. 谈谈文学性[J]. 语文建设, 2009(3): 55-59.
- [6] 王安忆. 长恨歌[M]. 海南: 海南出版公司, 2003.
- [7] 吴贇. 陌生化和明晰化的共场:《长恨歌》的英译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4): 62-68.
- [8]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9] 杨向荣. 陌生化[J]. 外国文学, 2005(1): 61-66.
- [10] 叶红, 许辉.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主题意蕴和语言风格[J]. 当代文坛, 1997(5): 28-29.
- [11] 曾祥宏. 论译文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简·爱》三个中译本为例[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 [12] Lemon, Lee T., Marion J. Reis.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 [13] Wang Anyi. 长恨歌[Z]. M. Berry and S. C. Egan.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 Novel of Shangha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作者简介] 张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 翻译批评。

[电子邮箱] ZhangXin199602@outlook.com

翻译实践探索

彭斯诗歌汉译原则探析 ——以《彭斯诗歌精选》为例

李正栓 王 心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摘 要: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引入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歌。此后,有诸多译者将彭斯的诗歌译为汉语,但由于译者所处时代不同,语言风格各异,译本呈现也各有千秋。2016年,《彭斯诗歌精选》出版,选译彭斯诗歌108首,是为国内收诗数量最多的译介。通过回顾诗歌翻译的过程,本文认为,彭斯诗歌汉译应遵循追求忠实对等、借译诗还原魂、适当稳中求变的原则,以求最大限度地贴近原作,并使其符合读者的期待。
关键词: 罗伯特·彭斯;诗歌汉译;原则;忠实对等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ng Robert Burns' Poems into Chinese: with *Select Poems of Robert Burns* as an Example

Li Zhengshuan Wang X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Poems of Scottish poet Robert Burns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n, many translators have translated Robert Burns' poems into Chinese. However, translators in different eras have various language styles, so their translations are also diverse. Consisting of 108 poems, *Select Poems of Robert Burns*, the largest number of translation of Burns' poems in China so far, was published in 2016. Review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ranslating Robert Burns' poem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ursuing faithful equivalence, presenting the soul of poet's idea via translation, and using new expressions on the basis of being faithful so as to maximize the closeness to the original and make it fit readers' expectation.

Key Words: Robert Burns; translating poems into Chinese; principles; faithful equivalence

一、引言

罗伯特·彭斯(1759—1796),出生于苏格兰西南部艾尔郡小镇阿洛韦的一个佃农家庭。作为家中长子,彭斯从小就跟随父亲下地干活。他受祖母和母亲熏陶,自幼喜



听苏格兰民歌与民谣。劳动之中,他边干活边哼唱小曲。劳作之余,他喜欢研究苏格兰民谣,创作诗歌,常常旧瓶装新酒,改编旧歌曲,在其总集中,歌曲约占 50%,奠定了他对苏格兰民歌和民谣进行传承的基础。然而,辛勤劳作并未改变他贫穷的家境,于是他想移民美洲,却又无奈路费高昂,无法成行。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决定出版自己的诗歌,以筹措路费。1786 年,他的《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Poems, Chiefly in Scottish Dialect*)出版,他也因此得到一小笔稿费。他的诗颇受欢迎,一夜成名,轰动苏格兰乃至整个英国。人们的争相购阅,使他产生以诗谋生的想法。于是他放弃移居美洲的计划,并应邀去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结识了许多文人雅士。然而,好景不长,与上流社会的格格不入迫使他回到家乡。出于生计,他谋得一个税务官的职务。骑马奔波的工作之余,他仍笔耕不辍,收集、整理、改编苏格兰民谣。

生活是创作灵感的源泉。务农的经历和对苏格兰民谣的痴迷成为彭斯大量诗歌创作的基础和素材。他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从第一部诗集出版到他逝世也不过短短十年”(Burns, 1959: 1),但是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六百多首诗歌,仅在人生中的最后九年,就“编写了将近三百七十首抒情诗歌”(袁可嘉, 1959: 40)。他热爱祖国锦绣山河,关心人民劳动生活,他的诗歌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且经久不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才在《摩罗诗力说》(1907)里首次介绍了彭斯。金东雷认为,“他的伟大和莎士比亚不相上下”(金东雷, 2010: 208)。其实,在苏格兰人眼里,彭斯是最伟大的诗人,并称他为“National Bard”。有人将这一称号译成“民族诗人”,我认为译成“国家诗人”更合适,尽管苏格兰不是独立的国家。“National Bard”体现了苏格兰人民对彭斯的高度认可和敬仰之情。

彭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始于二十世纪初,1949 年之前,大部分译本刊登于各类刊物之中。译文形式众多,包括楚辞体、五言古体、仿格律诗或半文半白的形式,译者有苏曼殊、吴芳吉、梁实秋等当时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兼翻译家。袁水拍是这一时期具有突出贡献的译者,1944 年,他翻译出版《我的心呀,在高原》,选译彭斯诗歌 30 首,且是最早尝试用白话文翻译彭斯诗歌的译者。彭斯诗歌在中国译介的高潮出现在 1959 年彭斯诞辰 200 周年之际,当时恰逢中国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新民歌运动,农民诗人彭斯的民歌民谣备受推崇。同年,袁水拍《我的心呀,在高原》修订再版,袁可嘉的《彭斯诗钞》和王佐良的《彭斯诗选》分别出版。此后,中国的彭斯译介又陷入了沉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彭斯诗钞》和《彭斯诗选》分别再版,“彭斯之夜”纪念会也多次在北京举办,然而不久,彭斯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再次日渐式微。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派遣,李正栓 2014 年年底到英国斯特灵大学做访问学者,翻译彭斯诗歌 200 余首,并于 2016 年出版《彭斯诗歌精选》(含 108 首),实现了彭斯诗歌翻译的数量突破、语言变易和新时期文化交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严格遵循追



求忠实对等、借译诗还原魂、适当稳中求变的原则，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原作者风貌，为读者献上最为真实的苏格兰民间歌谣。

二、追求忠实对等

翻译应追求忠实对等，努力译出“与源语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物”（Nida, 2004: 166）。诗歌翻译亦是如此。且由于诗歌体裁的特殊性，译者不仅要考虑内容还原的忠实，还要雕琢形式转换的对等。在翻译彭斯诗歌的过程中，译者在理解、形式、情感和风格方面始终以原文为准绳，力求做到忠实对等。

在理解层面上，译者要设身处地挖掘作者思想，努力探寻词语真实意义。“对于诗歌翻译而言，正确理解原诗是翻译诗歌的前提”（李正栓，2004：37），在译语的选词和表达上，要尽量接近作者，既不超越，又不落后。例如，《勇敢的织工》第一句：“Where Cart rins rowin to the sea / By monie a flower and spreading tree.”（Burns, 2016: 91）曾有译文将“Cart”译为“大车”（马车）（Burns, 1985: 44），但实际上这是苏格兰克莱德河的一条支流，大致位于厄斯金（Erskine）和伦弗鲁（Renfrew）之间，克莱德班克（Clydebank）镇对面。李正栓在苏格兰游历时发现一条河流叫 Cart，经仔细考核和研究，决定将该诗的译文改为：“卡特河水滚滚流向大海 / 那里绿树成荫花朵盛开。”（Burns, 2016: 91）理解不同，表达就会有异。导致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理解不同的原因很多，比如对苏格兰地理的了解，偶尔理解不当，不必苛求，不必小题大做并揪住不放。又如，在《我去过克鲁基登》中，所有的偶数诗行都是：“My bonie laddie, Highland laddie!” 曾有译文将该句译为“我美丽的姑娘，高原的姑娘”（Burns, 1959: 12），但是，“laddie”是苏格兰方言中的非正式用语，是对“男孩，小伙子”的亲密称呼，不是“lady”的变体。导致误译的原因是当时英汉词典少并且许多词典不收苏格兰方言。既然是误译，就应在新版本中将其纠正。李正栓译文是：“我的好小伙儿，高地好小伙儿！”（Burns, 2016: 128）此外，译者还将“Rantin”（高嗓门的）、“creepie-chair”（分娩的床）（Burns, 2016: 97）、“wooden walls”（舰队）（Burns, 2016: 126）和“By heav’ns!”（凭天起誓）（Burns, 2016: 127）等词语进行了更为精确的翻译。李正栓坚持向前辈译者学习，也力求向原作诗人学习，坚持纠正错误又不责难前辈。

在形式层面上，要尽量保持原文的诗歌形式，在视觉和听觉上均力求接近原作，争取给人以视觉美，做到“视之悦目”。“诗歌的形式是诗歌赖以生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诗歌的形式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更具有表义功能。”（张智中，2007：33）只有如实还原诗歌的形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其风情与韵味。在视觉形式方面，译文应严格遵照原诗行数、排列与缩进，在诗行长度、参差错落和句式方面应尽量与原文保持相近。且以《夜是如此寂静》第一节为例：



The night was still, and o'er the hill,
The moon shone on the castle wa',
The mavis sang, while dew-drops hang,
Around her on the castle wa'.

(Burns, 2016: 94)

夜是如此寂静，那边山上，
月亮清辉洒遍城堡的高墙。
画眉轻轻唱，露珠低低垂，
就在地周围城堡的古墙上。

(李正栓，译，2016：94)

译文行数、排列和缩进方式皆与原文相同。从句式上看，译者忠实还原了原诗“判断句，地点状语 / 陈述句 / 陈述句，时间状语从句 / 地点状语”的结构，且译文语言读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自然流畅，营造出夜晚安宁的氛围，勾勒出城堡幽静的景色，引起人的无限遐思。

在听觉形式方面，译者争取使译文在音韵和格律上与原文对等或相近，做到听之悦耳。以《我的心啊在高原》一节为例：

Farewell to the mountains high cover'd with snow,
Farewell to the strath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
Farewell to the forests and wild-hanging woods,
Farewell to the torrents and loud-pouring floods!

(Burns, 2016: 131)

再见吧，银装素裹的高山；
再见吧，绿色山谷与河滩；
再见吧，参天的森林和丛生的野树，
再见吧，奔腾的激流和轰鸣的流瀑。

(李正栓，译，2016：131)

首先，原诗每行均以“Farewell to”开始，译文皆用“再见吧”；原诗韵脚排列方式为 aabb (woods 和 floods 押眼韵)，译文为“山”“滩”“树”和“瀑”(aabb)；原诗“wild-hanging”和“loud-pouring”为行内韵，译文“丛生”和“轰鸣”押大体相近的韵。译文在视觉上展示高地风光，让读者欣赏山川高耸，在听觉上重现音韵格律，让



读者感受激流奔腾。彭斯在其诗中多次使用“Farewell to”这个抒情结构，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对告别对象的深情厚谊。要做到听之悦耳，就得研究译语句子结构、用词、标点、语气、情感、字数、词组结构等元素。译者译后经过反复朗诵和修改，终成此稿。

在语气口吻层面上，译者要研究诗作背景，揣摩诗人心理，尽量保留彭斯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特色，把彭斯的情感移植到汉语里。首先，译者要注重译语用词的准确性。彭斯自幼随父亲在田间劳作，因而他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动植物以及与之相关的词汇，如果译者缺乏该方面的背景知识或资料研究不充分，就会造成译文用词不准确的现象。例如，“foumart”是“鸡鼯”，学名为 *Mustela putorius*，俗称欧洲臭鼬，是鼬科下属的一个物种；“heather”是“石楠”，学名为 *Calluna vulgaris*，是杜鹃花科帚石楠属的植物；“rye”是“黑麦田”，学名为 *Secale cereale*，又称裸麦，是禾本科裸麦属的农作物；“roe”是“野狍”，学名为 *Capreolus capreolus*，是空齿鹿亚科狍属的欧洲狍；“mouse”是“田鼠”，属仓鼠科田鼠亚科。田鼠多为地栖种类，它们挖掘地下通道或在倒木、树根、岩石下的缝隙中做窝，而家鼠属于鼠亚科，且主要栖居在人类生活场所，如仓库、厨房等地。彭斯在田间犁翻鼠窝而作 *To A Mouse*，因而这里的“mouse”译文“田鼠”更为准确；“a-faulding”即“a-folding”，指的是把羊赶进羊圈的动作，译为“把羊赶到羊圈里”。李正栓在翻译过程中结合自身生活经历，查阅资料，使这类词汇的翻译更为准确。

同时，彭斯坚持用苏格兰方言写作，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炽热的爱国情怀。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感，并在译文中如实呈现。例如，《苏格兰人》第二节前四行：

Wha will be a traitor knave?
Wha will fill a coward's grave?
Wha sae base as be a slave?
Let him turn, and flee!

(Burns, 2016: 139)

谁愿做可耻的叛徒？
谁愿填充懦夫的坟墓？
谁如此低贱想当农奴？
让他就掉头逃跑！

(李正栓，译，2016：139)

译者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争取如实呈现原诗的三个排比问句和一个感叹句，表达



原诗气势,抒发对叛徒的强烈谴责和批判之情,忠实传达彭斯的思想感情,利于读者感受真实的环境和氛围,既保持译文的信度,又为读者创造了想象的空间。

在风格传递层面上,译者要尽量保留原作风格,保持民歌韵味。施莱尔马赫在其著名演讲“论不同的翻译方法”中提出:“两种翻译方法或途径是截然对立的,否认第三条途径的存在,这与翻译现实是相背离的”(谭福民,2018:106)。主导实际翻译过程的因素有很多,“翻译中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绝对的,异化与归化总是融合在翻译作品之中”(蓝红军,2006:107)。译者认为,在汉译彭斯诗歌时,要坚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方式,要尽量将作者带向读者,同时也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要和审美体验。在忠实传递原诗思想和内容的基础上,译文应尽量保留原诗的民歌韵味,使译文读者更好地体验异域风情和文化。“虽然要做到自然晓畅的翻译风格极为不易,翻译高质量的原作尤为如此,但是为了使译文接受者最终产生与原作接受者相似的反应,这仍然是翻译的最基本要求。”(Nida, 2004: 163)以《过去的好时光》一节为例: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 auld lang syne?
(Burns, 2016: 151)

老朋友怎能遗忘掉,
永不再放心上?
老朋友怎能遗忘掉,
还有过去的好时光?
(李正栓, 译, 2016: 151)

这首诗是彭斯根据当地民歌改编的诗,后经人配曲,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运用于多种集会场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了词曲配合的问题,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还考虑到这首诗作为歌词的曲调,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还可用汉语哼唱,实现了文学翻译促进文化交流与沟通之功效。歌诗翻译和非歌诗翻译还是应有区别的,此不赘述。

三、借译诗还原魂

译诗不能彰显译者之魂,而要再现作者之魂。济慈说:“如果一只麻雀来到我的窗前,我也会加入它的生活,啄食砂砾。”(Keats, 2005: 29)译者在翻译时也应隐身,成为“化身麻雀的济慈”,不可过多介入或过度展示译者主体性,应化为作者,使用另一



种语言表达作者的思想。“在翻译的时候，如果译者选择与自己性情相近，阅历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品来翻译的话，译者就更能和原作者及文本产生共鸣。”（仲伟合，2006: 44）李正栓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和多年来对英美诗歌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为他翻译彭斯诗歌做了良好的准备。在翻译过程中，他能充分体会作者所思、所想、所感，仿佛置身二百多年前的艾尔郡，用一首首诗抒发对生活的赞美，对爱情的赞颂。此处且以《一朵红红的玫瑰》第一节为例：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d in tune.

(Burns, 2016: 3)

呵，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
六月里蓓蕾初开。
呵，我的爱人像一支甜甜的乐曲，
演奏得和弦合拍。

(李正栓，译，2016: 3)

译者移植了原文 abcb 的韵脚，在节奏和句式方面也尽量依照原文，使前两行和后两行形成对偶的结构。在语言方面，使用“红红的玫瑰”和“甜甜的乐曲”等自然平实的语言展现彭斯对爱人的赞美，感情饱满，抒情强烈，使读者仿佛看见爱人面庞娇美，如玫瑰般红艳；听到爱人声音动听，像乐曲般甜美，诗人的思想借助汉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假如去掉一个“红”字，抒情程度将大大缩减。译者借助汉语，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精神上的交流和情感上的共鸣。

又如《远方的俊小伙儿》第二节：

It's no the frosty winter wind,
It's no the driving drift and snaw;
But ay the tear comes in my e'e,
To think on him that's far awa.

(Burns, 2016: 87)

不是冬天的风寒彻，
也不是流云和落雪，



而是眼泪总在眼窝：

我想念远方的小伙。

(李正栓，译，2016：87)

前两行是景色描写，自然界严冬之景被赋予人的情感，译者将“driving drift and snaw”译为“流云”和“落雪”，体现风光动态之美，更反衬出女子内心的孤独和无助，传达作者借景抒情之意。后两行“眼窝”和“小伙”押尾韵，突出女子的悲伤和她对小伙的思念之情。整体来看，译本如实呈现作者思想，语言平实，直抒胸臆。虽然译文用了韵，但没有因韵害义，反倒是忠实地传递了作者的情感。

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开篇时就引用诺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的话，表达译者应在译文中“消失”的理念：“我认为，翻译应该是一个力求透明译文的过程，以至于译文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就像一块玻璃，只有当它上面有刮痕和气泡时才能引起你的注意。理想状态下什么都没有，它永远不会让读者感到自己在读译文。”(Venuti, 1995: 1)在翻译彭斯诗歌时，李正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力求隐身，在深入理解原作的基础上，用平实流畅的语言还原诗人和诗歌的精神思想、语言风格和整体美感。

四、适当稳中求变

“一部翻译作品，如果语言陈旧，没有时代气息，不符合读者的审美习惯，就必然会被淘汰，一种新的译本就必然会应运而生。”(许钧，1994: 2)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人译本的语言也会略显陈旧，读起来缺乏时代气息，这也是文学研究和作品重译的必要性。“译者不仅可以赋予原作生命，还可以决定给予原作什么样的生命，以及如何将它们融入到译入语文学中。”(Lefevere, 1995: 7)在彭斯诗歌的翻译中，译者李正栓认为，在尊重原作内容和情感的基础上，译语的词汇选择可适当求新，反映时代特色，以吸引新时代读者，使译文如原作一样满足当下读者的期待。此外，译文语言使用也要把握好尺度，既体现时代感，又要保证诗歌的文学性。以《约翰·安德森我亲爱的》中的两行为例：

And hand in hand we'll go,

And sleep thegither at the foot,

...

(Burns, 2016: 71)

咱们一起走，手要牵着手，



长眠山脚下，死也头并头，

.....

(李正栓，译，2016: 71)

译者使用现代气息浓烈的形式和词语表达老妇人对丈夫约翰的爱。这是老年人对爱的直白表达，语言看似轻松随意，但却蕴藏着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简单质朴的人生哲理。译文形式整饬，音韵朗朗上口，易于被当代读者接受。

又如《矿工有一女》前四行：

The collier has a dochter,

And O, she's wonder bonie!

A laird he was that sought her,

Rich baith in lands and money.

(Burns, 2016: 90)

矿工有一女，

长得极美丽。

乡绅追求她，

有钱又有地。

(李正栓，译，2016: 90)

译文每行均为五个汉字，语言简洁凝练，节奏鲜明，读起来有抑扬顿挫之感，既传递了原文的信息，又在语言表达上迎合了当代汉语读者的审美期待。

从以上两例，我们可以看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Jauss & Holub, 1987: 26) 彭斯的诗歌历经二百多年时光，为各个国家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解读。其精髓虽未变，但不同时代读者的感受和反响却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要结合当下语言特点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翻译时为译文增添时代气息，注入新的活力。这一点还体现在人称的翻译上，例如，“*O, Whistle An' I'll Come To Ye, My Lad*”这首诗的题目，前人曾将其译为《郎吹口哨妹就来》(Burns, 1985: 52) 和《啊，吹起口哨我就来，我的郎》(Burns, 1985: 127)，但是，我们今天很少使用“郎”来称呼年轻男子，因而译者将该题目译为《哥吹口哨妹就来》。此外，译者还使用当代常用语汇，如“丫头”



“老弟”“小宝贝儿”“亲爱的”“我的亲”“我的宝贝”等,来体现彭斯诗歌的民歌韵味。在同等前提下,译者也尝试使用一些相对口语化的表达,如“心窝”“毛茸茸”“跑腿儿”“呼呼的风”等,使译文更有亲切感。

五、结语

自上世纪初彭斯诗歌进入国人视野以来,虽有众多译者尝试翻译其名作 *A Red, Red Rose*, 也有袁水拍、王佐良、袁可嘉等著名诗人和学者翻译出版彭斯诗集,但是目前国内的彭斯研究仍呈现有时代性的特点。为继承前辈遗志,李正栓秉持追求忠实对等、借译诗还原魂、适当稳中求变的原则翻译彭斯诗歌 108 首,以纪念彭斯去世 220 周年,希望能够赋予国内彭斯诗歌研究和翻译以新的活力。

在翻译彭斯诗歌的同时,译者深切感悟到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魅力。郭建中曾预言:“未来的翻译,外国文本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将会在译文中得到更多的保留。”(郭建中,2000: 52) 目前看来,事实亦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交流的深入,国内读者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翻译也可保留更多真实的语言和文化特色。希望该译本能为当代读者欣赏和理解苏格兰民谣和文化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推进中英文化交流贡献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 [1]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0(1): 52.
- [2]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3]蓝红军.文化杂合:文学翻译的第三条道路——兼评林语堂译《浮生六记》[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7.
- [4]李正栓.忠实对等:汉诗英译的一条重要原则[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8): 37.
- [5]谭福民,张志清.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观述评[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1): 106.
- [6]许钧.重复·超越——名著复译现象剖析[J].中国翻译,1994(3): 2.
- [7]袁可嘉.彭斯与民间歌谣——罗伯特·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J].文学评论,1959(2): 40.
- [8]张智中.诗歌形式与汉诗英译[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5): 33.
- [9]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 44.
- [10]Burns, Robert. *Poems of Robert Burns* [M]. 袁可嘉,译.彭斯诗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I.
- [11]Burns, Robert. *Poems of Robert Burns* [M]. 袁可嘉,译.彭斯诗钞.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27.
- [12]Burns, Robert. *Poems of Robert Burns* [M]. 袁水拍,译.我的心呀,在高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2.



- [13] Burns, Robert. *Robert Burns Selected Poems* [M]. 王佐良, 译. 彭斯诗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44, 52.
- [14] Burns, Robert. *Select Poems of Robert Burns* [M]. 李正栓, 译. 彭斯诗歌精选: 英汉对照.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3, 71, 87, 90-91, 94, 97, 126-128, 131, 139, 151.
- [15] Jauss, H.R. & Holub, R.C.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and Reception Theory* [M]. 周宁, 金元浦, 译.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26.
- [16] Keats, John. *Select Letters of John Keats* [M]. 王昕若, 译. 济慈书信选 第2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29.
- [17] Lefevere, André.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95(1): 7.
- [18] Nida, Eugen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9]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作者简介] 李正栓, 文学博士,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和诗歌翻译研究。

王心,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翻译硕士。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研究。

[电子邮箱] zhengshuanli@126.com; 15230809291@163.com

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的编纂：原则及模式

赵 奂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摘 要：翻译词典的编撰是口笔译研究发展的重要依托。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诉求中，遵循平行语料库的建库原则并采用众源模式的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具有编纂的必要性。该词典从国内口笔译工作者及研究者的需求出发，借鉴平行语料库的通行转写和标注规范，采用源自西方的众源模式对文化负载词（表达）进行释义，为需求者提供所需的权威真实的语料。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口笔译词典；平行语料库；众源模式

C-E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Dictionary: Principle and Model

Zhao Huan

(School of English,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Achievements made in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 research are greatly at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ctionaries. In response to China's "going-out" cultural strategy, researchers see the necessity in lexicography for culturally loaded expressions, which is in adherence to the parallel corpus constructing norms and of the crowd sourced compilation model. Being aware of needs of translators / interpreters and researchers, developers of this dictionary hope to facilitate efficient translating / interpreting with paralleled authoritative versions and supplying researchers with real language materials.

Key Words: China's "going-out" cultural strategy;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dictionary; parallel corpus; crowdsourced model

引言

口笔译词典编纂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促进口笔译工作者的工作效率，提高口笔译工作质量，二是口笔译理论假设的建立和论证，并促进系列研究的发展，如译者行为分析、口笔译环境分析、语言教学、机器翻译（MT）、自然语言处理（NLP）、语



言认知等。根据国内口笔译词典现状,本研究认为,有必要编纂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既为口笔译工作者提供准确权威的译文参考,又为研究人员提供真实权威的语料素材。从需求分析而言,近几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诉求中,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话语引经据典愈加频繁,中国传统文化的词句在发言稿和外宣文件中的不断出现让口笔译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编纂思路应运而生。该词典借鉴平行语料库通行转写和标注规范(norm)等原则,并采用众源模式进行词汇收集整理和释义,为口笔译教学/学习者、翻译人员提供方便提取的权威语料,为口笔译研究者提供真实分析案例、语料的科学转写和系统标注,也为既有的口笔译理论和形成中的理论假说提供了推证工具。

一、国内外口笔译词典和研究的基本情况

词典编纂受益于语料库的发展。20世纪末有两个基于语料库的口笔译研究的重要节点。1993年Mona Baker的《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发与应用》一文如一石惊浪,开启了多国建设翻译语料库的热情,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随之欣欣向荣,她本人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第二个节点是1998年,在这一年Shleisinger提出了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之后国外研究人员尝试建设了若干口笔译语料库,其中不乏佼佼者,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欧洲议会口译语料库(EPIC)、欧洲议会平行语料库(EPPPC),以及日本同传语料库(CIARI)(张威,2012:194;胡开宝,等,2015:7-8)。从三大代表性的语料库来看,其值得借鉴的共同特征是:主题集中,均属于专题语料库;英语是重要中介语;语料进行了有目的的文字转写,转写有详细的规范,比如词性并归和口语中不流利现象的真实保留;共享性和开放性;收录真实语料。这些语料库的建立,激发了大量的研究,包括SMT、NLP、语言认知、语言教学、词典编撰以及口笔译理论的建立和论证。比如,CIARI创建的目的就在于发展同传系统,促进口译理论研究。

大陆关于口笔译语料库的建设与研究紧随其后,但相对滞缓。目前在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力的口笔译语料库包括《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PACCEL)、《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CECIC)以及《总理两会记者会汉英交替传译语料库》(CEIPPC),最后一个纯粹是口译语料库。这三大语料库的共同优点在于,主题明晰,转写和标注满足了相应的研究,其中CECIC和PACCEL体现了口笔译一体化建库思路。近年来,大陆小型专题笔译语料库建设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比如由刘克强编建的《〈儒林外史〉汉英平行语料库》。与此同时,该研究者基于平行语料库,开展了《〈水浒传〉翻译大辞典》的编纂。小型专题笔译语料库可圈可点之处是可直接服务于编纂专题辞典和理论研究,譬如《〈三国演义〉诗词英译》就是通过建立汉英一对



四平行语料库的方法开展的以小型专题语料库为基础的翻译研究。这一系列笔译语料库的建设及相关辞典的编纂和翻译研究等的开展,说明词典编纂及翻译研究越来越多地受益于平行语料库的建设。

根据 CNKI 显示的数据统计,21 世纪初大陆学者开始有关于基于语料的口笔译教学研究研讨和推介,如廖七一(2000)、丁树得(2001)、柯飞(2002),甚至有学者认为,大陆关于口译语料库建设和研究的相关文献在 2007 年以后才逐步出现(张威,2012;李洋,2016)。20 年间,国内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学口译分支的研究论文,截至 2012 年,实际发表了 8 篇。2007 年,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语料库与译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相关领域的 6 本著作出版,《中国翻译》《中国外语》等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语料库口译研究论文 26 篇(截至 2014 年)(李洋,2016: 110)。2016 年及以后为语料库口笔译研究的高潮期,据粗略统计,CNKI 上 2016 年至今以语料库翻译为主题的论文多达千余篇。这些研究结合语料库和描写翻译学,采用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颇为丰赡。

在对比国外口笔译语料库的编撰后,我们发现中国大陆现有的口笔译语料库存在一些缺憾:其一,难以满足口笔译工作者直接提取语言素材开展翻译工作的需求,对提高口笔译工作质量的作用较小;其二,语料库扩容慢,开放性相对不足;其三,为服务理论研究为目的建设的语料库只能满足相对狭隘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受益面窄。由此可见,大陆缺乏这样的语言工具,既基于平行语料库建设的原则,对经典名著权威译文进行词对齐和句对齐,方便口笔译工作者比对或提取使用,又能提供真实权威语料及其详细来源,使研究者能据此广泛便捷地开展理论研究。本文认为,语料库的建库原则对词典编纂有极大的启发,特别是从促成新理论及理论规证这一层面而言,现阶段翻译词典在使用者视角和编纂思路上都需大力拓展。

二、体现平行语料库建库原则的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的编撰

1. 功能和特点分析

体现平行语料库建库原则的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应具备两大功能:为口笔译实践提供多译文选项,辅助甚至直接提高口笔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口笔译理论研究,如口笔译共性研究、译文比较研究、作者译者角色研究、译者策略研究、重译研究、译者心理负荷研究,等等。该词典应具备三大特点:第一,译文权威真实;第二,句级对齐;第三,文化词重点标注,检索方便,发挥词典的作用,也有平行语料库所提供的易于比对、方便研究的作用。

就第一个功能而言,该词典对于口笔译工作者而言应能起到语言服务的作用。学科专业语料库的应用方向之一就是专科词典编纂。语料库应用于词典编撰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辛克莱教授的带领下,研究人员就建立了 COBUILD 语料库,采用词语索引技术对海量语料进行大规模调查,开启了现代词典编纂的先河(崔维霞、王均松,2013: 55-58)。语言表述、承载、并象征着文化现实,用准确权威的英语译文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讲述、解释中国文化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每个口笔译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任务。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国外语言学界早已有了系统的论述(Kramasch, 2000; Samonvar et al., 2000)。据 Sharoff 等(2009)的研究,欧洲学者利用平行和可比语料库为克罗地亚语和拉托维亚语等研究资源不足的语言,创立了以 ASSIST 为基础的机器翻译系统,该系统采用新闻文献的大规模英、俄可比语料库,为在字典中几乎找不到的词汇或最新出现的表达提供鲜活的译文,供翻译人员选择使用。中国文化词历史悠久,深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走出去”的宏大背景中,文化词口笔译却总是译者之苦,解决这一问题也可以参照 Sharoff 文中所提思路建库,建立权威译文并列的语料库,让译者可以进行对比挑选,选择符合情景的生动译文,对口笔译外宣工作必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内容,他国都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一个真正能起到桥梁作用的权威性词典类语料库能有效扫清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障碍。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就具备这样的功能。

就第二个功能而言,体现平行语料库的建库原则的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编纂者采取口笔译理论研究者的视角,用一(原文)对多(译文)的平行方式进行译文整理。Mona Baker (1995: 230-236) 提出了语料库的三种类别:平行语料库(parallel corpora)、可比语料库(comparable corpora)和多语语料库(multilingual corpora)。平行/对应语料库是由原文文本及其平行对应的译语文本构成的双语语料库,其理论贡献在于它促使翻译研究从规约性研究向表述性研究转移;可比语料库收集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表达以便对比研究,属于单语种语料库;多语语料库顾名思义收集某种语言如英语的原文文本,研究各语种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方式。

本文讨论的在编口笔译词典遵循平行语料库建库原则,把经典译本对某一文化词汇的译文进行平行词对齐,就具备了查词功能;同时为同一例句以及相关译文及其出处进行句对齐,用于支持更广泛的口笔译研究。

2. 众源收录、释义模式

由于语料收录的巨大工作量,体现平行语料库的建库原则的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拟划定一个可操作的收录范围,同时保持开放以便收集和补充更多语料。如前所述,该词典收录经典作品的平行笔译译文,将所有语料进行转写和标注,译文进行句级对齐,工作量势必浩大。“词典编纂是一门关乎社会全体的事业”(秦晓惠,2014: 1),由于收词量大,工作繁复,需要词条收录者进行文本细读。“众源模式”萌发于西方。



从 19 世纪中叶起到现当代,从彼时的《牛津英语词典》到维基百科,均采用“众源”的方式,即众人参与词典编纂。也就是说,“众源”是一种编纂词典的手段,文本细读的巨大工作量以及繁复的收录整理问题得以解决,既可广开词目源流,又能丰富释义路径。

由于语料(词条以及相对应的译文)来自典籍中的文化词汇,内容涵盖中国文史哲,收集相应的有影响力的译著(一部或多部),整理这些词汇的相关译文作为例句,并给出译者和译文出处。这种词条的释义方式就是采用的平行语料库语料的转写方式,是词典释义的一种新尝试。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服务于对外交流的口笔译工作者提供准确权威的译文,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词典编纂者细读后整理的案例。

目前涉及文史哲的中国文化典籍初步定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过的重要基本文献。当然这样定义过于宽泛,词典要涵盖中国文化的主要文献,必须集中在核心价值观和重大的文史文献上,即胡安江(2015:73)所指出的纯文学,强调严肃文学和文学经典。

王宏印(2013:2-3)编著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指出,他的研究所涉及的文化典籍的范畴有三大原则:一、覆盖文史哲三科,兼顾儒释道三教;二、尝试以汉文献为主,兼顾其他民族文献的多元格局;三、以统一的文明史理念确定典籍选材。确立了中国典籍的范畴分析原则后,“中国文化汉英体现平行语料库的建库原则的口笔译词典”的子库“经典译文平行语料库”编纂者把典籍基本定为上古传说,先秦寓言,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元曲,四大古典名著等明清小说,新文化运动前后五四时期的典籍。词典最初收集素材包括《论语》、《道德经》、唐诗宋词,以及四大名著,并在未来的维护中按需扩建,保持开放的状态。这一范畴事实上是从中国文明起源、文史哲和儒释道思想沿革,最后截止到近代中国文化走向的文化活动的全过程。有了目标典籍,相应译著的收集则会相对简单,除了绝版孤本,一般有影响的译著均是可寻的,译文的整理和收集也具有较大的可行性。比如,《红楼梦》采用的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两个译本;《水浒传》存世最有影响力的四个译本分别为赛珍珠、杰克逊、沙博理和登特-杨的译文;《西游记》采用了罗伯特和泰勒的译文;《道德经》译本繁多,译本选择主要考虑至今影响深远或在当今知名的中外译者所译之版本,如理雅各、辜正坤、许渊冲、刘殿爵、亚瑟·威利;《诗经》的译者为理雅各、亚瑟·威利、许渊冲、汪榕培。对于典籍版本,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在这些经典译本中,“天时地利人和”“女红”“朝贺”“安如泰山”等文化词汇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在现当今的对外交流、日常表达中使用频率高,可谓“文化关键词”,它们体现了社会价值,也传播了文化(肖忠华,2012:17),因此在辞典中进行了专门标注。



3. 释义

为了实现前述词典编纂的两大功能,突出三大特点,除了严格把握收录词条的内容,词典编纂者需根据目标建立规范,进行语料的转写和标注,也就是释义工作。胡开宝(2010: 50)认为,口译语料转写完成情况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建库质量的高低,同理,词条的释义好坏也直接决定了编纂质量的高低。

在编纂过程中,编纂者经历了原著经典文化词勾画,对应经典译文例证并列的转写过程,例证并列方法遵循词典编著的要求。Zgusta(1971: 265-267)指出,引例的形式差异表现在引文的长度和出处的精确程度上。该词典的例证原则是既要有足够的语境以清楚地说明词义,又要尽量反映完整的相关语境。常见语料库对齐工具多能顺利地处理句对齐,工作量相对少,在编词典需要目标词条以及其相应的译文对齐;另外,编纂者的细读分析对象都是古典读本,众所周知,其词汇、语法不同于现代汉语,普通对齐软件的对应效果不理想,因此,该词典采用语料库词典学的方法编纂,手工转写、手工对齐,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词条,便于口笔译员进行搜词。

另外,词条的标注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也就是Mona Baker(1993: 240)所说的“Norm”,是描述分析的特定方法,在描述翻译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在这样的规范下,译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会做出有规律性和习惯性的选择,而语料库建库者需要记录这样的规律和习惯,词典编纂也理应如此。转写之后接下来就是进行语料标注。语料标注是语料库研究中实现研究目标的关键步骤(王斌华,2012: 98),当然也是词典编纂的关键步骤。标注就是对语料贴上标签,为此后的检索提供标记,是一种“给口语和(或)书面语料库提供解释的和语言的信息的实践”(黄昌宁,李涓子,2002: 139-140),包括词性标注、句法标注、语义标注、语用标注、韵律标注,等等(刘克强,2015: 19)。标注是为了方便使用,不管是索取译文、学习,还是研究。在词典编纂过程中,编纂者发现,国际常用标注符号和机器标注,都很难满足词典功能的要求,所以使用了大量手工标注:中括号和拼音注明读音,紧接着就是编纂者根据译者翻译经验、专家咨询、考证所给出的即可上手使用的译文;三角箭头表明文化词汇出处的原句;省略号表示例证中关注点以外的词、句;用APA格式标注作者出版时间和页码;斜写表示对应译文;加黑部分表示关注词条以及对应例证译句中的权威译文。词典排序方法按词条拼音字母的顺序排列,便于使用者查找目标词条以及对应译文。

在平行语料库的转写和标注原则指导下的词条释义案例如下:

女红 [nǚ gōng] spinning and sewing; household tasks; weaving, sewing and embroidering ► 却以纺绩女红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曹雪芹,1995: 24) *But overrid-*



ing importance was to be attached to *spinning and sewing*, and even her name “Wan”, which means a kind of silk, was intended to symbolize her dedication to the needle. (Hawkes, 1973: 108) ... to that she might ... while devoting her main attention to waving and *household tasks*. That was why he gave her the name Li Wan and the courtesy name Kung-tsai. (杨宪益, 戴乃迭, 2010: vol.1, 53)

这里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可能有使用者认为,标注文化词出处的原文出版信息没有必要,因为都是古典名著,就像已有的名著平行语料库(如《红楼梦翻译平行语料库》《水浒传翻译大辞典》等)只需给出原文章节即可,而且已有的词典(或类词典)就是这样操作的(刘克强,2014;2015)。事实上,编纂者发现,经典译本的翻译对象是有区别的,标注原文出处以及出版信息对于方便口笔译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水浒传》,赛珍珠译本为七十回本;杰克逊同样为七十回本;九十回之后,只有沙博理和登特-杨在继续翻译。具体说,沙博理翻译了一百回,而且他对九十至一百回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新整合,与汉语原本差别较大;只有登特-杨翻译的版本是按照一百二十回翻译的。另外,这些译者翻译的原本,事实上对现在大陆的研究者学习者和使用者来说,是非常难以找到的,登特-杨父子的最新译本采用的原文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水浒》(1969年、1987年),偶尔也参阅了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水浒全传》(1958年),是《水浒》英译本中独一无二的一百二十回译本。针对这一研究信息,编纂者确定使用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出版发行的《水浒传》作为原文版本,该版本由全国新华书店担任总经销,确保了使用者能较为容易地找到现有翻译的原文版本进行研究或论证。

三、结论

从需求分析而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诉求中,中国文化汉英口笔译词典有着编纂的必要性。该词典研究者借鉴平行语料库的转写和标注的原则,针对口笔译译员和相关研究者的实际需求制定释义规范,采用了众源模式进行词条收录和释义。该词典的建设从口笔译译员和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出发,为口笔译工作者提供权威参考译文,并促进口笔译质量提高,辅助口笔译研究和教学。

参考文献

- [1]崔维霞,王均松.国内学科专业语料库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1):55-58.
- [2]丁树得.浅谈西方翻译语料库研究[J].外国语,2001(5):61-66.



- [3]胡安江,梁燕.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5(6):67-76.
- [4]胡开宝,潘峰,李鑫.基于语料库的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 [5]胡开宝,陶庆.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研究[J].中国翻译,2010(5):49-56.
- [6]黄昌宁,李涓子.语料库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7]柯飞.语料、网路与口笔译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231-232.
- [8]李婧,李德超.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外语,2010(5):100-111.
- [9]李洋.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在中国之嬗变与发展 2007—2014[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109-116.
- [10]廖七一.语料库与翻译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5):380-384.
- [11]刘克强.《水浒传》翻译大辞典[M].北京:中央编译局,2014.
- [12]刘克强.《儒林外史》语词典型翻译——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 [13]王斌华.语料库口译研究——口译产品研究方法的突破[J].中国外语,2012(3):94-100.
- [14]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 [15]文秋芳,王金栓.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 [16]肖忠华.英汉翻译中的汉语译文语料库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 [17]张威.近十年来口译语料库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浙江大学学报,2012(2):193-205.
- [18]Baker, Mona.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y: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A]. In Mona Baker, Gill Francis & Elena Tognini-Bonelli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C]. Philadelphi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233-250.
- [19]Baker, Mona.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 Overview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 *Target*, 1995(2): 223-243.
- [20]Kramasch, Claire. *Language and Cultur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https://www.amazon.cn/%E8%AF%AD%E8%A8%80%E4%B8%8E%E6%96%87%E5%8C%96-Claire-Kramasch/dp/B0011A70E8/javascript:void\(0\)](https://www.amazon.cn/%E8%AF%AD%E8%A8%80%E4%B8%8E%E6%96%87%E5%8C%96-Claire-Kramasch/dp/B0011A70E8/javascript:void(0))
- [21]Samonvar, Larry A., Porter, Richard E. & L. A. Stefani.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22]Sharoff, Serge, Bogdan, Babych & Hartley, Anthony. Irrefragable Answers: Using Comparable Corpora to Retrieve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J].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2009



(43-1):15-25.

[23] Shlesinger, Miriam. Corpus-based Interpreting Studies as an Offshoot of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J].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 Translators' Journal*, 1998 (4):486-493.

[24] Zgusta, Ladislav. *Manual of Lexicography* [M]. The Hague: De Gruyter Mouton, 1971.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委 2015 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简明中国传统古典词汇口笔译词典”(15SKG114)。

[作者简介] 赵奂, 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 口笔译研究及语音学研究。

[电子邮箱] sprinnazhao@163.com

中韩跨文化翻译现象与翻译策略研究

张文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摘 要：翻译是复杂、多层次的活动，涉及多学科知识。翻译的本质是译者在两种文化中，从冲突到磨合再到取舍的心理历程。译者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与另一种文化的载体——作者及其作品的交际中，在心理上必然受到来自作者及作品所体现的文化冲突的影响。跨文化翻译时，要对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心理变量进行明确、系统的比较，以确定行为差异发生的前因和过程，尽量规避错误，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率。本论文分别从词汇文化、句法文化、语篇文化、习俗文化差异方面考察中韩跨文化翻译现象，并提出异化、归化、误译、雅译等翻译策略及具体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中韩跨文化翻译；异化；归化；误译；雅译

A Study o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Zhang Wenl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complex, multi-level activity involving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lator's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two cultures, from conflict to running-in, and finally to trade-off. As the cultural carrier, the translator is psychological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al conflicts from the author and the works in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lear and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conditions to determine the antecedents and processes of behavioral differences, try to avoid mistak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phenomen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from the aspects of lexical culture, syntactic culture, discourse culture and custom culture, and propos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specific translation methods such as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mistranslation and elegant translation.

Key Words: Chinese-Korean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mistranslation; elegant translation



一、绪论

翻译活动是复杂、多层次的活动,涉及多学科知识。而担任这一复杂活动的主体是译者,译者在翻译中必然有自己的心理活动,其中包括语言认知心理活动、审美心理活动、跨文化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都会对翻译过程和结果造成影响。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Nida 1993: 152)。王克非(1997, 1: 12)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这是因为“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的特性,因此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这种沟通离不开翻译,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可见,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王克非, 1997)。翻译要将本土文化和外国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真正交流。在翻译过程中,文化之间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有些不可译的情况很难用译语完整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意义。

根据英国学者泰勒的定义,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Keesing 1958: 18)。翻译的本质是译者在两种文化中,从冲突到磨合再到取舍的心理历程。译者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与另一种文化的载体——作者及其作品的交际中,在心理上必然受到来自作者及作品所体现的文化冲突的影响。译者作为本土文化的携载者,对原文的解读往往基于自身的文化语境,在翻译表达的过程中也受到自身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跨文化翻译时,译者要对不同文化条件下的心理变量进行明确、系统的比较,以确定行为差异发生的前因和过程(Eckensberger, 1972: 100),尽量规避错误,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率。中韩两国对于跨文化翻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李贞子在《文化差异与翻译相对等值》中提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与译出语与译入语所属的两种不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徐春喜在《跨文化交际翻译视角下汉语歇后语的韩译》中提出要根据中韩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的不同,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正确合理地翻译歇后语。罗文萍在《基于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中韩互译误区探析》中提出翻译需发挥文化转换与传递的功能。金惠林对文化用语的韩中翻译特征进行了研究。崔银晶考查了韩中文学翻译时文化要素的翻译问题。这些研究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进行中韩跨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基于此,本论文分别从词汇文化、句法文化、语篇文化、习俗文化差异方面考察中韩跨文化翻译现象,并提出异化、归化、误译、雅译等翻译策略及具体的翻译方法。



二、中韩跨文化翻译

1. 中韩语言词汇文化差异下的翻译

(1) 外来语的翻译

韩国较早接受西方文化，中国更重视对传统语言文化的保留和继承。表现在语言方面，韩国语的外来语非常多。近几年韩国语中的外来语可谓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斥着外来语。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韩国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另外韩国的音节结构比较多样，利于标记外来语。例如：키 (key, 钥匙), 브랜드 (brand, 品牌), 이벤트 (event, 活动) 等。

汉语中的外来语较少。在必须使用外来语时，多采用半音译半意译或意译法，使外来语“入乡随俗”。汉语中的外来语较易识别。例如：蜜月 (honey moon)、咖啡 (coffee)、俱乐部 (club)、托福 (TOEFL) 等。翻译时应注意两国对外来语的使用程度不同，选择适当的词汇。

(2) 特定词汇的翻译

首先，存在韩语中有而汉语中没有的词汇，例如：하숙 (下宿)、입학금 (入学金)、사은회 (谢恩会)、전세집 (全租房) 等。同时，存在汉语中有而韩语中没有的词汇，例如：红头文件、辅导员、校团委、批次录取、十三五规划等。这类词在交流的时候，需要追加一些对背景知识的说明。

其次，对比中韩两国语言，有些词汇虽然具有类似的符号形式，但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例如：학원 (学院)，在韩语中是课外辅导班、补习班；而在汉语中指的是单科大学。강사 (讲师)，在韩语中指受到学校或辅导班的邀请而上课的人，分为时间讲师和专任讲师；而在汉语中则是大学中低于副教授的专业技术职务的名称。

再次，两种语言表达的细分程度不同。韩语比汉语更注重形象表达和感觉的表达，因此拟声拟态词更加丰富 (지수용, 2000: 169-187)。例如，在汉语中修饰“转” (돌다) 的词，只有“团团”“滴溜溜”等几个；而在韩语中有“빙”“빙빙”“빙그르”“빙그르르”“뽕”“뽕뽕”“뽕”“뽕뽕”“핑”“핑핑”“팡”“팡팡”“뽕글뽕글”“핑글핑글”“팡글팡글”等。在翻译这些词的时候，需要说明类似词汇的细微差别。

最后还存在很多意思一样，而符号形式不同的单词。例如：대대손손 (世代代)、전 대미문 (前所未闻)、무미건조 (枯燥无味)。翻译时要特别注意。

(3) 文化词汇的翻译

由于中韩两国人民生活经历、知识文化和审美习惯的不同，意象间的相似性也就不同，体现在语言上就不完全相同，这就为跨语言的转换带来很大的障碍。这种意象间的相似性可能在原文中存在，但在译文中比较勉强，翻译时只能做出适当的改变。

例如《兰亭集序》第一段中“虽无丝竹管弦之盛”，此句中以“丝竹管弦”借指乐



队和音乐,但在韩国“丝竹管弦”并没有这样的指代意义,所以翻译时采用意译的方法,翻译成“비록 성대한 음악의 연주는 없지만”。(韩璐,2017,14:12-13)

有些文化词汇的翻译,由于对应多个概念模糊的词汇,需要结合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在准确理解和分析原语文本的基础上,在目的语词汇中选择最适当的词汇。

例如《红楼梦》中常出现弹琴的情节。中国的琴是七弦琴;而在韩国,一般男性演奏者喜欢“거문고(玄琴)”,有六弦,音调比较钝重;女性演奏者喜欢“가야금(伽倻琴)”,有十二弦,音调比较轻快。因为《红楼梦》中的琴声,具有属于女性的韵味,所以使用“가야금(伽倻琴)”更合适。(崔溶澈,2008:131-147)

还有些文化词汇,由于目标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如果直译会导致译文读者理解困难,翻译时为了准确传达原语文本的语义,要结合文化背景进行阐释性翻译。

例如《红楼梦》中“女先儿”一词的翻译。女先儿又称女先生,是占卜或讲故事的民间艺人,大半是盲人,因此翻译成“讲故事的女盲人(맹인 이야기꾼인 여선아)”。(崔溶澈,2008:131-147)

2. 中韩语言句法文化差异下的翻译

(1) 语法关系

汉语主要靠词序和词来表示语法关系,词序要求严格。而韩语是靠助词、词尾等来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词序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韩语的助词是指附着在词、短语和句子后面,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语素。韩语的助词根据语法功能可以分为格助词和添意助词两类。格助词包括主格助词(-가/이,-께서)、宾格助词(-를/을)、属格助词(-의)、副词格助词(-에,-에게/한테,-에서,-로/으로,-보다,-와/과/하고)、呼格助词(-아/야,-여/이여)。添意助词包括表示强调的添意助词(-는,-야/이야)、表示包含的添意助词(-도)、表示起止的添意助词(-부터,-까지)、表示限制的添意助词(-만)、表示包罗的添意助词(-나마)、表示选择的添意助词(-나/이나,-든지/이든지)等。

例如:

누나가 집에 있다.

姐姐在家。

선생님께서 교실에서 강의하십니다.

老师在教室讲课。

나는 한국 드라마를 좋아합니다.

我喜欢看韩国电视剧。

이 책은 나의 책이다.



这本书是我的书。

내일 누구하고 갈 거예요?

明天你要和谁一起去?

철수야, 어서 와.

哲洙, 快来。

거기에는 물건도 많고 값도 싸다.

那里东西多, 还便宜。

8시부터 12시까지 수업을 한다.

8点到12点上课。

韩语的词尾分为连接词尾和终结词尾两大类。连接词尾是用来连接词组或分句, 表示所连接成分之间关系的词尾。它在功能上不能终结句子, 只起着连接谓语与谓语(或词组)、分句和分句的作用, 在句子里主要构成接续谓语。如: -고、-며、-거나、-지만、-는데、-니까、-면/으면、-려고/으려고、-더라도等。

例如:

가을 하늘은 높고 푸르다.

秋天的天空又高又蓝。

시간이 있으면 놀러 오세요.

有时间的话来玩吧。

실패하더라도 포기하지 않을 거야.

即使失败也不会放弃的。

终结词尾表示句子的结束, 在韩语中必须加上终结词尾才是一个句子。终结词尾分为陈述句终结词尾、疑问句终结词尾、命令句终结词尾、共动句终结词尾、感叹句终结词尾。

例如:

지금 비가 옵니다.

现在下雨。

주말에 어디에 가요?

周末去哪儿?

책을 펴세요.



请翻开书。

우리 같이 가자.

我们一起走吧。

오늘 날씨가 참 춥구나.

今天天气真冷啊!

韩语有丰富的助词和词尾体系,因此翻译时,要注意语句中助词和词尾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和语义、语气,避免错译、漏译。

(2) 句子结构

汉语和韩语的相同点是,定语在前,修饰后面的中心语;状语在前,修饰后面的谓语。但两者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孤立语,韩语属于粘着语,主要靠助词和词尾来表达语法意义。另外,汉语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动词出现得较早,行动中有“主动性”与“确定性”。而韩国语的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反映了韩国人的相对犹豫兼灵活性。汉语表达的重点在前面,而韩语句子最主要的成分——谓语放在句子的最后。汉韩两种语言由于上述明显区别,翻译时两种语言的句子成分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汉语注重语序,韩语注重后面的附加成分。

例如:

아이들이 공원에서 놀고 있어요.

孩子们在公园玩。

이 옷은 한국에서 산 것이다.

这件衣服是在韩国买的。

나는 눈이 오는 겨울을 좋아해요.

我喜欢下雪的冬天。

이것은 나의 컴퓨터가 아니다.

这不是我的电脑。

韩语的语序较汉语灵活,谓语置于句末,因此韩语句子的重点在句末,翻译时要注意汉韩两种语言语序的不同,减少句法错误,提高翻译效率。

3. 中韩语言语篇文化差异下的翻译

语篇是指由一系列与某一话题/主题相关的话段/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语言的本质是交际,任何交际都有意图,因此,语篇意图就是语篇所承载的主题。翻译表达的目的在于译者把原语语篇意图用译语表现出来,翻译表达具有双重意图,即作者的语



篇意图和译者的语篇意图。语篇意图的翻译也就包括原语语篇意图再现和译者语篇意图设计。

(1) 语篇信息意图的再现

信息意图是指提供信息的意图。对译者而言,必须通过推理获取作者明示出来的信息,并用明示的方式向译语读者传递作者的信息,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前把握作者的信息意图,对干扰意图加以变通处理。

例如: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现在请大家举杯,为了两个公司合作成功、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大家的健康,干杯!

译者翻译这段话时,可以省略“两个公司”“我们的”“大家的”,译成“벗이 먼 곳에서 찾아오면 또한 즐겁지 아니한가? 협력 성공과 우정, 건강을 위하여!”更能清晰传达原语语篇意图。

再如:

小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缺乏服务意识,以为产品卖出去了任务就完成了。

李经理:我同意小张的看法。

샤오장: 저는 가장 중요한 문제점은 우리는 서비스 의식이 부족해서 제품이 다 팔리면 임무가 완수된다는 생각입니다.

이경리: 저는 동의합니다.

翻译时,省略“小张的看法”,直接译成“저는 동의합니다.”表达的意图更明确,且符合韩语的表达习惯。

(2) 意图的不可译性

语篇翻译时并不是所有语篇作者的意图都可以在翻译时再现出来。特别是诗人,他们往往会通过对诗行的字词、字母进行有意而别出心裁的排列组合或使用其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这种基于本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下的语词设置,会导致翻译无法进行。

例如:

竹枝词

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죽지사

유우석

버드나무는 푸르고 강물은 잔잔한데,
님이 강 위에서 노래 부르는 소리가 들려오네.

동쪽에는 해가 뜨고 서쪽에는 비가 내리니,

곳은 날씨인가 아니면 맑은 날씨라고 해야 하나.^① (只翻译了字面意思，没有译出原文隐含的意思)

以上这首诗中“道是无晴却有晴”是无法翻译的。当原语意图不可翻译，却还必须翻译时，译者只能选择“基于译者意图”的计划来翻译。

(3) 译者语篇意图设计

翻译的本质是译者在两种文化中从冲突到磨合再到取舍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译者意图实现的过程。译者首先站在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对所翻译的语篇内容的可接受程度、欲生成的语篇体裁等做出预测，并选择相应的、灵活的、适当的翻译策略。

例如：

닫는 말에 채질한다고 경상도까지 하루에 갈 것인가?

(即使快马加鞭，一天内也到不了庆尚道.)

不能强求别人做很难办到的事情。

갈수록 태산

越来越困难

上述两例，如果直译成“即使快马加鞭，一天内也到不了庆尚道”“越来越泰山”，读者会完全无法理解原语的意思，因此译者站在使读者能够理解的角度，灵活翻译成“不能强求别人做很难办到的事情”和“越来越困难”。

综上，语篇翻译表达受意图控制。意图包括作者意图和译者意图。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意图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作者意图是否可译取决于两种因素：原语语篇意图本身的可译性程度和译者对原语语篇意图的把握程度。若程度都低，译者只能选择基于译者意图的编码计划。



语篇翻译还要考虑到篇章的连贯建构机制，如要建立足够的因果解释或顺承关系等，通过建立正确的指代关系消除歧义，即翻译过程中要注意语篇的连贯性，不能根据主观判断随便乱译、胡译。

例如：

“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红楼梦》第七回

这句出自《红楼梦》第七回，是焦大骂主人时乱讲的话，这句话本是错的，应该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作者这样写是为了表示焦大喝醉的程度。所以翻译时，需要根据篇章前后意思，还是翻译成“붉은 칼날 들어 갔다, 하얀 칼날 나오는 거야”，而不是翻译成“칼부림 날 줄 알아!”。(崔溶澈，2008：131-147)

4. 中韩习俗文化差异下的翻译

习俗文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综合反映和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基本精神的体现。中韩习俗文化是中韩两种文化的反映，并且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本论文主要结合服饰、饮食、敬语、俗语的使用等方面来考察中韩习俗文化差异下的翻译。

(1) 服饰习俗

韩国的传统服装是韩服（한복），近代被洋服（양복）替代。如今韩国民众只有在节日和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穿韩服。韩国人喜欢白色，被称为白衣民族。在韩国，白色象征着纯洁、洁白、美丽。例如：“백의천사”（白衣天使）、“백옥무하”（白玉无瑕）等。中国的传统服装是旗袍（치파오），现在也被西装替代。中国人喜欢红色，在中国，红色象征光明、权利、成功、热情等。韩国人也认为红色是喜庆的象征，但在韩国语中，红色还象征着革命，例如：“붉은 정치”（红色政权）、“붉은 정신”（赤诚的精神）等，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翻译时需要注意。

(2) 饮食习俗

饮食方面，在韩国，吃饭时，晚辈不能先动餐具；喝酒时，晚辈要转过身，背对着长辈；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抽烟，过年时晚辈仍会对家里的长辈行大礼。韩国人很喜欢吃泡菜，所以包含泡菜的俗语很多。例如“떡 줄 사람은 생각도 않는데 김치국부터 마신다”（别人还没打算给你做吃的，你就先开始喝泡菜汤了），有自作多情的意思。再如，包含“面条”的俗语，“언제 국수를 먹을 거예요?”表示“你什么时候结婚?”包含“糕”的俗语，“누워 서 떡 먹기”表示“易如反掌”。



(3) 敬语的使用

韩国人重序列,爱自尊,维护长辈权威;中国人讲平等,重面子,爱护朋友关系。中国和韩国都有尊老的传统,但韩国更加严格。韩国是敬语文化发达的国家,长幼、师生、夫妻间都会严格使用敬语。在韩国对老师或学长也同样需要使用敬语。关于老师的俗语反映了对老师的尊敬。例如“스승의 그림자는 밟지 않는다”,意思是“连老师的影子也不能踩”。在中国,这样的要求不是很严格,师生、学长与学弟学妹之间比较平等。汉语没有专门的敬语法,主要用带有谦虚尊敬意义的词来表示尊敬,如:“您”“阁下”等。韩语有完整、复杂、严格的敬语体系,可以通过词汇和语法两种方式来表示尊敬。词汇方式,例如:자다-주무시다(睡觉),보다-봬다(看)等;语法方式,可以通过加先语末词尾“-시-”和终结词尾来表示尊敬。

例如:

어디 가십니까?

您去哪儿?

점심은 뭘 드시겠습니까?

午饭吃点什么?

앞에 사거리에서 좌회전 하십시오.

请在前面路口左转。

(4) 俗语的使用

俗语是一个民族从生活中获取的教训与经验,一般文字都简练而形象,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两国俗语都具有通俗性、口语性、稳定性和描绘性的特点,区别是韩国俗语多以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人或物为素材,素材都很具体、形象,主要包括动物、饮食名称等,其中动物名称所占比例较高,中国俗语则没有这一特点。

韩语中包含动物名称的俗语,例如:

범 모르는 하룻강아지

初生牛犊不怕虎

개구리 올챙이 적 생각 못한다

忘乎所以

고양이 목에 방울 달기

纸上谈兵



평 대신 닭

权且顶替

包含食物名称的俗语，例如：

그림의 떡

画中之饼

떡 본 김에 제사를 지낸다

趁有机会办好某件事情

翻译俗语时，要正确理解俗语的意义，灵活运用异化、归化等策略找出既符合原语意思，又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最相近的表达方式。

三、中韩跨文化翻译策略

中韩跨文化翻译时，可采取异化、归化、误译、雅译等翻译策略。异化、归化是针对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转化而言，异化以传达原语文化为目标，归化以丰富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读者架起跨文化沟通的桥梁。误译、雅译是受控于译者的文化心理因素而采取的灵活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中，可能同时使用多个翻译策略和方法。

1. 异化

韦努蒂 (Venuti, 1995: 20) 认为异化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即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破除目的语的语言规范来保留原语异域化特色的翻译方式。

异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

(1) 零翻译

零翻译，指不进行任何翻译操作，直接把原语的某些成分引入到目的语中。科技文献中涉及型号、牌号、商标名称等，不必译出。

例如：

LG

Whoo

Lotte



(2) 音译

音译,指把一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用另一种语言中与它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符号表示出来的方法。

例如:

퐁덩 扑通

똑똑 咚咚

쿨쿨 呼呼

(3) 直译

直译是指在忠实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努力传达原文的形象和风格,使译文的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尽量与原文一致,也就是保留原文修辞效果和民族特色的翻译方法。

例如:

井水不犯河水

우물물과 냇물처럼 전혀 상관없다.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요괴를 보고도 요괴로 인정해주지 않으면 그 요괴는 스스로 맥을 못 추는 법이다.

2. 归化

韦努蒂(Venuti, 1995: 20)认为归化是遵守目的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即采用流畅的行文风格来为目的语读者减少原语中的异域化色彩的翻译方式。

归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

(1) 意译

意译是指通过对原文深层意蕴的理解将原文的表层结构转化为译文的表层结构,即打破原文的语言形式,用译文的习惯表达形式把原文的意蕴再现出来。但形式的转换和再创造必须服从于原文信息的传达,不可偏离原文的内容与风格而随意发挥。

例如:

老虎头上捉虱子

잠자는 호랑이의 코털을 건드린다.

安邦定国



나라를 반석 위에 올려놓다

(2) 套译

套译指在翻译外国词汇时，既不音译，也不试用新词意译，而采取折中方法，采用本国语言文字中已有的词汇套用之。

例如：

아내가 귀여우면 처갓집 말뚝 보고도 절한다.

爱屋及乌

소 잃고 외양간 고친다.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3) 仿译

仿译指译者不拘泥于原文的意义细节，更不拘泥于其词汇和句法结构，把原文作为一个参照模式，译出关键信息，或译出比原文更多的信息。诗歌的翻译多为仿译。

例如：

《兰亭集序》“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

“契”是我国古代用来表示信用的一件物品。仿照这个意思，韩语中也存在类似的说法“부질”，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成“매번 옛 사람이 감회를 일으킨 바를 읽을 때마다 내 마음도 마치 부질을 맞춘 듯”。

(4) 改译

改译指对原语的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某种改变或变形的变译方法。

例如：

저도 개인적으로 중국 성현들의 책과 글을 많이 읽었고 중국 노래도 좋아하는데 이렇게 문화를 통해 공감대를 형성하는 것이야말로 진정 마음으로 가까워지고 친구가 되는 것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我个人也读过中国圣贤之士所写的书和文章，也喜爱中国歌曲，如此以文化为共感纽带，才算是通过真正的心灵交流越来越亲密而成为朋友。

중용의 일길 군자의 도는 멀리 가고자 하면 가까이에서부터 시작해야 하고 높이 오르고자 하면 낮은 곳에서부터 시작해야 한다고 했습니다.

中庸之道教诲：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上述两例,第一句是把长句的形式改成短句形式,形成的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例句2将释义的文章改成文言文形式,更符合《中庸》名句的特点。

3. 误译

这里的“误译”研究的是“有意识误译”,指受控于译者的文化心理因素,如译者的本土文化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态度),而有意为之的误译。

例如:

金裕贞的小说《동백꽃》,“동백꽃”指的是生姜树花,翻译成中文是三桠乌药花,名字太生僻,不适合做小说题目,所以翻译成《山茶花》或《生姜花》。

4. 雅译

雅译也受控于译者的文化心理,原文中不被本土文化意识形态所接受的内容,如政治立场、忌讳语等往往在译文中或被删节或被委婉化。

例如:

老爷选定的宝姑娘为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红楼梦》第九十八回)

대감님께서 보차 아가씨는 인품이 넉넉하고 훌륭한 반면, 대옥 아가씨는 성품이 괴팍해서 오래 살지 못할까 봐 그렇게 정하신 거예요. (崔溶澈、高旼喜译)

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厉害,璉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저쪽 작은 대의 큰 대감님은 그렇게 엄한 분이데도 가련 숙부는 하인 여편네랑 그렇게 그런 사이란 말이야. (崔溶澈、高旼喜译)

四、结论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翻译这座桥梁在跨文化交往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知名翻译学者许钧(2017, 3: 3)如是说:翻译探索理应注意特定国家的发展历程,一部翻译史即属于一部民族文化交流史^①。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翻译之难原因之一即是语言展现文化,承载很多文化内涵,且要受到文化的限制。因此从事翻译时,除了要具备双语能力,还要兼具双文化知识。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说,双文化能力甚至要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可见,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不断培养和增强文化意识,熟悉并了解文化的异同,从而建立起文化翻译观。



中韩翻译也不例外,研究中韩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从文化角度观察语言,提高译者的文化意识,有利于提高译文质量。本文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分别从词汇文化、句法文化、语篇文化、习俗文化差异方面考察中韩跨文化翻译现象,并提出异化、归化、误译、雅译等翻译策略及具体的翻译方法,以期中韩翻译学习者和研究者从中有借鉴。

跨文化翻译研究是一项涉及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性综合学科,内容纷繁复杂,相关研究不是一两篇论文就可以总结和概括,今后仍需进行更系统科学的研究。

注释

① <http://search.naver.com/>

参考文献

- [1] 崔溶澈.《红楼梦》的文化翻译——以韩国语译文为主[J].红楼梦学刊,2008(5):131-147.
- [2]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 [3] 韩璐.中国经典名著《兰亭集序》的韩译研究[J].汉字文化,2017(14):12-13.
- [4] 黄忠廉.翻译方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5] 秦建华.翻译研究的多维视角[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7.
- [6] 司显柱.翻译研究关键词[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8.
- [7] 王克非.论翻译研究之分类[J].中国翻译,1997(1):12.
- [8]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 [9] 许钧.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J].当代外语研究,2017(3):3.
- [10] 颜林海.翻译认知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11] 杨芙蓉.中西语言文化差异下的翻译探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
- [12] 张慧宇.翻译对比及跨文化启示[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
- [13] Eckensberger, Lutz H.. The necessity of a theory for applied cross-cultural research[A]. In L. J. Cronbach & P. J. D. Drenth (eds.) *Mental tests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M]. The Hague: Mouton, 1972.
- [14] Keesing, Felix M.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Science of Custom* [M].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15] Nida, Eugen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 [16]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7] 임경순. 한국문화 이해론 서설[J]. 선청어문, 2008(36):623-655.

[18] 지수용. 중국인을 위한 문화 도입식 한국어 교수법 연구[J]. 한국어 교육, 2000, 11(2): 169-187.

[19] 최용철, 고민희. 《홍루몽》 옮김[M]. 파주: 나남, 2009.

[20] 태평무. 중한 언어 문화의 차이로부터 본 양국 간의 의사소통의 특징 [J]. 한국어언어 문화학, 2006, 3(1): 235-247.

[作者简介] 张文丽, 女,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 大连外国语大学韩国语讲师。研究方向: 韩国语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

[电子邮箱] zhangwenli816@163.com

翻译教学研究

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法

陈 卉

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思辨项目教学法现被用于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课程，以提高研究生的翻译能力，并最终提高他们分析、推理和评价的思辨核心技能。思辨项目教学法以融合英汉语言比较知识及学生专业相关文本的翻译项目为教学内容；通过以专业为导向的小组合作教学模式完成翻译项目；并以基于翻译项目的过程评价构成学术英语翻译课程的形成性评价体系。经教学实践证明，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法效果显著。

关键词：研究生培养；学术英语翻译课程；思辨项目教学法

Project-Based Teaching on Critical Thinking in Academic Translation Course for Graduates

Chen 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Abstract: For purpose of improving graduate students' translation abi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analysis, inference and assessment, project-based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method is used in Translation Course for Academic Purpose for graduates.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based on translation project including comparative knowledg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s well as source texts related to students' majors, which is finished through major-oriented group cooperative teaching method and assessed by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The teaching method is proved effective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cultiva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Translation Course for Academic Purpose; project-based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平均增幅达到 6%，博士研究生增幅 3% 左右。目前我国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已达 40 多万人，其中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占绝大多数。由于大量扩招，研究生英语入门条件降低了；但又由于学业、就业等方面的压力，研究生入学后对英语的工具性要求却更高了，尤其体现在对英汉语之间



的转换上。为此,不少高校开设了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课程。根据杨正军、姜秋霞(2017: 39-40)《我国翻译课程的知识图谱分析(2000—2016)》一文,我国的翻译教学研究经历了沉寂期(2000—2005年)、探索期(2006—2010年)和发展期(2011—2016年)三个阶段。研究主题从沉寂期的“翻译专业”和“翻译课程”到探索期的“课程设置”“翻译教学”和“翻译硕士”,再到发展期的“翻译能力”“教材”“计算机辅助翻译”以及“国家标准”等,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态势。但是以上研究范围几乎没有涉及日益扩大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翻译课程教学,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学术英语翻译课程一般在非英语专业研究生一年级开设,目前该课程在许多高校存在以下的主客观现状:从客观来看,在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课程中,学术英语翻译为选修课程,研究生们可以平行选择的课程可能还会有英语写作、批判性思维、口语、跨文化交际等。但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学术英语翻译和写作是最有用的课程。目前研究生英语写作教材比较多,但是还没有专门的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教材,教学内容可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需求进行选择。对于工科类院校来说,缺乏人文氛围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在当今倡导全人教育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突出。工科学生在研究生期间只学习一学年的英文课,在其他人文类课程很少的情况下,在人文关怀和思辨能力培养方面,英语教师承担了重要角色。主观方面,研究生们对英译汉及汉译英技能都有很高的需求。这是因为专业技术资料多用英文撰写,对这些资料的介绍和引进需要英译汉技能;另外,国际期刊投稿也对汉译英技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研究生们对翻译技能的主观需求是强烈的,但非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们在本科阶段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翻译理念与技巧培训,加上理工科思维方式,思辨能力相对较弱,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过度直译,甚至死译。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术英语翻译课怎么上,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研究生的学术翻译能力以及思辨创新能力,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思辨项目教学法简介

思辨项目教学法是将思辨能力培养融入项目教学法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概念,笔者有必要先介绍项目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是一种积极的、促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它在各个学科领域中都应用广泛。在翻译教学领域,国内外学者如 Kiraly (2005)、Deng (2018)、Madkour (2016)、Maruenda - Bataller & Santaemilia - Ruiz (2016)、Mitchell - Schuitevoerder (2014)、陈水平(2013)、李彦及刘晓康(2015)、马旭燕(2017)等,对项目教学进行了实践研究,讨论了项目教学模式,项目教学与课程设置、能力培养及机器翻译。



也有学者,如洪坚(2016)等,提出在项目教学过程中结合思辨能力培养进行研究。对于实践性极强的学术英语翻译课程来说,项目教学法有利于在研究生的专业语境中培养他们的双语转换能力,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促进研究生学业的后续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不少专家提出把培养思辨能力和全人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黄源深,1998:1,19;张保权,2016:83-85;文旭,滕超,2018:38-40)。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以接受性学习为主,主要接受教师所授知识,主动创新及研究的意识较为薄弱,即使在研究生阶段这一问题也十分突出。因此,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及创新研究能力是新时期高校教学模式改革的方向。

鉴于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课程的主客观现状,本研究拟将思辨能力培养与项目教学法相结合,构成思辨项目教学法并细化整个教学过程。通过翻译项目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贯穿分析、推理和评价思辨等核心技能的培养,融合研究生们所缺乏但又必须掌握的内容,采用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以及合理可行的评价体系,从而培养学生的英汉双语转换能力和思辨能力。下文将从思辨项目教学内容、模式及评估方式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内容

思辨项目教学内容主要为融合英汉语言比较差异及学生专业相关文本的翻译项目。英汉语比较知识模块从语言比较到人文素养再到思维差异,由表及里,层层推进,有利于研究生透彻理解。正如杨正军、姜秋霞(2017:44)所述:“有效的翻译课程研究应注重课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合,在关注翻译课程传输语言知识信息实效性的同时,兼顾翻译课程承载的多元文化传播功能以及学习者个体的发展需求。”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将翻译基本技巧、写作技巧与翻译过程中的篇章整体概念融入进去。

1. 英汉语比较知识

教学过程中增加英汉语比较知识,从英汉两种语言比较扩展到文化内涵及思维方式差异的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生通过英汉语言对比了解中西方民族思维认知模式与哲学观的差异,由表及里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将汉语中典型的无主句翻译成英语时,必须加上主语或变为被动句,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合语法。从汉语无主句英译着手,讲解西方分析性的思维方式,即主观反映客观世界,英语句子中必须有主语。而中国是天人合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所以汉语中没有主语也能接受。另外,从哲学角度来看,颜色是属于第二性质的,本身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因此,英汉两种语言对不同颜色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第一性质概念如空间、硬度等,中西方在



认知上是一致的,也就不存在语言翻译过程中的偏差。

英汉语比较知识同时也包括了两种语言在写作上的谋篇布局。总体来说,英语的写作布局更接近学术文体。因此在汉译英的教学过程中要从篇章的整体对等角度来进行,这样就潜移默化地将英语写作知识融入到翻译教学过程中,有利于同时提高研究生的翻译和写作水平。下文就是典型的案例:

为了更广泛地对获奖单位的事迹进行宣传,扩大企业及其产品、服务的知名度和影响,使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企业管理干部和广大职工了解我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的情况,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把国家质量管理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决定编印这本画册。

The decision by the China Quality Control Association to compile and print this album was made out of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The need to give wide publicity to the exploits of the awardees; The desirability to enhance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ize-winning enterprises and the fame of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the necessity to acquaint the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of various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sections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of distinguished quality management in advanced enterprises.

All these were expected to boost the drive for creating a still greater number of advanced units through emul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gress among them.

(方梦之, 范武邱, 2015: 62-63)

本段英译文在布局上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文的一个段落(一个长句)被分拆成两段。译者将核心词“决定”由句尾调到译文句首,并用“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带出三个主要原因,分项首字母大写,在视角上更吸引读者,条理清晰,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充分展示了画册原文文本的宣传目的。接着译者把“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把国家质量管理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段信息抽出,另外分段译出,体现出语义的层次性。翻译初学者一定不会接受这样的译文,但通过英汉语比较知识及英语写作特点的培训后,研究生们便可以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处理方法,并将其用于今后的翻译和写作实践中。

2. 专业相关翻译文本

在对增减、转换、语序调整、正反译等翻译基本技巧进行系统讲解时,教师为了更好地体现英语对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工具性作用,需将研究生本专业文本与学术英语翻译课程相结合,进行翻译实践与展示。下例选自《机器人手册》一书,属于学生



专业类书籍。

Robots! Robots on Mars and in oceans, in hospitals and homes, in factories and schools;
robots fighting fires, making goods and products, saving time and lives ...

译文 (1)

机器人! 机器人在火星上, 机器人在海洋里, 机器人在医院、家中、工厂、学校……

译文 (2)

看, 机器人上火星, 下海洋, 到医院, 进家中, 驻工厂, 在学校……

本段英语原文省略了动词, 前半句保留了介词“on”和“in”, 后半句保留三个现在分词。译文(1)将“in”直译为“在”; 译文(2)却将它翻译成了五个不同的动词, 另外还增译了“看”。使得整个译文生动、形象, 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学生最初可能会认为译文(1)更忠实原文, 因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英语的介词“on”和“in”要翻译成汉语的不同动词“上”“下”“到”“进”“驻”等。但通过英汉语比较知识的学习后, 了解到英语属于静态的语言, 而汉语却更倾向于动态, 这时他们就会选择译文(2)了。另外, 系统的翻译技巧讲解也会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通过转换(conversion)的翻译技巧训练, 学生掌握了词汇的转换技巧, 结合动静态的不同语言特征, 将英语的介词转换为汉语的动词。第一个独立句“Robots!”被译为汉语的“看,”而不是直译为“机器人!”, 也符合汉语的整体篇章结构特点, “看”与后面的一系列动词形成一幅动态的画面,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学生通过这一段的翻译, 深刻领会如何辩证地看待翻译的“忠实”问题, 还可了解到科技文本中使用一定修辞手法的可接受性。教师以专业文本作为翻译实例让研究生的体会更深切, 课程的实用价值也会展示得更充分。

三、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模式

思辨项目教学模式改变以前翻译教学过程中老师讲解, 学生练习, 教师再评讲的传统模式。将全班同学按相同或相近专业分为4~6人小组, 在一个学期内, 要求每个小组至少完成3次翻译项目实践, 这样的小组合作不仅有利于提高积极性和参与度, 也有利于学伴之间更深入地交流。在以专业为导向的小组合作基础上, 通过独立思考、小组讨论以及双向交流三大模块完成翻译项目, 在每个阶段培养不同的思辨核心技能。

1. 独立思考模块

小组成员的翻译文本均为本专业相关的最新前沿英文资料或研究生们自己拟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学习英汉语比较知识及系统的翻译技巧之后, 每位组员可



选择适合本组的真实英汉语料在课下进行英汉或汉英独立翻译,并在翻译之后撰写反思日志。反思日志内容包括在独立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翻译技巧,或在遇到困难时自己是如何解决的,等等。该过程构成独立思考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

2. 小组合作模块

独立翻译任务完成后,在课堂上,小组成员之间就译文进行自评、互评、讨论、比较、分析,最后每个小组形成一份最佳译文,上交并撰写翻译项目报告。项目报告内容包括小组讨论的焦点,自己的初译稿与小组最后上交的译文之间的差异分析等。这一过程构成小组合作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评价能力。

3. 双向交流模块

老师对小组上交的译文及翻译报告评阅后反馈给学生,构成双向交流模块,启发学生反思整个过程,总结学习的收获并进行自我评价。这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分析评价能力。

翻译项目及形成性评价体系是整个思辨教学模式的支撑平台和体系,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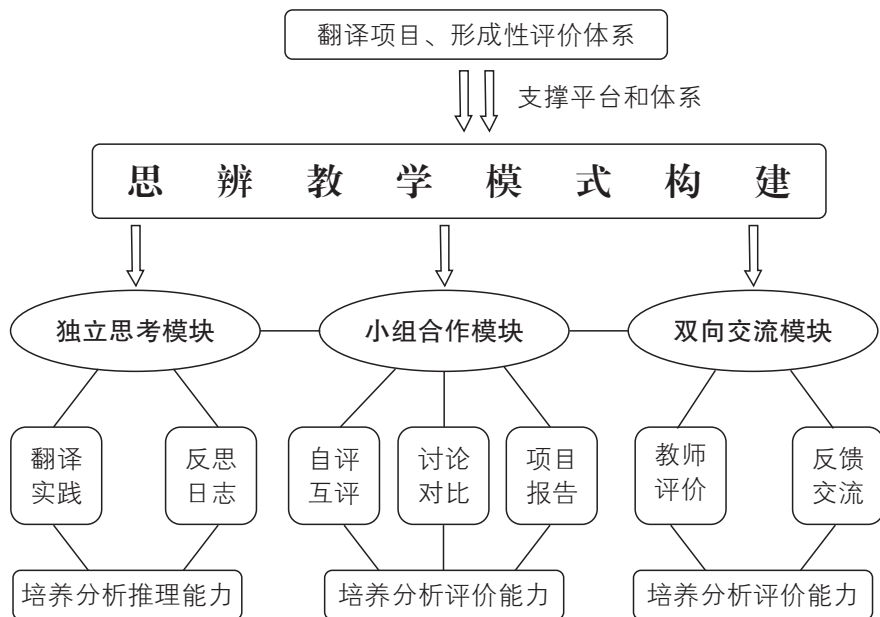


图 1 双向交流模块

四、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评估方式

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评估方式体现为基于翻译项目的过程评价,并激励课外实践与创新。

1. 过程评价

教师对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采用形成性评价体系,即期末考试只占

总评成绩的 40%，翻译项目与作业及表现占 60%。翻译项目过程中，每位小组成员都建立自己的形成性评价档案袋，其内容包括翻译项目练习资料初稿、修改稿及定稿，反思、讨论及对比分析日志。学生本人、学伴及教师对以上资料进行评估，该评估占总评成绩的 40%，其中自我评价占 10%，学伴评价占 20%（小组成员评价及小组外学伴评价各占 10%），教师评价占 10%（详见图 2）。这样的过程评价更公平，能促使学生全身心投入翻译项目实践，因此收获更大。

2. 激励策略

评价体系通过奖励 2~5 分的方式（如图 2 所示），鼓励研究生参加英语相关课外活动。这些课外英语活动包括全国性的大学生英语竞赛、校级研究生英语风采大赛，还有本专业与英语相关的学术活动、科研项目及论文撰写等。这样的激励策略丰富了研究生的校园生活，促进了英语水平的全面提高，同时也有利于思辨创新能力的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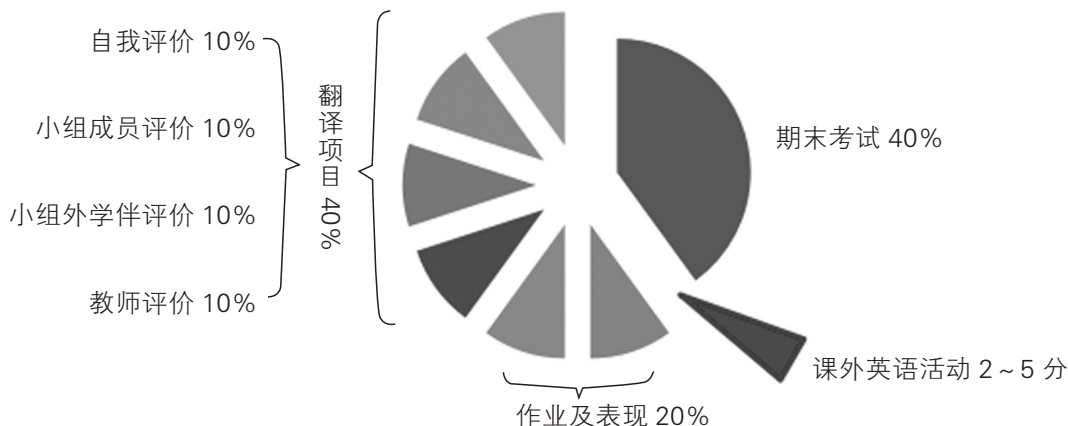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翻译项目的过程评价图（陈卉，2017）

五、结语

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思辨项目教学法已在笔者所在的学校实施三届，教学实践证明该法效果显著。一是学评教为全优；二是督导评价优秀；三是学生后续跟踪效果好，主要表现在上课期间所建 QQ 群均未解散，后续不断有同学在群里相互学习与交流。另外，由于该课程教学效果好，学术英语翻译课程选课爆满。

研究生学术英语翻译课程思辨项目教学法在内容上融入学生所需要的人文知识、英汉语比较知识以及翻译理念与技巧；在教学策略上采用以专业为导向的小组合作方式，以独立思考、小组合作与双向交流的形式培养思辨能力；在评价方面采用基于项目的过程评价体系。以上三个方面均适合当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需求，促使他们将英语翻译的技能与专业相结合。这种专业加英语翻译能力的培养方式值得推广，有助



于培养既懂专业又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新型技术人才;有利于培养思辨创新能力,符合全人教育的理念。

参考文献

- [1]陈卉.英语专业翻译课程形成性评价体系改革研究[J].外国语文,2017(4):133-136.
- [2]陈水平.项目翻译教学模式:意义、问题与对策[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3(3):82-87.
- [3]方梦之,范武邱.科技翻译教程(第二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 [4]洪坚.项目教学法在始业教育课的运用[J].中国成人教育,2016(6):135-137.
- [5]蒋文.项目教学法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实践研究[J].高等教育,2018(6):161-162.
- [6]李彦,刘晓康.以培养翻译能力为中心的翻译项目教学:理论与实践[J].教育现代化,2015(9上):56-61.
- [7]马旭燕.众包在项目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初探[J].上海翻译,2017(6):62-66.
- [8]文旭,滕超.英语专业“全人”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中国高等教育,2018(6):38-40.
- [9]杨正军,姜秋霞.我国翻译课程的知识图谱分析(2000—2016)[J].外语界,2017(6):37-44.
- [10]Deng, Lijun. The Project-Based Flipped Learning Model in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Course: Learning [J].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8, 11 (9): 118-128.
- [11]Madkour, Magda. The Integration of Project-Based Methodology into Teaching in Machine Translation [J].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2016(9-3): 167-188.
- [12]Mitchell-Schuitevoerder, Rosemary Elizabeth Helen. *A Project-Based Syllabus Design: Innovative Pedag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 [D]. Durham University, 2014.
- [13]Kiraly, D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A Case for Situated Translation [J]. *Meta*, 2005 (4): 1098-1111.
- [14]Maruenda-Bataller, Sergio & José Santaemilia-Ruiz.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Competence Assessment in Translation Training[J].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2016 (5): 207-228.
- [15]Siciliano, Bruno. *Handbook of Robotics* [M]. Berlin: Springer Press, 2013.

[基金项目] 本文为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学校翻译类课程思辨教学模式构建”(课题批准号:2018-GX-289)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陈卉,文学博士,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翻译教学。

[电子邮箱] Sallychenhui@aliyun.com

当前翻译生态诉求下“多元同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的构建

杨志亭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

摘要: 为满足国家对汉英笔译人才的迫切需求,实现翻译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培养具有较高汉英笔译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卓越笔译人才是当前翻译生态的诉求,而汉英笔译人才培养的关键又在于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多元同构”的教学模式从理念融合、方法整合、内容组合以及评价契合四个层面为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极大提升了翻译专业本硕层面对汉英笔译人才培养的效度和力度。本研究力争将多元化、动态化的教学理念及方法具体融入到汉英笔译教学中,从而推动汉英笔译教学的立体化建设,为实现汉英笔译卓越人才的培养目标提供科学而有效的教学途径。

关键词: 多元同构; 汉英笔译教学; 教学模式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E Translation Teaching Mode of “Pluralism and Isomorphism” in the Present Trans-ecological Appeal

Yang Zhiting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urgent need for talents engaged in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language to English language, and obta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rans-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excellent translators with high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has become a remarkable appeal in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ecology, while the key to the cultivation li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mode. The mode of “pluralism and isomorphism” is proposed to instruct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ors methodologically from four levels: integration of thoughts, reconciliation of methods, combination of contents and assessment suitability—so as to greatly improve the validity and intensity in innovating C-E translation teaching for translation major in under-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apply multiple and dynamic teaching thoughts and methods to C-E translation teaching,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all aspects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the target in cultivating excellent C-E translators through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training channels.

Key Words: pluralism and isomorphism; C-E translation teaching; teaching mode

一、前言

无论英语专业,还是翻译专业,汉英笔译教学都在翻译教育教学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为促进学生翻译能力提升与推动翻译人才培养起到了奠基作用。当前,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国家大力推行“中译外”的文化发展战略,汉英笔译教学的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然而,传统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在面对高质量翻译人才培养这一重任面前还存在较多问题,尤其在目前翻译生态环境对汉英翻译人才的急迫诉求之下,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的创新发展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我国汉英笔译教学的目标和定位“程式化”现象比较严重,缺乏与中国宏观翻译生态环境的结合,与不断变化中的翻译市场生态需求也有一定的错位。汉英笔译教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思考,力求建立一套适应我国当前翻译生态的教学模式,而本研究所提出的“多元同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正是在对相关翻译教学理论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构想。

二、翻译生态对汉英笔译教学的要求

随着“中国梦”的提出和中外交流广度与深度的日益拓展,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全方位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中国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好自己的形象,而翻译则承担着文化传播桥梁与枢纽的作用。要将优秀的中国文化推广出去,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翻译工作,毕竟精通中文的外国人太少,所以翻译工作和翻译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系统、战略性的工作。中国外文局前局长周明伟就曾经指出,我国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但与日益增多的对外交流合作及文化软实力建设需求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和许多不适应的情况,有些矛盾与问题相当突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兼具跨文化交流、传媒新技术应用等多方面能力的高端“中译外”人才。周明伟提出要加强“中译外”的教育与研究。在这一宏观翻译生态环境中,国内高校的翻译专业都需要对翻译教学模式进行再思考,以加强“中译外”人才培养的效度和力度。此外,翻译市场这一微观翻译生态环境也对“中译外”笔译卓越人才提出了极大的需求。以汉英互译为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译者的能力和翻译要求的制约因素,相对汉译英,从事英译汉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较小的努力获得更好收益,而汉译英翻译工作的难度大、要求高、效率低,即便依靠市场机制的激励也难以满足翻译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汉译英的翻译人才需求是非常



大的。

以上翻译生态环境的种种变化自然对汉英笔译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待培养出更多达到翻译市场译员准入资格、能够胜任对外传播与交流任务的翻译人才，让他们能够“站起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目前国内各翻译专业实际培养的汉英笔译人才从数量和规模上看都很可观，但真正能够胜任汉英笔译工作的卓越人才又极为有限，这一矛盾既与对汉英笔译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有关，也和目前汉英笔译的教学模式缺少创新有关。

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的创新必须从翻译生态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指导下，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等多方面做出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

三、汉英笔译教学与译者能力培养

1. 国内汉英笔译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当前汉英笔译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较多，“仍然未能真正摆脱‘教学翻译’的一贯影响，诉诸实践的大多还是一种‘生搬硬套’和‘去语境化’的翻译教学模式”（胡安江，2018：5）。具体而言，教学方案的设计单一，针对性不强，与英译汉教学设计同出一辙；教学过程的实施倾向于纸上谈兵似的理论灌输，静态的、真空的语言分析占主导，缺少实践的贯彻；教学内容选择以文学文本为主，且相对陈旧，与前沿成果和实际需求脱节；教学效果的评价方式尚未真正落实为形成性评价。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汉英笔译教学的实际操作效果并不理想，缺少科学、特定和高效的教学模式，很大原因在于汉英笔译教学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缺乏与英语专业教学的区分，更缺乏区别于英译汉教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

长期以来，汉译英与英译汉的教学过程并没有进行过多理论上的区分，往往统称为“英汉互译”或是“翻译教学”。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倡导外国文化“引进来”的翻译政策，加之学生更加重视外语的理解分析且对外语表达环节有畏难情绪，所以教师和学生普遍更强调“英译汉”过程，导致汉英笔译教学的专属特征不明显。从事汉英笔译教学多年的陈宏微教授指出：“在语言的各个层次，学生在汉译英和英译汉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相同”，所以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侧重点也应该不同，基于此，“汉译英应该单独讲授，突出治本”（杨晓，2016：5）。

2. 汉英笔译与英汉笔译

Campbell (1998:12) 和 Beeby (2000:186-187) 都曾指出正向翻译（母语译为外语）和反向翻译（外语译为母语）对译者能力的要求是不同的。国外研究团队 PACTE (2009; 2014) 和国内学者葛晓华 (2018) 都尝试对学生的双向翻译能力进行了实证研



究,虽然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且研究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探究,但足以证明学生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双向能力发展是不均衡的,这对于翻译教学和翻译测评都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葛晓华,2018:80)。对于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过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区分是极为必要的,有助于凸显翻译过程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优化教学模式,从而实现各自特定的教学目标。

传统的翻译教学,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通常采用的是一种“文本分析模式”,即英汉笔译重视英语源文本的语言理解分析,而汉英笔译关注汉语目标文本的语言表达分析,这样就从“理解”和“表达”两个翻译标准层面上对英译汉和汉译英的差异做了划分。这样的划分虽然简单明了,却也体现了两种翻译过程各自的侧重点。应该看到,学生在汉英笔译中发生母语负迁移的现象较之英汉笔译更为明显,中式英语成为了中国学生在进行英语表达时的软肋和顽疾。其根本原因在于学生受制于汉语思维和语言环境,对英语思维的认知不够,对英语语言文化的体验不足,对地道英语表达的感悟不强。在构建汉英笔译教学模式时应当重点推行“体验式”“感受型”的教学设计理念,在认知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化学生对英语表达的“原生态”解读与重构。

3. 汉英笔译中的译者能力

汉英笔译人才培养要倡导“多元”思想,具体体现在目标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构成。单一的翻译技能要求已难以适应当今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因为学生进入翻译行业应该具备的能力“不能狭义地界定为翻译实践能力,而是包括翻译实践能力在内的译者能力”(杨志亭,2015:139)。Kiraly把译者能力解释为译者“有能力利用工具和信息创造出有效交际的文本,这些文本在交际范围内被认定为合格的翻译”(2000:14)。而Kelly认为能够体现职业译者能力的代表性因子包括语篇能力、文化及跨文化能力、学科领域能力、职业及工具应用能力、态度或精神心理能力、人际能力、策略能力等(2005:64)。以多元的“译者能力”代替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能力”,能够揭示翻译人才培养目标的本质与内涵,也有助于在汉英笔译教学中构建“方法多元、能力同构”的模式。

四、“多元同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的构建

翻译生态环境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映射,其发展变化都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体现。翻译生态系统中如翻译市场、翻译教育、翻译教学等这类要素都是在宏观的自然生态中存在的体制,受自然生态规律的制约和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多元性构成方式即为翻译生态系统,乃至翻译教学系统的根本。多元意味着差别,也意味着立体和丰富。同构则为发展的结果,意味着目标与方向。笔者认为,在翻译教学中试图寻求一劳永逸



的模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现实的,那么以“多元同构”思想构筑汉英笔译教学的模式,符合生态发展的自然选择。

1. 教学理念的融合

“多元同构”思想强调翻译教学理念的有机融合,从而为教学过程提供多元指导。我国翻译教学研究深受西方翻译教学理论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西方翻译教学理论都对我国的翻译教学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至今还体现在教学的全过程中。如:基于语言学的传统翻译教学理论、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社会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功能主义指导下的翻译教学思想、Robinson 的“感受型”翻译教学理念等等,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对翻译教学予以理论指导。

传统的翻译教学以语言学为根基,以文本为核心,重在对文本的语言分析。这种以语言结构对比和翻译技巧传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由于过度强调语言本身的结构分析,忽视了非语言因素在翻译中的影响,也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认知发展。因此,这种传统的翻译教学已经为人诟病。但汉英笔译终究离不开语言这一根本,语言学的分支,如对比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等,都会对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的构建起到不可估量的支撑作用,因而不能全部摒弃。此外,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从传统的文本转向学习者,关注学习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反应与认知体验,可以为翻译教学提供一定的解释力,特别是解释学习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机大小、情感投入、认知差异等主观因素对翻译效果的影响。但认知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仍然无法为翻译教学提供一个系统而完整的教学模式,故而难以实现宏观层面的翻译教学构想。

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角度研究翻译教学是近 20 年的热点,特别是 Kiraly 的社会建构主义翻译教学思想对我国的翻译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Kiraly (2000) 作为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提出学生的目标是发展翻译能力、自我观念和专业行为,从培养学生翻译技能转向培养学生的译者能力。译员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职业能力 (professional competence)、在反思性实践中 (reflective action) 实现自主发展的翻译职业人才。尽管社会建构主义翻译教学理论为翻译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很强的解释力,但还不能对具体翻译问题做出解释;同时,该理论“既反对建立一套客观标准评估纠错,提倡真实合作性测试和评估,但又主张应用职业翻译标准评估学生译文质量,所以有矛盾之嫌”(桑仲刚, 2012: 83)。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把翻译看做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强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认为译者是跨文化交际的主体,从而为翻译教学提供了一种教学思路,对翻译教学中的译文比较与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更多是在“教学翻译”而非“翻译教学”层面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没有为翻译教学建立一个全面



的、宏观的理论框架,无法解决诸如翻译目标、翻译课程设置以及教学体系建构等直接与“翻译教学”相关的问题。

Robinson (1991) 的“感受型”翻译教学理念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身体的直觉反应(somatic intuition)指导译者的翻译行为,译者对文本的直觉或身体反应不但是出于个体原因,而且也受到文化的制约”。Robinson 的翻译教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成为译者:翻译理论与实践入门》(2003)一书当中,既结合了传统翻译教学中注重理性分析与引导的启发式教学观,又强调了学习者的身体反应和感知作用,特别是由于个体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的感性认识对于翻译的认知作用,揭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对于翻译的实践教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上述翻译教学理念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教学实践提出了指导,应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价值。可以看出,当前翻译教学研究,特别是西方翻译教学研究呈现出的态势是,将社会要求、翻译规范、学生中心、心理过程、信息技术等理念融入到研究之中,因而在理论拓入和教学实践上表现出勃勃生机(王树槐,2009)。笔者认为,在翻译理念多元化的今天,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的研究应该将各个翻译教学研究中的成果进行融合、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扩大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建立起一套立体式的汉英笔译教学和实践体系。将“多元”的翻译教学理论用于探索行之有效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可以避免厚此薄彼的偏向,在汉英笔译的“译者能力同构”中实现立体式、动态性发展,也符合翻译生态环境下和谐共存、生态发展的科学规律。

2. 教学方法的整合

翻译教学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翻译教学,为有效培养翻译人才而提供科学指导。翻译教学应最大程度上为学生提供一种良性的学习生态环境,让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获得真实的感知体验与认知发展,从而养成独立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在《成为译者》中,Robinson 把那些零散的翻译观点归纳成“一个模式、规律或一个规则”,从而为翻译研究者和学习者全面了解翻译教学中的各类问题提供了参考。他对翻译教学的探讨涵盖了职业的、理论的、个体的、认知的、符号的、社会的、文化的和语言的不同径向,也为“多元同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和统一的研究框架。

Robinson (1997/2003) 将缓慢的书本学习与快速的、真实环境中的学习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是有意识的、分析型的、理智的、逻辑的和系统的,而后者是整体的、潜意识的。前者长期在翻译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后者却被忽略。因此,他认为翻译教学的目的是要求译者亦步亦趋地遵守各种翻译理论指导及翻译方法,而是要求译者具有极强的自我认知及自我感受能力、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将自己身体的感受和理性思维完美结合在一起,时刻保持对源语言及目标语言的极度敏锐。这一观点是与汉英笔译教学中强调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的识解能力相吻合的。由于学生在汉英笔译



中易受母语负迁移影响而导致在目标语言的表达环节出现中式英语问题,教学中更应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的认知,刺激学生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感知汉英两种语言的思维差异,积累地道而鲜活的英语表达法,从而让学生获得真实体验与认知养成,在螺旋式发展中促成学生的能力同构。

基于此,任务型教学、情景式教学、体验式教学、真实项目教学等教学方法都可以在汉英笔译教学中用以帮助学生建构个体的语言认知体验,并逐步养成翻译思维,提升学生的“译者能力”。任务型教学促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对问题解决、决策选择、语言输出进行翻译能力的建构。情景式教学通过创建真实或模拟真实的翻译情境,让学生能够在教师和专业译者的指导下完成翻译项目,并构建自己的翻译思维和理论,这实际上反映了译者通过与外部物质世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形成认知模式和行动方案的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体验式教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建构主义之上的,让学生在真实的、可以亲身体验职业翻译的学习活动中,自主、自愿地建构认知技能和认知模式,实现译者能力的自助式发展。认知语言学则为翻译教学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语言教学模式的认知建构模式,重视学生对翻译外部环境的认识,注重引导学生在多样化的文本认知语境下利用多样化的认知手段和资源重新建构意义,在此过程中,学生的“译者能力”也得以建构。此外,教师在教学中还应增大对平行文本的使用,利用比较或平行语料库帮助学生进行语言对比、译文分析与评估、翻译策略的选择,培养学生的语篇意识,同时通过笔译实验室实现信息技术与翻译教学的结合,最大程度优化学习的环境。

总之,汉英笔译教学的多元同构模式以“同构学生的译者能力”为根本目的,提倡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和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和助推。只有借助多元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并通过教师的启发、引导和有效管理,才能加快学生对“译者能力”的自我建构过程。

3. 教学内容的组合

汉英笔译课程的教学内容应当打“组合拳”,即根据国家急需的翻译领域和市场需求,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按照培养定位、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进度安排进行适当的组合,避免过分强调文学翻译而导致实用型翻译人才的匮乏。我国传统的翻译教学主要以文学翻译为主导,文学翻译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人文情怀无疑是必要的,但也导致了教学内容与当前生态环境的剥离。事实上,不仅中国经典文学作品需要“走出去”,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商贸动态、旅游经济、体育文化、社会风貌等内容也需要对外传播,所以除了进行文学文本的翻译训练之外,教学内容也需要更丰富和立体,一方面要凸显学校特色、学院特色、专业特色,一方面要增大非文学翻译的占比和类型,并与课程设置密切结合。目前国内大多翻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都有“非文



学翻译”“专题翻译”或者“应用翻译”这类实用性较强的独立课程,以示与文学翻译类课程的区别,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非文学翻译课程中所选择的的教学内容是否恰当和适用。

在具体的内容选择和分配过程中,要考虑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翻译课程中内容的搭配与协调,同时要兼顾翻译材料难度的递增,既要避免教学内容的单一与重复,又要反映出译者能力的渐进式发展。所以,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多元同构”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对教学管理者和任课教师都提出了要求。教学管理者首先需要对专业内所有涉及汉英笔译内容的课程进行顶层规划,按照培养目标和专业导向进行分类分层设计,并召集所有笔译课程的教师进行专题研讨,明确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和任务,以便安排教师进行内容选择和取舍,之后教学管理者还需对教学内容进行核定。教师则具体负责教学内容的优选组合,根据课程大纲和教学目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在确定校本教材的基础上,加大投入方向性、市场性、专业性更鲜明的翻译文本,强调教材与翻译生态需求紧密关联,体现出时代发展的典型特征,这一过程同样是对翻译生态环境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4. 教学评价的契合

目前,国内对翻译教学效果的评价尚未建立规范和系统的指标体系,评价更多依靠教师的个人经验或学校的统一安排,课程间的区分度不明显。

汉英笔译教学效果的评价亦需契合多元同构的思路,即反对教条式地遵循某一客观标准来衡量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提倡按照可信性、真实性原则对学生的“译者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结合 Kelly 对译者能力构成因子的分类,在设计评分量表时,除了常规的专门针对翻译能力的几个评价指标(如双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策略能力、思辨能力)之外,还应包括翻译能力的外延部分,即属于译者能力范畴的职业能力(校对能力、文本编辑能力、翻译技术应用能力、态度或精神心理能力等)和交际能力(包括任务决策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乔洁(2016)结合现实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对“译者能力”进行了可测量的多元解构,并制订了分项评分表,对于积极建立系统的评价体系做出了尝试,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总体而言,评价方式应为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的结合。形成性评价关注学生翻译能力的动态发展,教师可借助学习日志追踪学生在阶段性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并以此进行考量,或者建立学生的翻译档案,如实记录学生完成翻译任务的情况以及在完成过程中对问题的处理、决策的选择等情况,从而发展性地对学生的学习和能力进行客观评估。总结性评价的依据为学生参加各类笔译测试的情况,包括阶段性的笔译考试成绩、参加翻译证书类考试(如 CATTI 考试)成绩以及参加笔译竞赛的获奖情况等等。



五、结语

“多元同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寻求在多元翻译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借助多元的教学方法、内容和评价,实现教学过程中“能力同构”的人才培养目的。在整个教学模式构建中必须明确,汉英笔译中的译者能力表现为外在行为的内在心理实体,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这一能力既要从个人的认知水平、语言发展和社会交际等方面进行共性的界定,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体现出“中译外”特有的要求,如充分考虑人文传统、教育价值取向等外在因素。因此,汉英笔译教学模式必须要有不同于英汉笔译教学的“个体性差异”,而多元翻译方法的选择也必须契合这种个性,实现因“才”施教。

参考文献

- [1]葛晓华.翻译学员双向翻译能力比较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2018(6):80-85.
- [2]胡安江.专业区分度 课程建设 职业前景——关于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再思考[J].东方翻译,2018(3):4-8.
- [3]李正栓,申玉革.本科翻译专业“校标”制定的原则与要求[J].中国翻译,2018(4):42-47.
- [4]乔洁.基于译者能力的翻译专业汉英笔译评分模式新探[J].上海翻译,2016(5):67-72.
- [5]杨晓.汉英翻译教程“陈氏”模式探索——陈宏微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2016(4):3-6.
- [6]杨志亭.翻译生态学视阈下的翻译专业本科人才培养途径研究[J].外国语文,2015(3):136-142.
- [7]王树槐.西方翻译教学研究:特点、范式与启示[J].上海翻译,2009(3):43-48.
- [8]桑仲刚.翻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困境[J].中国外语,2012(4):82-88.
- [9]Beeby, Anna. Evalu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A]. In Christina Schaffner & Beverly Adab(eds.)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 185-198.
- [10]Campbell, Stuart. *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98.
- [11]Kussmaul, Paul. *Training the Translator* [M].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95.
- [12]Kelly, Dorothy. *A Handbook for Translation Trainers: A Guide to Reflective Practice* [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5.
- [13]Király, Don C.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M].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0.
- [14]PACTE. Results of the Validation of the PACTE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Acceptability and Decision Making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2): 207-230.



- [15] PACTE. First Results of PACTE Group's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cquis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Declarative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J]. *MonTI-Monograph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014(1): 85-115.
- [16] Robinson, Douglas. *The Translator's Turn* [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7] Robinson, Douglas. *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2nd e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当前翻译生态诉求下‘多元同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研究”(JY164612), 2016年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当前翻译生态诉求下‘多元同构’汉英笔译教学模式研究”(163086)的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 杨志亭, 男,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 翻译教学, 翻译理论与实践。

[电子邮箱] yzt@163.com

学界动态

翻译技术化转向中译者与机器的矛盾与协调 ——《机器翻译中的人为因素》评介

李晗喆 陈海庆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机器翻译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提高了译者的翻译效率，但在智能化的发展道路上也造成了译者与机器之间的一系列矛盾。2018年由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机器翻译中的人为因素》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及时、详尽的解答，并通过对机器翻译在不同领域应用中人为干预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协调策略，从而为机器翻译研发与译者的今后发展予以指导。

关键词：机器翻译；译者；人为因素；翻译技术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ranslators and Machines: A Review on *The Human Factor in Machine Translation*

Li Hanji Chen Haiq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machine translation improves the translator's working efficiency, it also causes a series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machine. *The Human Factor in Machin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in 2018, provides timely and detaile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This book analyzes the new impacts of human intervention in different field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for future machine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and translators as guidelines.

Key Words: machine translation; translator; human factor; translation technology

引言

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促使着翻译这一“经验性”的实践活动逐渐呈现出“技术化”的倾向。技术的介入不仅提升了翻译行业的生产力，同时对翻译实践、翻译教育和翻



译研究的影响逐渐深入,具体表现在翻译对象、翻译角色、翻译能力、翻译策略、翻译方式、翻译流程、翻译标准、翻译环境、翻译教育及翻译研究 10 个方面的变化(孔令然,崔启亮,2018)。机器翻译在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发展的不断推动下,已经愈加显现出其强大的能力。尤其是伴随着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和在线网络翻译平台的出现,这一技术被更多终端用户所接受并应用于翻译实践之中。百度神经机器翻译系统于 2015 年上线;谷歌(Google)2016 年宣布谷歌神经翻译(Google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实现了技术突破,其翻译结果已经可以和人工翻译相媲美;随后,如微软(Microsoft)、脸书(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都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研发的投入,机器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潜能的认知。尽管机器翻译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译者依旧在翻译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出现了一系列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机器翻译中的人文因素》(*The Human Factor in Machine Translation*)一书无疑是当下对上述问题的最好解答。该书于 2018 年由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隶属于劳特里奇翻译技术研究丛书(*Routledge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主编为香港中文大学陈善伟(Chan Sin-wai)。该书从不同的侧面出发,详尽探讨了译员在机器翻译中的地位,并强调了人与机器良性互动的重要性。

一、《机器翻译中的人文因素》内容概述

本书共收录 12 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译员在当今技术化翻译实践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作用进行了研究。本文将从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结论等方面对每篇文章加以概述。

第一章“利用机器翻译实现网站本地化:基于用户体验和可译性关系研究”的作者是来自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的鲍克(Lynne Bowker)和西罗(Jairo Buitrago-Ciro)。网站良好的用户体验不仅取决于视觉层面,文本层面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此,一些机构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意见来规范网站内容协作的语气和口吻,以提高用户满意度。采取受控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规范编写的网站内容同样有利于提高利用机器翻译处理文本的可译性。在考虑时间、成本和质量的前提下,他们的研究聚焦于用户体验和可译性之间的关系: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对立?通过对采取两种不同规范的网站双语文本翻译的对比,他们得出结论:随着可译性的提升,源语读者的用户体验下降,译入语读者的用户体验则会上升。

第二章“机器翻译中的规范与受控语言”由来自贝桑松大学(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的卡迪(Sylviane Cardy)撰写。通过对机器翻译与意义挖掘(Sense Mining)之间的关系研究,他发现在翻译中,意义在源语与译入语中以不同的表层结



构得以解读，在意义挖掘中却是在不同语言的表层意义中加以搜索。由此，卡迪通过对阿拉伯语、中文、法语、英语、日语和泰语在内的多语种之间互译来进行语料领域和语种关系的研究，发现采取受控语言进行机器翻译不仅会减少翻译中的陷阱，同时也会减少译后编辑（Post-editing）工作的投入。

第三章“在翻译的网络中——对3本翻译百科全书编撰的反思”由陈善伟完成。通过对其亲身参与编写的《翻译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劳特里奇翻译技术百科全书》（*The R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和《口笔译实践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Practic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的过程的反思，作者探讨了在编撰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

第四章“翻译术语提取方法对比研究”的作者姜诚和王敏来自上海理工大学。他们评价了C值算法、TF-IDF算法、非统计算法和综合算法等4种不同术语提取方式的效果。通过实验数据，他们发现前3种算法在精确度、召回率、F函数方面各有其优缺点，而综合算法较之前3种表现更为出色。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术语提取方式的理论构建，同时对相关工具的研发以及翻译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五章“语料库修辞学在翻译质量评估中的应用：以《中国国防白皮书》为例”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钱多秀撰写。借助DocuScope和Minitab工具，以《中国国防白皮书（2000—2012）》为语料，她利用语料库修辞学方法对翻译文本在源语读者和译入语读者中所产生的效应加以评测。研究发现，翻译的效果，尤其是说服效果可以被量化评测。

第六章“术语提取工具测评：系统性能 vs 用户感知”的作者奥利维亚（Olivia Kwong Oi Yee）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当前的术语提取工具以独立或集成于计算机辅助软件中的形态供用户使用。自动术语提取的价值就在于以更少的系统维护时间取得尽可能大的工作效率。基于对现有术语提取工具的测评，她分析了产出质量、软件设计、用户体验、工作习惯等影响用户感知的因素。

第七章“辅助全球沟通的术语资源”由术语管理专家沃伯顿（Kara Warburton）所撰写。她认为电子数据库中的术语资源在全球沟通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愈发明显。为了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术语资源应该以最新标准加以建构和践行。与以往版本不同的是，成熟的术语管理系统应该能够存储多语种间大量的信息，在工作流程、多媒体支持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在受控创作（Controlled Authoring）和搜索引擎优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等方面可以进行应用拓展。

第八章“基于语料库与计算机辅助翻译的中国文化英译”的作者徐彬来自山东师范大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他指出了转变文学外译研究方式的重要性。除了对翻译伦理和翻译策略进行研究之外，术语技术、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和语料库



技术也应作为研究手段被纳入相关研究的考察范畴。

第九章“英语—斯瓦西里语间机器翻译语言结构问题”由来自肯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Kenya)的尼格苏(Sarah Ndanu M. Ngesu)所完成。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结构直接影响机器翻译的准确性。英语和斯瓦西里语分别隶属于屈折语和黏着语,这篇文章对这两种语言间语言结构上的性质、分类做出了详尽讨论,从词汇、句法和语义层次出发,力图探明影响机器翻译的困难之所在。为了回答英语—斯瓦西里语间机器翻译是否存在搭配不当和不准确情况,语言间结构差异对意义是否造成影响,以及译文是否能够满足读者需求这3个问题,尼格苏将人工与机器翻译译文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分类,并结合受访者的问卷调查结果为未来英语—斯瓦西里语间机器翻译发展提出建议。

第十章“对机器翻译文学作品的质量评估”的作者来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摩斯坦(Ghassemiazghandi Mozghan)和马哈迪(Tengku Sepora Tengku Mahadi)指出当今的机器翻译水平已经可以接入真正的翻译流程加以使用。除了时间和人力成本因素外,译后编辑所需花费的努力也是衡量机器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这项实证研究语料选取自英语和波斯语撰写的文学文本,他们力图探讨通过机器翻译经译后编辑后译文的可接受性。结果显示,译文存在着大量的错译与模糊的翻译。机器翻译处理文学作品的优势仅在于时间和成本两方面,未经人为干预的机器翻译文学作品无法达到较高的翻译质量。

第十一章“通过跨学科、跨文本类型以及机器翻译的不同应用来拓展机器翻译系统的使用范畴”由在香港多所大学兼职的塞西莉亚(Cecilia Wong Shuk Man)所撰写。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将源语文本中的深层含义转达给目标语读者,因此意译(free translation)的翻译方法更能够将原作者的意图再现从而实现特定的情感效果。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的机器翻译更适合处理需要采取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文本。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机器翻译依旧难以驾驭需要采取意译翻译的文本,但是确实能够提升译者的工作效率。该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探讨采用机器翻译进行意译的可行性。她最终得出结论,只有通过跨学科,跨文本类型并结合机器翻译的不同应用,才能够共同促进未来的机器翻译发展。

第十二章“当今中国的众包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作者曹艺馨来自香港中文大学。近些年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产业内部都对众包以及众包翻译(Crowdsourcing Translation)产生的影响给予了关注。当前的研究多是基于个案的实证研究,缺乏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的理论建构,众包翻译的文化、政治价值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她的研究旨在回答以下3个问题:①众包翻译何时在中国得以发展?②为何众包翻译有如此多受众?③众包翻译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她构建了未来众包、众包翻译以及众包翻译

活动研究的理论框架，从众包翻译的定义、历史和分类出发，以字幕翻译为例对上述问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

二、启示与不足

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人与机器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美国技术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人类如想在现代技术文明中继续生存并发展，就必须多方面考量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Mitcham, 1983: 84）。对于机器翻译的发展而言，我们既要客观了解最新的技术发展情况，做到理性看待；同时也应重新审视译者的主体价值，将人本主义技术观念铭刻于心。正如本书的编者陈善伟（2018: 6）在前言中提到的，过分强调人在译前、译中与译后的作用并非是确保机器翻译质量的最佳方式。只有通过互动，人与技术之间的交流才会愈加激烈和频繁，直至达到冲撞状态，而只有冲撞后的人与翻译技术互动才会更和谐（Olohan, 2011）。

本书作为一本学术界高水平论文集，具有以下优点：

首先，本论文集立足机器翻译，全面涵盖翻译技术门类。正如题目所示，本论文集将机器翻译作为主线贯穿全书。同时，本论文集又广泛涵盖了翻译技术，如本地化、术语、语料库、计算机辅助翻译和众包翻译等诸多领域，从而全面而又深刻地展现了当今机器翻译乃至翻译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相关人为因素参与问题，能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详尽的参考。

其次，本论文集中文献的研究方法科学严谨，兼顾定性与定量分析。翻译技术化转向不仅体现在翻译实践上，同时也体现在翻译研究方法的变革上。传统的翻译研究是纯粹主观的、自觉的、依靠个人经验的，因此大部分是经验性、推论性和不科学的（陈善伟，2014: 328）。翻译研究方法的信息化在文献、资料和数据获取手段以及数据管理上。技术的发展还促进了翻译研究的跨地域协作和跨学科合作，对传统调研方法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蓝红军，2017）。本论文集中采用了大量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利用了语料库、文本分析软件、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手段，对大量的数据加以搜集、整理并分析，从而得出更加客观、全面和有效的结论。基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更加能够说明人为因素在机器翻译中所起到的作用，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借鉴相应的研究模式使其更加完善。

本论文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部分章节（如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等）虽然对于机器翻译技术发展进行了详尽而有见地的研究，但是似乎题目中的关键词“人为因素”并未参与其中，呈现出内容与题目脱节的现状。其次，全书缺乏整体的理论架构，缺乏对机器翻译中人为因素的综述性讨论。虽然范围涵盖较广，但各章节相互独立，



之间关系也并不明晰,不免使读者产生碎片化、零散化的阅读感受。

三、结语

正如计算机辅助翻译领域奠基人马丁·凯(Martin Kay)(1997)的论文《人与机器在语言翻译中的合理位置》(*The Proper Place of Men and Machines in Language Translation*)所示,只有开发人一机互动式的系统才是未来机器翻译的发展方向(Wu, Schuster Chen, et al, 2016)。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各有所长,有鉴于此,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之间的关系并非矛盾、零和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译者不仅要摆正对技术的态度,认清机器翻译的本质与优势;同时还要了解技术特性,转变传统的翻译实践模式与翻译观;此外还需要有序、辩证地应用翻译技术,实现技术提升人类幸福感和自由度的设计初衷;最后,还要运用自身的语言学知识和技术使用中的实际经验与技术研发者进行有效沟通,共同提升技术能力。既然翻译的技术化转向趋势已经不可扭转,同时技术的使用又能够带来诸多的便利,那么当今时代明智的译者就需要摆正对技术的态度,积极了解技术,正确使用技术并努力参与技术研发,从而在多方位确保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机器翻译中的人为因素》一书从实践出发,辩证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译者与机器存在的矛盾与协调的策略,无疑为技术使用者与技术研发者都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虽然该书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瑕不掩瑜,仍然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性。

参考文献

- [1]陈善伟. 翻译科技新视野[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 [2]孔令然,崔启亮. 论信息技术对翻译工作的影响[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3): 44-57.
- [3]蓝红军. 翻译研究信息化: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发展与挑战[J]. 语言与翻译,2017(1):52-57,68.
- [4]Chan, Sin-wai. *The Human Factor in Machine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5]Kay, Martin. The Proper Place of Men and Machines in Language Translation [J]. *Machine Translation*, 1997(1-2): 3-23.
- [6]Mitcham, Carl.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 [7]Olohan, Maeve.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he Dance of Agency [J]. *Translation Studies*, 2011(3): 342-357.
- [8]Wu Yonghui, Schuster, Mike, Chen Zhifeng, et al. *Google's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 1609. 08144, 2016.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庭审话语语调表征及其信息效果研究”(项目编号: 15BF066)和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修辞学研究”(项目编号: L14AYY003)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 李晗佺, 男,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生。研究方向: 翻译学, 语言哲学。陈海庆, 男,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用学、语篇分析、语言哲学。

[电子邮箱] lihanji900630@sina.com chenhaiqing789@163.com

翻译学博士论文写作与人才培养的启示 ——第五届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侧记

李东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摘要：2018年10月20日至10月21日，第五届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此次论坛分为开幕式专家发言、博士开题模拟答辩与“我与博导面对面”座谈会三个环节。模拟答辩环节中，博士生导师针对博士生的论文写作给予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指导意见，在找好研究选题，重视理论批评和掌握研究方法论三方面颇具启示。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是博士生论文展示、检验和交流的新形式，助力翻译学青年人才培养。

关键词：博士论坛；人才培养；翻译学

Doctoral Dissertation Writing and Academic Talent Cultiv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ewing the Fifth National Forum for PhD Candidat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GDUFS School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Abstract: The Fifth National Forum for PhD Candidat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as held from October 20th to 21th, 2018 b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s forum consists of expert speeches, rehearsal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proposal and symposium for doctoral supervisors and PhD candidates. In the rehearsals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proposal, doctoral supervisors have given valuable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topic,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oretical criticism and the learning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National forum for PhD candidat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a new platform for the presentation, exam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and is helpfu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youth talen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forum for PhD candidates; academic talent cultiv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学博士生培养是翻译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国最早培养的一批翻译研究青年学者已经逐渐成长为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为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和理论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时代贡献，同时也承担起了培养下一代翻译学博士生，为学界造就和输送新一代译学人才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随着我国翻译学科建设与学位教育的持续发展，翻译学博士生的培养和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如何回应新的时代环境对译学人才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如何在招生数量增长的同时保证乃至提高培养质量，是目前翻译学博士生培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018年10月20日至10月21日，由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中国翻译》编辑部、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和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8年广东省研究生学术论坛——翻译学分论坛暨第五届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在广州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始于2004年，此前已成功举办四届，为翻译学博士生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检验博士论文的平台，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口碑和反响。此次论坛邀请了19名专家（其中17名为博士生导师）现场指导，69名博士研究生参加论文答辩，旨在为博士生论文写作答疑解惑，进一步提升翻译学博士生培养质量。论坛的主要环节包括：①专家致辞；②模拟答辩：与会学生分组发言，汇报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开题报告或毕业论文，并回答导师组的提问；③“我与博导面对面”师生座谈会：翻译学博士生导师与博士生及有志报考博士的学生面对面互动，解答同学们关于博士论文写作和博士阶段学习方法等问题。

一、开幕式专家致辞

论坛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东风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词，通过简介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概况，特别是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方面的情况，他指出翻译学博士是翻译学科的后备力量，代表了翻译学的未来。此次论坛聚合了学界博导师资力量，聚集了近百名翻译学博士生，拓宽了各高校博导与博士生交流的平台，希望与会博士生能在导师专家的帮扶指导下增长学识、精进学问、提升学养。《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简要回顾了近年来翻译学科在国家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的立项数量、从事翻译研究与实践的人员数量、翻译学博士生培养规模、学术研究成果上取得的重要成绩，同时也指出当前中国的译学研究对国际翻译学的贡献有限，少有提出产生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和方法，从译学大国走向译学强国仍然任重道远，从而表达了对青年学者的殷切期待和鼓舞。他充分肯定了翻译学博士生论坛加大举办频率的意义，也希望博士生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交流平台和学习机会，展示自我的同时接受更多专家的检视。中国翻译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平博士指出此次博士论坛正值我国改革开放40年，具有特别意义。改革开放为中国译



学研究带来了跨时代的历史机遇,为翻译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译学研究实现了从以古典文学、美学、哲学为思想基础的传统译论研究向科学化、现代化译学研究的拓展和转变;从对具体实践的技巧总结、原则的抽象归纳和主观思想的概括走向对具体翻译现象的描写、分析;从表达译者主体的直观感受转向对客体文本的语言结构的分析,再到文本之外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权力结构等因素的关注,进而又到翻译文本发生的过程、译介接受与传播、译者心理认知过程、翻译政策等视角的延伸。译学从单一范式转向多元范式并存,理论的多元和释义的开放成为当代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面向未来,中国翻译学的发展要在继承传统、借鉴西方、中西互动的基础上探索、反思和创新。讲好中国翻译研究的故事、构建中国翻译研究话语体系是我国新一代翻译学博士生和青年学者面对的新的时代课题。最后杨博士还表达了实现全国翻译学博士论坛机制化、常态化的希望,以积极探索博士生培养的新形式。

二、博士生模拟答辩

本届翻译学博士生论坛下设三个主题论坛:论坛一主要包括翻译史、口译研究和翻译教育等相关研究领域;论坛二主要涉及文学翻译、翻译传播与接受、翻译批评研究;论坛三则涵盖译者主体性、语料库翻译学、翻译技术和翻译话语研究。每个论坛都有相应领域的博士生导师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点评指导。总体来说,博士生导师们根据每位博士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问题,从学术价值和学理逻辑上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批评和建议;同时也根据自己培养博士生的实际经验,指导博士生如何从思考到落笔,求真务实进行学术训练,掌握独立研究的能力。

1. 找好研究选题

选题是博士论文写作的关键环节。翻译学博士生阶段的选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想高度、理论深度和关怀生命的温度。博士论文同时也是博士生作为青年学者长期研究计划中的一环,很有可能在博士毕业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作为课题继续深入,进行后续研究。所以说,博士论文选题应当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有不断探索和挖掘的空间和价值,甚至成为贯穿个人科研生涯的主要研究领域。当然,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不能求大过泛,一来容易失去研究焦点而难以深入,导致泛泛而谈;二来可能远超自己的研究能力而难以把握,无法按时保质完成研究。选题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必须被纳入考量。博士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学术旨趣和强项选择自己“跳一跳才能/就能够到”的题目展开纵深探索,力求在某个方面深入而不是面面俱到,以解决实际存在的、具体的译学问题。好的研究选题不是凭空产生的,研究者首先需要全面细致地清理翻译学术史,广泛阅读前人文献,梳理出翻译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热点问题、前沿问题和现实问题,



了解翻译研究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哪些不足,思考有哪些可以改进的空间和如何改进。确定研究领域和选题方向后,博士生要明确研究其在翻译学科体系内的位置,在体系外可能涉及哪些跨学科结合点,还要做好“课题史”的分析调研,做好文献综述,对该领域已有的视角、方法与结论进行系统整理,避免重复研究。文献综述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必要环节,高质量的文献综述能帮助博士生找到真正的研究问题和切入点,在新的学术增长点发掘增量,才能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有所创新。

2. 重视理论批评

博士生论文写作过程就像搭建一座学术堡垒,此次模拟答辩过程就如同对堡垒的防御工事进行检验,在有需要的地方添砖加瓦、查漏补缺,有时甚至需要推倒重来。博士生导师们都非常重视论文展示过程中博士生的理论意识,其中理论批评意识更是导师不断强调的、博士生需要着重培养的意识。对于各种翻译学及其相关理论,我们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套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追究该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和指导自身研究的切适性。已有理论与自身研究目标通常并不完全吻合,一味套用反而容易自我设限,有削足适履之感。学理层面上讲,理论套用可能有以下4种情况:①“老套”:前人早已多次运用某理论分析某一类型的材料和现象,再运用该理论难以获得对该类材料或现象的新认识;②“硬套”:未明确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未论证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力即用于阐释,可能不借用这一套理论话语体系亦可得出结论;③“错套”:对理论本身的作用有错误的认识,比如将描写客观事实的理论用于解释现象,将解释现象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④“套套”:研究逻辑不清,理论应用型研究应该是运用理论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新认识,而理论验证型研究是指运用新的事实和现象来检验和完善理论,求得对理论的新认识。所以说,研究者首先要对所用理论有深入认识,了解理论发生、发展的源流,理论背后的思想、立场和哲学观照,前人对理论本身已有哪些研究和应用该理论开展过哪些研究,理论的普适性和局限性,等等。重视理论批评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更好地找到理论与研究问题的“接口”,活用理论。

3. 掌握研究方法论

翻译学博士论文的方法论部分体现的是博士生关于翻译研究方法的理论素养和应用能力。不同于教材、项目报告或者期刊论文,翻译学博士论文一般需要对研究方法论展开专章介绍,呈现研究者根据自身研究问题、研究定位和研究预期将采取何种研究路径和相关的研究方法,以及将如何进行数据收集、材料分析和结果讨论的过程。此次模拟答辩的展示过程或多或少地显示出博士生对方法论的轻视和缺乏方法论的科学训练。博士生导师多次强调博士生课程设置中应该专门开设翻译研究对方法论



课程,督促博士生自觉学习和掌握研究方法论,且方法论贯穿于研究的不同阶段。首先,翻译研究者要学好所有学科的底层方法论,也就是普遍方法论的一般原则。其次,要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历史和现状,知晓在翻译研究中形成了哪些基本方法论,其适用性与局限性如何。再次,针对研究设计中预期要采用的具体方法,要有全面的认识,最好要积累各种具体方法的实操经验,明确其难易与优劣。比如研究翻译史需要学习史学方法,学习在提出历史中的翻译问题后如何在史料中寻找主证与旁证,而不至于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而最终流于史料堆砌;在应用语料库研究翻译问题时要先熟知语料库研究的范式,了解语料库方法和翻译研究结合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领域值得探索。最后,博士生导师提出博士生要具备方法创新意识。方法创新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在综合前人对自身研究所代表的某一类问题所采用的方法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沿用与创新,比如采用“多重证据法”“三角互证法”,等等。

三、师生座谈会互动

除了博士生模拟答辩外,论坛还举办了师生座谈会,以博士生提问、导师专家解答的形式进行。针对博士生提出的“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研究”等问题,导师和专家们指出,博士生需要以自身兴趣为导向,结合自己导师的研究方向,克服焦虑,潜心学术,厚积薄发。学习过程中,博士生要更加注重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除了阅读与自身研究直接相关的书刊外,还要学习间接相关甚至不相关的材料,做到精读与泛读结合,专读与跨读结合,锻炼扎实的文科基本功。博士生论文写作中会遇到许多具体的、实际的困难,是一个需要反复掂量、多次修改、不断突破才能渐趋完善的过程,同时还要注意学位论文体例和学术规范,以严谨专注的态度写作才能有所收获。

10月21日,论坛闭幕式由王东风教授主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教授致辞。穆教授充分肯定了此次论坛的成果及意义,并对下一届论坛的议程设置等提出了参考建议。翻译学博士生论坛是学术会议的新形式,也是翻译学博士生论文交流的新形式,对于培养翻译学后备军和生力军,实现翻译学人才的接棒与传承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李东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理论、翻译史。

[电子邮箱] m13760750459@163.com

附 录

《翻译教学与研究》征稿启事

《翻译教学与研究》以翻译学为关注对象、以服务翻译教学与研究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由重庆翻译学会与四川外国语大学主办，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现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的外语专业师生、翻译从业者、翻译研究者及社会各界的翻译爱好者征稿。

《翻译教学与研究》以“开展翻译教学与研究、促进翻译研究能力和翻译实践能力培养”为理念，积极反映国际国内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最新成果，致力于为广大翻译工作者搭建交流译学研究和翻译实践经验的学术平台。

《翻译教学与研究》设置以下栏目：翻译研究新视角、翻译史研究、翻译家研究、翻译教学、应用文体翻译研究、口译研究、业界与行业动态、翻译实践探索、争鸣与商榷、名家访谈、书刊评介等。本刊特别关注翻译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译介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外汉语言对比、词典学、术语学等。

一、字数要求：来稿一般以 5000 ~ 8000 字为宜，长文应控制在 10000 字以内；书评及访谈类文章应在 5000 字以内为宜。

二、稿件要求：来稿请用 Word 格式。应附中英文摘要、英文标题和关键词、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作者单位英文名称，所有信息应与中文内容对应一致。正文请采用 5 号宋体排版，文中应使用规范的汉字、标点符号和数字书写，插图和表格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参考文献一般应引用公开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的论著和文献。中文文献编排在先，外文文献编排在后；文献一律按作者姓氏外文字母或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以带方括号的序号依次列明，并采用小 5 号字编排，置于文末。

三、文献引注要求：请在引文后用括号注明作者姓名（英文只注姓）、出版年份和页码。如：（廖七一，2012：138）或（Toury, 1988: 26-33），并在“参考文献”项下列出详尽信息；文内注释采用尾注形式。具体可参见《〈翻译教学与研究〉文内引文标注、注释及文后参考文献体例》。

四、投稿方式：请将电子文稿以附件形式发送至电子信箱 fanyixuekan@163.com；或邮寄至：重庆市沙坪坝区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教学与研究》编辑部，邮编：400031。

五、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两个月，两个月后未接到用稿通知，请自行处理稿件。本刊对来稿实行专家匿名评审，来稿正文请勿显示作者任何个人信息，以免影响稿件审理；来稿请另页附上稿件题目、作者姓名、署名单位、职称学历、研究方向、基金



项目、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讯地址等信息。

六、来稿要求首发，切勿一稿多投。若发现一稿多投，本刊立即退稿。投稿者应当保证作品著作权的完整性、合法性，作品及内容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七、本刊要求来稿差错率（包括中英文拼写）不超过万分之三，中英文符号不可混用，中文摘要书写规范，严格按照本刊的格式体例排版，来稿作者信息和联系方式完整，否则一律不予刊用。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 33 号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400031

联系电话：023-65381861

电子邮箱：fanyixuekan@163.com

联系人：彭老师

《翻译教学与研究》文内引文标注、注释及 文后参考文献体例

为尊重知识产权,规范本刊体例,与国际及国内学术著作、期刊的出版惯例接轨,请作者在撰写文章时按照以下格式对文内引文进行标注,所引文献详细信息另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

一、引文标注

文内引文所据文献,应在引文后加圆括号注明作者姓名(英文只注姓)、出版年和引文页码,例如:(Toury, 1988: 26-33)或(廖七一, 2010: 98);合作者为三人及以上的,只标注第一作者,如:(文军,等, 1997: 354)。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请用分号隔开,如:(董洪川, 1999: 8-9; 文旭, 2001: 79; 祝朝伟, 2005: 17; 2006: 61)。

二、注释

本刊统一采用尾注形式。需对文中特定内容进一步解释或说明的,请在正文相应位置用上角标加上注释号①、②、③……注释内容在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如需说明出处,请采用“引文标注”的格式并将相关文献列入“参考文献”,切勿混淆注释与参考文献。

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按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顺序列出,中文文献在前,英文文献在后,并依次排序 [1]、[2]、[3]……文内未直接或间接引用的文献不列在参考文献中。文献类型标志如下:专著 [M],论文集 [C],专著或文集中析出的文章 [A],报纸 [N],期刊 [J],学位论文 [D],报告 [R],标准 [S],数据库 [DB],计算机程序 [CP],电子公告 [EB],其他类型文献 [Z]。

示例如下:

1. 专著

[序号] 主要责任者(外国人名姓在前,名在后). 题名(外文书名用斜体) [M].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例:

[1]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

[2]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2. 论文集、编著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 [A].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 原文献题名 (外文书名用斜体) [C].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

例:

[1] 施蛰存. 纪念傅雷 [A]. 见金圣华. 傅雷与他的世界 [C].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46-49.

[2] Nida, Eugene.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A].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 期刊、报纸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J]. 期刊或报纸题名 (外文出版物用斜体), 年(期): 起止页码.

例:

[1] 胡安江. 译者的隐身——论傅译作品的语体选择 [J]. 中国翻译, 2009(2): 28-33.

[2] 齐寒. 文学翻译: 后傅雷时代 [N]. 文汇报, 2006-10-17.

[3] 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 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Resistance [J].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2003(2): 128-133.

4. 译著

[序号] 原著者姓名. 原著名 (斜体) [Z]. 译者姓名. 译著名. 译著出版地: 出版社, 出版年: 起止页码.

例:

[1] Faulkner, W. *The Sound and the Fury* [Z]. 李文俊. 喧哗与骚动.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81-82.

5. 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 题名 [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日期 (纯网络文献的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可省略).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电子文献载体类型标志如下: 磁带 MT, 磁盘 DK, 光盘 CD, 联机网络 OL.

例:

[1] 萧钰. 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 [EB/OL]. (2001-12-19) [2002-04-15]. <http://www.creader.com/news/200112190019.htm>.

[2] XVIII FIT World Congress Proceedings[C/C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诚挚感谢译界同仁的厚爱与支持, 欢迎赐稿!

《翻译教学与研究》编辑部